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報導前線：外媒記者在臺灣的新聞生態研究

(2022-2024)

Reporting Frontline: Journalists of Foreign Media in

Taiwan (2022-2024)

廖彥甄

Yen-Chen Liao

指導教授：蔡蕙如 博士

Advisor: Hui-Ju Tsai, Ph.D.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December, 2024

# 謝辭



論文甄的寫完了！曾經無數次的想像自己完成論文後，敲著電腦寫謝辭的這一刻，以前總覺得遙遙無期，沒想到這一天終於來了。

回顧寫論文的這段日子，點點滴滴著實難忘。特別感謝指導教授蕙如老師，在這條路上給予我非常多寶貴的建議，還有滿滿的鼓勵，您是最棒的指導教授！另外，也非常感謝麗雲老師、昌德老師、照真老師的建議，讓我有機會可以把這篇論文再進一步的完善。

接著，非常謝謝所有的受訪者，一開始尋找受訪者的過程並不是很順利，很感謝幫我牽線、介紹聯絡的各路好友，還有抽空參與訪談的受訪者，你們都是我非常敬佩的新聞人，採訪的過程不只過癮有趣，也讓我看見了一個不一樣的新聞領域，從你們身上學習到好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真心感謝以及祝福。

還有就是新聞所認識的各位好友，慢吞吞的我終於也畢業了！很幸運可以在求學階段遇到大家，一起做夢、再一起面對現實的種種挑戰。謝謝芷瑩、家慈、晁翔、宏寬，希望我們能夠美夢成甄。謝謝王薇、禹綦、家瑜、翊柔、浩瑋、甜甜、文弢，一起修課、寫報導、拍影片的時光真的很好玩！也要謝謝采瑜、辰書參與最重要的口試，讓我可以順利的完成口試！

最後的最後，最想感謝的是鼠鼠一家人。在新聞所的這段時間，不務正業的時間很多，謝謝爸爸媽媽的大力支持，若沒有他們，我不會擁有今天所有的一切，也不會有恣意探索世界、享受青春年少的自信，謝謝爸爸、媽媽、姊姊、哥哥，當我最好的避風港，讓我不怕失敗、不怕受傷，有勇氣嘗試各種可能。當然還要謝謝小波波、小尿寶，陪我度過每個風風雨雨，小主人很愛你們喔。

寫給未來的自己：這麼可怕的論文都寫完了，沒有什麼困難是過不去的喔！

甄 2025. 2. 8 14:42

## 摘要



近年來，國際局勢動盪，中美關係惡化，臺海議題逐漸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自 2020 年起，中國政府對外媒記者的管制日益嚴格，促使許多關注中國議題的記者將駐點轉向臺灣，進而改變臺灣的外媒生態，影響其在全球新聞網絡中的角色與定位。本研究探討臺灣外媒生態的變遷，分析外媒駐點臺灣的成因與影響，並補充相關學術研究的空缺。透過深度訪談外媒新聞工作者，包括外籍記者、在外媒工作的臺灣記者，以及在地新聞嚮導（fixer），本研究檢視近年來臺灣外媒圈的趨勢變化，並解析其報導視角、面臨的挑戰與機會。研究結果顯示，隨著外媒在臺灣的增加，臺灣新聞報導的國際能見度顯著提升，且報導範疇已從政治與兩岸議題擴展至文化與社會動態。此外，臺灣提供相對自由的新聞環境，使其成為外媒駐點的重要選擇，但同時仍面臨資訊管道限制、在地新聞資源分配，以及國際媒體議題設定等挑戰。

關鍵詞：外媒生態、國際新聞、駐臺記者、新聞價值、專業自主、影響層次理論

#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have brought heighte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Taiwan Strait. Since 202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ightened its control over foreign media correspondents, prompting many journalists covering China-related issues to relocate to Taiwan. This shift has significantly altered Taiwan's foreign media landscape, redefining its role and position within the global news network.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foreign media ecosystem, analyzing the factors driving the relocation of foreign media correspondents to Taiwan and its broader implications. By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journalists, Taiwanese journalists working for foreign media, and fixer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volving trends in Taiwan's foreign media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perspectiv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se media professional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creased presence of foreign media in Taiwan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news visibility. Furthermore, coverage has expanded beyond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o include culture and social dynamics. While Taiwan offers a relatively free press environment, making it an attractive base for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limitations in information access, the allocation of local news resources, and agenda-setting dynamics within international m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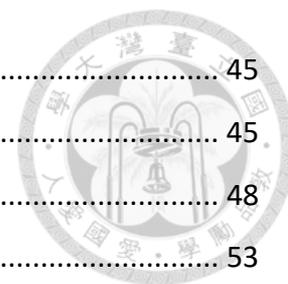
**Keywords:** foreign media, international new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Taiwan, news values, professional autonomy, hierarchy of influences theory

# 目次



謝辭.....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次.....	IV
圖次.....	VI
表次.....	VII
<b>第一章 緒論 .....</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 .....	2
一、 中共與外媒的關係變化 .....	2
二、 國際媒體眼中的臺灣 .....	5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7
<b>第二章 文獻回顧.....</b>	<b>9</b>
第一節 國際傳播生態與現狀.....	9
一、 國際傳播生態系 .....	9
二、 國際新聞的實踐邏輯 .....	13
三、 國際新聞的批評 .....	17
第二節 記者與新聞產製.....	22
一、 國際新聞記者特殊的新聞工作模式.....	22
二、 影響層次模式理論 .....	23
<b>第三章 研究方法.....</b>	<b>33</b>
一、 研究樣本選擇 .....	33
二、 研究方法與設計 .....	34
<b>第四章 研究分析.....</b>	<b>36</b>
第一節 臺灣外媒生態圈.....	36
一、 疫情前：臺海議題升溫，國際媒體對臺的有限關注.....	37
二、 疫情後的外媒變局：臺灣作為亞洲新聞駐點的轉變.....	39

第二節 外媒在臺灣的新聞實踐影響層次理論 .....	45
一、 個人 .....	45
二、 常規 .....	48
三、 組織 .....	53
四、 媒體外部 .....	58
五、 意識形態 .....	66
第三節 國際記者的新聞自主性 .....	70
一、 臺灣新聞的結構性問題 .....	71
二、 記者的抵抗空間與因應策略 .....	72
三、 臺灣記者的特殊角色 .....	74
四、 記者與編輯衝突互動 .....	75
第四節 臺灣作為國際新聞基地的潛力與挑戰 .....	77
一、 新聞自由 .....	77
二、 臺灣議題的新聞價值 .....	82
<b>第五章 結論 .....</b>	<b>87</b>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	87
一、 國際媒體在臺報導的選擇考量 .....	88
二、 臺灣作為國際媒體基地的關鍵環境條件 .....	89
三、 國際讀者需求與臺灣在地議題呈現的平衡 .....	91
第二節 研究預期貢獻 .....	92
一、 學術貢獻 .....	92
二、 實務貢獻 .....	93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	94
<b>參考文獻 .....</b>	<b>95</b>



# 圖次



圖 一-1 臺灣陳腔濫調的賓果圖 .....	7
圖 二-1 記者專業概念架構 .....	28

# 表次



表 二-1 12 個新聞價值因素定義 .....	14
表 二-2 記者專業自主評估項目 .....	29
表 三-1 受訪者名單 .....	33
表 四-1 2016 至 2024 駐臺外媒數量變化 .....	36
表 四-2 外媒記者在中國境外進行中國報導的因應策略 .....	62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22 年 8 月美國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 旋風來臺，此次來臺訪問雖然時間不到 20 小時，但因其為 1979 年與臺美斷交後，第二位於任內訪問臺灣的聯邦眾議院議長，具有歷史意義，同時也因中美關係緊張，美國官員訪臺引起了北京政府的不滿，而裴洛西不顧北京反對仍飛抵臺灣，裴洛西訪臺事件備受全球媒體的矚目，登上了許多媒體的頭條版面（中央社，2022；徐薇婷，2022）。

2024 年臺灣總統大選也引起海內外媒體關注，因疫情與半導體產業優勢，臺灣再一次受到國際矚目，國際主流媒體相當關注臺灣大選，各國重要媒體幾乎全數抵臺，根據中央社報導，此次選舉吸引來自日本、美國、韓國、瑞典、丹麥、法國、義大利、澳洲、愛爾蘭、捷克、盧森堡、土耳其、巴西、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 15 國媒體參與；國際媒體包括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法新社 (AFP)、路透社 (Reuters)、日本時事通信社、日本經濟新聞，與義大利廣播電視公司 (RAI) 等也出動 5 人以上記者團隊來臺參與，更陸續有外國訪團來臺（溫貴香，2024）。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受國際關注，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也逐漸躍上國際媒體版面，此現象也呈現在駐臺的外籍記者數量日漸增多。根據外交部統計，2016 年有 48 家外國媒體、81 名外籍記者申請駐臺；2020 年增加為 71 家外媒在臺灣設有分社、124 名記者常駐在臺；2024 年適逢臺灣總統大選，有 223 位外國記者透過提出來臺採訪申請（邱祐慶，2024）。據統計，2020 年至 2022 年，相較 2020 年前數量，外駐臺媒數量增幅超過三分之一（呂伊萱，2022）。

國際局勢的動盪變化：中美新冷戰、香港反送中運動、新冠疫情爆發以及烏俄戰爭等國際事件頻發，對全球媒體佈局產生了重大影響，臺灣順勢成為國際媒體關注中國和亞太地區的重要據點；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美國重返亞洲，臺灣的戰略地位日益重要，國際媒體對臺灣的關注度也隨之提高。這一現象引發本研究對於外媒在臺灣聚集的研究興趣，尤其是在中美關係緊張的背景下，外媒大量來臺

形成一種獨特的國際媒體生態。然而，當臺灣成為國際媒體的焦點，外媒在臺灣的聚集也對臺灣外媒圈造成一系列影響和改變。



## 第二節 研究背景

### 一、中共與外媒的關係變化

中共與外媒記者長期以來存在著緊張的矛盾關係，北京當局對於試圖報導中國內部真實狀況的媒體記者抱持敵意。許多文件指出，中共對於國內外媒體進行審查，限制新聞記者採訪自由，透過監聽、威脅、跟蹤等方式阻礙媒體進行報導 (FCCC, 2020; RSF, 2021)。

回顧中共政權與外媒的關係演進，在國共內戰期間，時任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曾極力向西方記者示好，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間接促成共產黨的勝利。但 1949 年中共在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隨之與西方切斷聯繫，驅逐國內的外國記者、監禁為外媒工作的中國記者；然而 197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交、1980 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中國再次的向世界開放，與外媒的互動也越加頻繁 (林廷輝，2020；袁莉，2020)。前中共領導人江澤民也曾為了讓中國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外國記者友好相待，一同高歌，試圖透過國際媒體塑造中國的正面、開放的良好形象 (林廷輝，2020)。

直到 1989 年，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備受各國關注，中共鎮壓抗議者的舉動引發國際間批評聲浪，而中共隨即宣布戒嚴，禁止外國媒體訪問天安門廣場，並驅逐了一些外國記者，甚至有些外國記者遭到拘留；現任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自 2012 年底上臺後，實施嚴厲的社會、政治管控政策，中國當局對於新聞媒體的管控強度明顯增加，試圖對積極報導政府活動的外國記者施加限制，例如習近平拒絕任何外國媒體的採訪，針對駐北京的外國記者，更是以不續約簽證或直接驅逐的方式迫使外國記者減少報導對中國的批判性報導 (FCCC, 2020; Shear, 2021; 王剛，2024)；2019 年香港爆發「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反送中運動)，中國國內的新聞自由再次降到谷底。該年 8 月 31 日太子站襲擊事件，港警將在場記者全數驅除，並且在反送中期間，更傳出港警朝記者射擊催淚彈、多名記者受傷、被逮捕的消息 (BBC NEWS 中文，2020；林克倫，

2019)。根據香港記者協會「2019 年新聞自由指數調查」顯示，香港民眾與從業記者的評分嚴重下跌（BBC NEWS 中文，2020），並有 93% 受訪的新聞編採人員認為「執法人員以暴力故意阻撓採訪」為普遍發生的情形。

而美中關係在 2017 年美國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上任後逐漸惡化，美中衝突浮上檯面，並引發美中兩國駐外媒體衝突（王月眉、黃安偉，2020）。美中兩方的媒體角力在 2020 年三月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年初，時任美國總統川普稱新冠病毒來自中國為「中國病毒」，此言論一出即加劇兩國的緊張關係。隨後，因懷疑中國媒體並非單純從事新聞報導，而是夾帶為中國政府搜集情報的特殊任務，2020 年 3 月 13 日，美國政府將《新華社》、《中國日報》及《人民日報》等五家駐美中國官方媒體視為「外國使團」，並要求 60 多位駐美中國記者即日離開美國（林廷輝，2020；徐筠庭，2020）。同年 3 月 18 日，中國外交部隨即以「對美方無理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被迫進行的必要對等反制」等理由宣布驅逐《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的駐華美籍記者，凡事記者證於該年到期者須於十日內交還記者證，停發和限制記者的工作簽證，並禁止記者在港澳繼續工作，影響人數超過 12 人，為中共政府在現代針對外媒最嚴重的一次打擊（方可成，2020；林廷輝，2020；袁莉，2020；聞予，2022）。3 月 24 日，《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名發布了一封公開信，指責中國在疫情期間，進行有害且魯莽的舉動，並指出中國驅逐美國記者是對美國政府的報復，媒體成為美中兩國外交衝突的犧牲品。27 日，中國外交部與三家報社進行交涉，指稱此公開信內容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中國拒絕接受（人民網，2020；中央社，2020；新華網，2020）；該年 5 月，美國白宮同樣針對中國記者在美工作簽有效期限縮減為 90 天（王月眉、黃安偉，2020；林廷輝，2020；SHEAR，2021）。美中兩國在記者工作簽證數量的議題上針鋒相對，從 2021 年初開始互相為駐當地記者簽證數量設限，美國當局同樣限制了對中國國營駐美機構工作人員的簽證數量。直到年底，美國現任總統拜登 (Joe Biden) 與習近平才公佈協議放寬兩國記者往來限制（麥燕庭，2021；SHEAR，2021），但 FCCC 表示，雖然兩方同意放寬限制，但美中針對記者簽證問題的談判仍陷入僵局，美國記者想獲得中國進行報導的簽證依舊困難重重（斯科特，2023）。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於 2022 年所發布的《中國新聞業大躍退》報告，中國利用監

控、簽證勒索的方式對外國記者進行恐嚇，迫使 18 人在 2020 年離境，而華裔外籍記者桂敏海、楊恆均和成蕾當時皆因間諜罪被拘留。

一直以來，香港都是美國記者的主要新聞據點之一，但美中關係惡化，加上 2020 年香港國家安全立法頒布，禁止記者前往香港，讓想要報導中國事務的外國記者可說是無處可去。在這個節骨眼，鄰近中國的臺灣崛起，成為了新的外媒新聞據點，在美外交僵局的初期成為外國記者的安身之地。2021 年中國武漢因疫情封城，當時駐中國的外媒面臨被驅逐卻又因封城無法離開的窘境。成功離開武漢的記者，有些回到原本的國家，有些轉移報導中心至中東或其他亞洲國家，也有一些記者選擇來到臺灣。這些來到臺灣的外媒記者，最初是將臺灣視為「庇護所」的停靠站，等待中國再次開放簽證，期間也報導一些臺灣的新聞。來臺的外國記者人數增多的第二高峰，為美中關係升溫後，許多外籍媒體增加在臺的駐點，也有些丹麥、加拿大等歐美國家第一次派遣記者駐點臺北。根據斯科特（2023）報導，簽證與人身安全問題讓越來越多外國記者選擇離開中國，在中國境外進行中國相關報導。

大量外媒來臺成為新的國際趨勢，2020 年 3 月 28 日臺灣外交部長吳釗燮於社群平臺 X 發布了一條推文：

“As @nytimes, @WSJ & @washingtonpost face intensifying hostility in #China, I'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be stationed in #Taiwan — a country that is a beacon of freedom & democracy. Yes! You'll find people here greeting you with open arms & lots of genuine smiles. JW”

「當@nytimes、@WSJ 和@washingtonpost 在#China 面臨日益加劇的敵意時，我歡迎你們駐紮在#Taiwan——一個自由和民主燈塔的國家。是的！您會發現這裡的人們張開雙臂並帶著真誠的微笑迎接您。 JW」

外交部的這則推文顯示出在美中關係升溫的國際局勢下，臺灣欲成為繼北京、香港後的國際新聞基地的野心，並不忘強調臺灣的自由民主風氣。同時，臺灣擁有豐富的中國研究，也有許多學者專門研究中國議題，「更可凸顯臺灣是研究中國的重鎮」（林廷輝，2020）。



## 二、國際媒體眼中的臺灣

事實上，在外媒大量來臺的榮景背後，隱藏著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外媒對於台灣議題的選擇與報導取向。早在約 30 年前便有學者針對 1996 年臺灣首屆民選總統外媒對臺灣的報導進行研究 (Neilan et al, 1996)，當時有超過 690 位外媒記者報導此次選舉，並見於 29 個國家，發布至少 271 則報導 (134 頁)。研究結果指出，報導中佔比前三名分別為：中國的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 (95.5%)、臺灣與中國的關係 (94.4%) 及總統選舉結果 (90.8%) (頁 144)，該年選舉的國際影響與候選人政見也是關注點之一。然而，根據 Neilan 等學者對於外媒記者的訪談結果顯示，當時許多外國記者對臺灣事實上為一知半解，有人不知道臺灣在哪裡，也不知道是否能正確唸出「李登輝」這三個字，而是因為臺灣可能存在「戰爭新聞」而來到臺灣 (頁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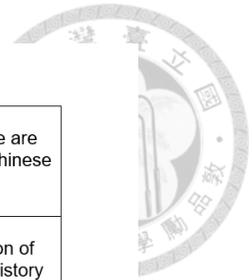
學者陳祥、陳嘉珮 (2009) 曾研究《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兩家外媒在 20 年間的報導中，如何形塑臺灣的國家形象，研究指出，1980 年前，臺灣在美國媒體上的見報率低，一直到 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以及隔年解除政治戒嚴後，才開始出現轉變，自 1980 年代至 2000 年代，外國媒體中的臺灣國家形象可以區分為三個不同時期：在 1980 年代初期，有關臺灣的報導中，仍需要交代中共政府與臺灣的複雜關係，和提及國民黨來臺、中國臺灣分離的新聞背景讓讀者知悉。此外，在這個時期，有關臺灣的新聞聚焦在臺幣升值、通膨和投資等牽動財經、政治的議題，除了外交突發事件、社會與法律、意外災難與其他等三個新聞主題外，報導中所建立的臺灣形象呈現模糊、中性的面貌 (頁 26)；1990 年代中後期，則因 1995 年前總統李登輝訪美、1996 年臺海危機兩大兩岸關係重要事件，導致兩岸局勢快速變化，外媒進而更關注兩岸衝突、中國威嚇、美中臺關係等兩岸關係發展的新聞議題，其中 1996 年的新聞最大篇幅為報導中共試射飛彈武力恫嚇臺灣、美國暗中派出航空母艦巡弋臺灣海峽等；關於臺灣的新聞量在 2000 年達到當時的高峰，一個原因是該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臺灣完成首次的政黨輪替，外媒所報導的國內政治新聞報導數量增加。

在 2000 年代的臺灣相關新聞中，有 46% 是關於兩岸關係，「顯示出兩報所勾勒出臺灣的國家形象是建構在與中國大陸衝突與折衝的角色之上」 (頁 26)；2000 年後，「統獨議題」成為臺灣國家輪廓的主要框架。研究發現，這



20 年間，外媒所報導臺灣新聞脫離不了四個重要議題，一為國內民主議題，如解嚴、總統選舉、爭取國際地位等；其次為臺海兩岸議題，包括統獨議題、開放中國探親、臺海安全、小三通、軍事演習等；三為臺美互動，如臺美軍購、美國協防臺海和領導人拜訪；最後則是意外災難，例如地震、SARS 疫情等天災人禍（頁 22）。然而，「不管臺灣的國家形象如何轉變與變遷，整體國家形象似乎都難以脫離自身在兩岸關係架構下的論述，也使得「兩岸關係」總是在不同階段如影隨形跟隨在美方報導臺灣的新聞之中」（頁 27），統獨、兩岸議題成為臺灣難以擺脫的國家形象，至今仍呈現在外媒眼中的臺灣（陳祥、陳嘉珮，2009）。

另一方面，有媒體分析外媒報導臺灣的議題面向：2015 至 2018 年關於臺灣的新聞不多，且以災難新聞為主；一直到 2018 年中國共產黨黨主席習近平宣布取消黨主席連任限制，中共逐漸在國際舞臺展現更積極的姿態。北京當局與美國白宮一來一往的互動，衍伸出中美抗衡的微妙關係，受到國際關注。而臺灣置身中美抗衡之間，為重要的關鍵角色，讓「臺灣」這個名字頻繁的出現在國際新聞版面（李又如，2023）。例如，2019 年香港反送中事件中，「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口號，將臺灣推到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2020 年起共機的大動作侵擾臺灣，臺海關係備受關注；2022 年裴洛西來臺，臺灣在國際新聞的露出達到高峰；時任總統蔡英文訪美，也被國際媒體大規模的報導。然而，據該報導分析，外媒針對中國臺灣兩岸關係的報導呈現「危言聳聽、看好戲」的心態，多數報導著重在兩岸第一線的金門、馬祖，當地的軍事部署、防空洞等採訪內容。若將新聞中的「中國因素」移除後，臺灣就僅剩「同性婚姻」以及「新冠防疫有成」這兩個議題較受到外媒所關注。



TAIWAN CLICHÉS, INACCURACIES, AND BAD TAKES BINGO

RENEGADE PROVINCE	Tsai refuses to acknowledge the '92 consensus	The US adheres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Only discusses USA and China perspectives	Taiwanese are ethnically Chinese
The only "Chinese democracy"	Tsai, who favors independence	"Chinese Taipei"	"Reunification"	No mention of pre-1949 history
RISING TENSIONS	ROC flag = "Taiwanese flag"		Vibrant Democracy	Maintaining diplomatic allies
US sold arms to Taiwan, angering China	Chiang Kai-shek founded Taiwan in 1949	Most LGBTQ friendly part of Asia	Communism versus democracy	In a move likely to anger China
Self-governing island	China considers Taiwan 'sacred territory'	"Greater China"	Pretending Indigenous Taiwanese don't exist	BREAKAWAY PROVINCE

圖 一-1 臺灣陳腔濫調的賓果圖

上圖為推特 (X) 上一張「臺灣陳腔濫調的賓果」的圖片 (@lnachman32, 2019)，發布者為政治學者納赫曼 (Lev Nachman)，這張賓果圖中提及的新聞內容，例如包括「中華臺北」、「美國軍售臺灣」、「一個中國」以及「激怒中國的舉動」等，都是外國媒體報導臺灣常見的切角與內容，這張圖也顯示出臺灣議題在國際形象中的固化情形，脫離不了兩岸關係、「民主堡壘」，甚至是同志友善亞洲國家等形象，這些特定議題，在國際媒體一再的報導、渲染，強化了外國讀者對於臺灣的片面印象。

### 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當外交部新聞稿讚嘆臺灣的多元民主、新聞自由讓外媒趨之若鶩時，研究者內心不禁有個疑問，國際媒體來臺的原因是否真的如外交部的新聞稿所說，是為了臺灣的多元民主、新聞自由？

隨著國際地緣政治局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對外媒的限制加劇與臺海議題的升溫，臺灣逐漸從一個國際新聞的邊緣地帶，轉變為一個重要的國際媒體駐點。

本文關注外媒記者在此背景下的角色轉變，尤其是他們如何從將臺灣視為「庇護所」到將其作為「報導前線」。

然而，臺灣在國際媒體的駐點角色與報導框架中，長期以來存在著邊緣化的現象，多數報導仍聚焦於兩岸關係與臺海局勢，而非深入探討臺灣的內部議題與社會文化。尤其在疫情與烏俄戰爭等重大國際事件的背景下，臺灣的外媒生態圈出現快速擴張，但其對國際輿論的影響及可持續性尚未被深入研究。特別是，這種現象背後涉及外媒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實踐如何受到語言能力、媒體規範、組織結構、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多重層次影響。外媒記者在平衡國際讀者需求與臺灣在地議題呈現時，面臨哪些挑戰？

雖然臺灣被視為新聞自由和民主的象徵，但外媒記者是否真是基於此而選擇臺灣？還是出於地緣政治的權宜考量，如中共限制的逃避地點？這種選擇是否導致對臺灣議題的偏狹聚焦，如過度關注兩岸關係、軍事緊張，而忽視臺灣內部多樣性的社會文化面向？此外，作為一個獨特的報導基地，臺灣具備哪些環境優勢（如新聞自由、民主價值）？外媒記者的聚集如何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外媒報導臺灣時，又如何平衡國際讀者的需求與臺灣在地議題的呈現？同時，這種聚焦是否固化了某些刻板印象（如「兩岸關係的熱點」），限制了臺灣多元形象的展現？這些問題不僅關乎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亦涉及國際媒體在全球資訊流通中的權力結構與報導倫理。

外媒大量在臺灣聚集，臺灣的國際矚目度提升，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特殊狀態，也是一個具有時效性，且尚未被充分探討的議題。在這個時期形成了特殊的外媒生態圈，背後牽涉的國際新聞的實踐邏輯以及國際傳播的佈局策略。然而，過去相關研究缺乏從臺灣特殊處境出發的討論切角，以及臺灣外媒生態在此時期的特殊脈絡。透過研究臺灣的媒體環境、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交叉點，本研究預期記錄並分析這個特殊時期的臺灣外媒生態，透過多層次的分析視角，探討外媒記者在臺灣的報導實踐，揭示其背後的運作邏輯與限制，並進一步思考臺灣在國際媒體中的定位與挑戰。為解答上述問題意識，本文聚焦於以下研究問題：

- (一) 2022-2024 年外媒在臺灣的發展變化為何？
- (二) 外媒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實踐如何受到多層次影響（語言、媒體規範、地緣政治等）？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第一節 國際傳播生態與現狀

#### 一、 國際傳播生態系

「國際新聞」可概括為跨國界、由外地傳遞的新聞內容，涵蓋從即時發生的事件到新奇、有趣且超出日常經驗的報導。主流新聞媒體通常側重於即時事件，而國際新聞則更具包容性，對陌生、新奇的新聞事件類型更多的包容與興趣 (Hannerz, 2004, p. 31-33)。舉例來說，某些事物在當地人眼中是長期存在、習以為常的事，可能因其異於觀眾文化背景而令外國觀眾感到驚奇。對於此類新聞，新聞的即時與否就不會是最優先的考量，相反，「文化差異」的展現也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一環。

從宏觀層面來看，國際新聞植根於數位化和全球化進程所引發的新興媒體生態，讀者正在目睹各大洲之間的經濟、技術、文化、社會、政治和生態關係，媒體呈現的以及讀者所理解的新聞內容，可以被概念化為對由空間和地點定義的共存文化的理解 (Firdaus, 2016, p. 23)。國際新聞牽涉各國事務，包括氣候變遷等潛在的全球性危機，一國的決策可能會影響到世界其他國家或地區，國內外報導之間的界線越來越具有滲透性，「國內新聞」與「外國新聞」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國內外關於商業、政治、文化、環境等議題環環相扣，國際上的大小事與國內事務越發密不可分 (Leuven & Peter Berglez, 2016, p. 668; Obijiofor & Oelgemoeller, 2023, p. 3; Hamilton & Jenner, 2003)，形成更全面的國際傳播文化。

今日，國際傳播進入新時代，走向多種模式並存，集體提供訊息的多元體系 (Cole, J. H., 2008, p. 806)。由於前往國外報導新聞的成本降低，再加上數位科技的新媒體技術提升，傳統駐外記者模式發展為更多新型態的海外記者百花齊放，包括越來越多報社雇用當地記者 (Hamilton & Jenner, 2004, p. 306)、以單次任務為主的降落傘型記者 (Parachute Journalist)、自由工作者的數量增加等趨勢。



Hamilton & Jenner (2004) 提出 8 種駐外記者的新舊型態：傳統的駐外記者 (Traditional foreign correspondent)、降落傘記者 (Parachute journalist)、外國記者 (Foreign foreign correspondent)、當地外國記者 (Local foreign correspondent)、外國駐地記者 (Foreign local correspondent)、內部駐外記者 (In-house foreign correspondent)、高級服務外國記者 (Premium service foreign correspondent) 以及業餘記者 (Amateur correspondent)。

另外，Erickson 和 Hamilton (2006) 也建立了一套新型態海外記者的類別，包括：傳統駐外記者 (Traditional Overseas Foreign Correspondent)、駐外外國記者 (Home-Based Foreign Correspondent)、Beat Reporter Abroad、度假記者 (Vacationing Reporter) 以及在地新聞嚮導 (fixer)。

一間跨國媒體機構的分社組成可能會是這樣的：分社社長兼編輯、數名全職記者、一名合約記者和數十位特約記者、當地記者或自由工作者，再加上來自各國的合作在地新聞嚮導 (Erickson, Hamilton, 2006)。當今的國際傳播生態，因為交通移動便利加上訊息傳遞便捷，呈現一個既混亂卻充滿彈性的混亂狀態，更新興多元的媒體角色如駐外記者、降落傘記者、在地新聞嚮導、編輯、外國記者等構成了新型的國際傳播生態。以下挑選五種常見的新聞工作角色加以介紹：

### (一) 駐外記者

「擁有多個碩士學位、穿著風衣遊走在異國街頭。有時喝著一杯白蘭地，手中拿著一根上等雪茄」，這是早期對駐外記者的菁英形象的描述 (Hamilton & Jenner, 2004; Hess, 2005)。駐外記者 (Foreign Correspondent) 是由本國媒體派遣記者至國外採訪、撰寫新聞後回傳國內，並刊登於國內的媒體版面的記者類型，工作包括長駐國外或前往海外提供國內新聞報導，為新聞媒體的國內讀者報導特定的國家或地區所發生的新聞重點 (Przybylska & Townsend, 2021, p. 176)，為國內讀者接收國外新聞的重要消息來源，並具有在現場目擊見證的重要性 (Sambrook, 2010)。

對於一名駐外記者，工作內容主要分為四個部分：思考、後勤、寫作和歸檔，而對於某些記者而言，在城市間的交通移動時間，甚至可以佔工作的一半以上 (Hannerz, 2004, p. 45)。駐外記者長年待在國外，且不同於國內跑線記者，駐

外記者因人數少，普遍須負責一個國家、重點城市的多面向報導，很大程度脫離了國內媒體記者的工作與生態，開展與國內記者相當不同的記者生活（冷若水，1993）（頁 205）。同時，駐外記者必須具備獨立報導的能力，視情況可能需要搭配數名專業的在地新聞嚮導、研究員協助工作、進行調解，當地的調解人員對剛到新環境的記者而言尤其重要 (Hannerz, 2004, p. 45-47)。

如同前面提到的，國際傳播的趨勢正在歷經轉變，傳統駐外記者的模式正在式微，雖不至於絕種，但數量確實下降，並被其他替代的方案取代 (Hamilton & Eric, 2004, p. 305)。駐外記者的沒落有跡可循，Hamilton & Jenner (2003) 分析，最早可追溯到後冷戰時期，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媒體減少，一方面培養一位駐外記者的成本高昂，另一方面，通訊科技發達，資訊取得更微廉價，在媒體上市走向商業化的趨勢下，經濟效益成為駐外記者的致命傷。

近日隨著越來越多媒體公司關閉國際新聞分社，增加了媒體對降落傘新聞和自由工作者的依賴，這也連帶導致對在地新聞嚮導和當地特約記者的需求提升 (Ashraf & Phelan, 2023, p. 1488)。

## （二）降落傘記者

為了填補國際新聞的空缺，降落傘記者已成為大型媒體機構在報導國際新聞時的替代選擇，當事件發生時，記者會臨時被派去該地區進行報導 (Hamilton & Jenner, 2004)。多數降落傘記者都是前往有麻煩的地方 (Hannerz, 2004, p. 42)，也有另一種情形是當國家重要元首、政治人物出國時，會安排記者同行，或是主要報導這些政要的記者也會跟隨前往，但這類型的記者並非典型的外國記者，而是暫時轉換了工作地點 (Hannerz, 2004, p. 42)。

降落傘新聞是國外新聞日益增長的報導趨勢，50 份報紙中就有 44 份報紙偶爾使用過海外臨時報導的方式報導海外新聞 (Erickson & Hamilton, 2006, p. 37)，因為成本與其他因素考量，擁有廣泛專業知識駐外記者的傳統模式正在衰落，並讓降落傘新聞的興起。傳統上對於降落傘記者的批評在於缺乏對當地的深厚的瞭解，無法進行深入的報導。有學者認為，因為對當地認知有限，空降的降落傘記者僅能依據既存的觀點進行報導，進而複製了母國原有的刻板印象觀點，再加上缺少當地人脈，降落傘記者可能更傾向依賴官方機構所安排的記者會以獲

取新聞消息。對應到長期駐外的記者因擁有較廣的當地人脈，且對新聞脈絡有更高程度的掌握，因而可以跳脫既有的新聞框架，報導超越本過觀點的新聞內容（陳韜文等，2002）。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提出反駁 (Erickson & Hamilton, 2006, p. 37-39)，指出傳統駐外記者與降落傘記者模糊的界線，表示任何媒體都不可能隨時隨地在當地都派駐記者，許多傳統駐外記者的本質也是降落傘記者，即使在國外也會離開分社據點，前往其他地區進行報導，研究也提出對於駐外記者與降落傘記者更細緻的分類，許多降落傘記者雖並非長駐國外，但是海外報導的專業人士或是區域專家，知道在不同地區取得資訊，並快速歸檔整理。

### （三）外國記者

雇用當地外國人是另一個國際媒體越來越頻繁使用的策略，經濟成本是主要考量因素。過去擔心當地記者會失去中性觀點，但隨著日益全球化，也減少了文化和職業分歧，本土化不再像過去一樣為人詬病 (Hamilton & Eric, 2004a, p. 305)。

### （四）在地新聞嚮導 (fixer)

關於在地新聞嚮導 (fixer) 的工作內容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在學術界、新聞界多沿用英文「fixer」來稱呼，本研究依據其工作性質將其稱為「在地新聞嚮導」。在地新聞嚮導的工作包羅萬象，最常見的像是擔任翻譯、蒐集新聞事件資料、尋找採訪對象，並在記者抵達時介紹該國狀況，有時候也包括外國記者的酒店和交通預定、確保與政府官員的接觸以及偵察危險地點等瑣碎的工作事項 (Erickson 和 Hamilton, 2006；Murrell, 2010；Mojica, 2015；Vandevoordt, 2015；Plaut & Klein, 2019)。

### （五）自由工作者

新的媒體技術加上社群網絡平臺，降低新聞產製的進入障礙，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新聞的發布者。自由工作者 (Freelancer) 的加入讓國際新聞的數量增加

且可涵蓋更多元的議題。雖然也不乏優秀的國際自由記者，但另一方面自由工作者的出現，也導致對新聞品質下滑的批評，即便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缺乏海外經驗的「記者」也能夠輕易的在網路上散佈新聞 (Hamilton & Jenner, 2004 a, p. 99; Hamilton & Jenner, 2004b)



## 二、國際新聞的實踐邏輯

國際新聞是牽涉距離、空間和時間的綜合考量，以及形式與內容之間關係的遊戲，不同於傳統對外通訊的實踐，不只是單純報導遙遠國度發生的事件，而是積極地將本地讀者與全球連結起來 (Hannerz, 2004, p. 33; Leuven & Berglez, 2016, p. 667)。在國際新聞的產製流程中，牽涉國際新聞如何被外國讀者所接收的馴化過程，以及選擇報導與否的新聞價值衡量。

### (一) 國際新聞馴化

與一般新聞實踐不同，國際新聞的實踐首先面臨到的不同國家文化的差異性，在報導技巧上，為了讓國內讀者更好的與外國事件建立聯繫，通常會選擇清晰簡單、好理解的事件報導，捨棄含糊、複雜的資訊。由於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要理解一個事件通常涉及歷史、文化，甚至政治、種族等遠因背景，若是國內新聞還比較好解釋，但換作一個遙遠、陌生的國家，則需要花更多精力處理它的文化複雜性。另外，也有記者會以籠統的術語簡化事件，但這也會造成與現實事件脫節、扭曲的現象發生，並給國內讀者留下外國事件相當高程度的同質性印象；也有記者傾向以簡單、原始且更為人性化、普世性的觀念來描述或解釋發生在遙遠國家的事件。

面對陌生的外國事務，「國際新聞馴化」(News domesticate) 是海外記者處理外國新聞時使用的策略，為了讓讀者更好理解陌生的外國事務，將國際新聞「本土化」並與國內建立連結，所進行新聞的重新建構 (Zhang & Zhang, 2018)。另外，因為地理、文化上先天的差異性，國際傳播的議題設定，往往受到鄰近性、重要性以及國際傳播流通的階層關係影響 (賴映潔、陳慧蓉、莊錦



農，2017），媒體組織傾向報導鄰近國家或是心理上具有連結的地區，如友邦國家。

常見的馴化模式包括下列四種：訴諸情感、消息來源傾向參考特定權威人士、將新聞故事個人化並賦予普世價值或國家意義、將新聞去繁從簡等，不同模式在報導的修辭技巧上有所不同，並影響記者在選擇消息來源、受訪者的策略。透過訪問民眾和現場狀況，將外國人「百姓化」；或是報導文化上相近「同胞」的事件等手法，可以增加讀者的帶入感。其他像是採用知名度高的政治領袖、官員也可以讓外國讀者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而最常見的手法是將外國新聞納入本國的新聞框架中，「讓遠在天邊的事情與讀者發生關係」（陳韜文等，2002，頁 19；Ji et al., 2024; Alasuutari et al. 2013, p. 699）。國際新聞比較難被理解，是因為讀者通常缺乏相關的背景知識。因此，記者如果能夠將國際事件與本國的參考框架掛鉤起來，將複雜的國際事件用本國讀者熟悉的語言和框架來表達，則能夠使得國際新聞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陳韜文等，2002，頁 10）。

舉例來說，在遙遠的國家發生核能事故，打開國內報紙，讀者看到的討論可能是關於國內能源政治和安全問題。事件對國內觀眾有意義並從國內觀眾的角度利用和評估的方式相比，向國內觀眾報導在另一個國家發生的事件的方式的偏見只是次要的 (Alasuutari et al., 2013, p. 693-694)。

## （二）國際新聞的新聞價值

透過回顧新聞實務中的新聞價值概念，可以更好的理解國際新聞的新聞實踐邏輯。Galtung 和 Ruge（1965）針對新聞價值的經典研究，檢視了外國新聞的報導框架，研究在危機時期剛果、古巴和塞普勒斯的不同新聞事件，如何影響四家挪威報紙的新聞內容，並探討哪些事件或因素具有成為新聞報導的新聞價值。Galtung 和 Ruge 提出了 12 個新聞價值因素（頁 65-71），如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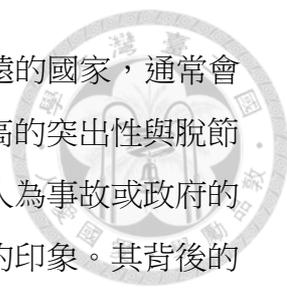
表 二-1 12 個新聞價值因素定義

<p>頻率 (Frequency)</p>	<p>牽涉時間跨度，突如其來的事件相較於社會上長期發生的事件更有可能被報導。漫長的事件經常被低估，除非它們出現戲劇性的高潮或轉折。</p>
-----------------------	---

閾值 (Threshold)	事件必須足夠重要，超過一定的閾值才被視為具有新聞價值。
清晰明確 (Unambiguity)	清晰、直接的故事比複雜或模稜兩可的故事更容易成為新聞，後者不太可能被報導。
富有意義 (Meaningfulness)	事件必須與受眾的文化背景有所關聯，因為這樣更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具有共鳴 (Consonance)	符合社會主流期望的事件更容易被關注和報導，相反的，異常或悖離主流價值觀的事件則可能會被忽略。
意外事件 (Unexpectedness)	令人驚訝或罕見的事件會引起更多關注，增加被報導的機會。
具有連續性 (Continuity)	一旦某個事件在新聞中確立，後續相關事件就更有可能被報導，從而維持現有的敘述，為讀者進行後續追蹤報導。
新聞構圖 (Composition)	新聞編輯會試著平衡新聞內容的組合，例如若已經有相當多的外國新聞，那麼想要再增加的外國新聞就必須滿足更高的報導門檻。
提及菁英國家 (Reference to Elite nations)	有關菁英、傑出國家的故事更有可能成為新聞。
與菁英人物有關 (Reference to elite people)	涉及知名人士的事件比關注普通人的事件更具新聞價值。
個人故事 (Reference to persons)	新聞報導傾向關注特定的個人，而不是社會結構或過程，普遍偏好個人的故事。
負面性新聞 (Reference to something negative)	負面事件往往會受到更多報導，這種對負面新聞的偏見增加了故事被報導的可能性。

上述十二項新聞價值條件並非獨立事件，一則事件滿足越多項新聞價值條件，就越容易被報導成為新聞；且被選中成為新聞的事件，會根據其具有的新聞價值因素，再更強化新聞價值報導，並可能導致事件扭曲失真；此外，研究中也提到，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也會導致事件扭曲，從記者、編輯臺等角色的選擇到讀者閱讀新聞的所有步驟，都會發生選擇所造成的扭曲，當這個過程越長，扭曲的程度就會越大。這些因素的累積效應是不容小覷的，也會產生新聞報導與真實世界脫節的狀況發生 (Galtung & Ruge, 1965, p. 71)。綜合上述新聞價值條件，Galtung & Ruge (1965) 進一步統整出幾個國際新聞的報導特色：

#### 1. 距離越遠，越容易造成失真



Galtung & Ruge (1965) 觀察到，媒體在報導距離讀者越遙遠的國家，通常會展現下述這些新聞報導的特質。第一，其事件內容必須表現更高的突出性與脫節性才有可能成為新聞，例如戰爭、造成嚴重傷亡的自然災害、人為事故或政府的更迭，然而單純報導這些重大事件，卻容易造成海外讀者錯誤的印象。其背後的成因是在新聞價值的報導邏輯下，媒體會選擇不去報導長期、緩慢、微小的變化，這些較小事件的累積就不容易被海外讀者所認識與了解，因此會有某國突然發生大事，政治更迭、嚴重社會事件突如其來且難以預料的印象。同時在報導方向上，尤其需要符合 (p. 81)。第二，正因為距離遙遠，所以報導更需要符合原先預期的模式與形象，才能更好的被讀者接收與理解，相反的，或有與預期情況背道而行的事件，較不容易被報導，反而被視為非典型、非常態事件，甚至是有虛假新聞、刻意操弄的嫌疑。然而這樣的策略所造成的就是，與自身越遙遠的國家，刻板的既有印象只會一再的強化，難以改變，同樣的脫離真實。

## 2. 邊陲國家與核心國家

在這個基礎上，越是邊陲的國家，新聞內容需要達成一致的傾向越顯著，例如開發中國家展現在媒體上的形象多會以破產、政治不穩定等不成熟的國家形象，為他國讀者所認識。另一個特質是來自越邊陲的國家，消息越是負面，研究顯示，國際新聞中，關於弱勢國家的報導絕大數是負面的，而正面新聞多發生在已開發的核心國家 (Galtung & Ruge, 1965, p. 81-82)。

## 3. 國家的等級越低，來自該國家的消息就越負面

當正面的新聞事情發生時，它多是發生在一個排名較高的國家；相反的，相對弱勢國家，新聞報導將絕大多數是負面的事件 (Galtung & Ruge, 1965, p. 82)。而排名較低的國家中，地位越高才越有機會被報導，這可能導致世界上處於弱勢的國家被極端菁英所統治，而普通民眾在外國讀者的新聞中根本不存在 (Galtung & Ruge, 1965, p. 82)。

## 4. 負面事件往往受到更多關注

從新聞產製邏輯來看，負面消息更容易取得大部分人的共識，對事件的負面解釋更能達成一致，因為正向的事件可能對某些人而言是正面的，但對其他人則不然，因此不符合明確性標準 (Galtung & Ruge, 1965, p. 69-70)



#### 5. 先前已經被報導，後續再報導較容易

一旦事件成功被報導，那新聞媒體將更容易以較低的閾值讓後續事件被報導，因為先前已經被報導了，即便後續發生的單一事件不足以滿足新聞價值的條件，仍然會以較低的閾值被刊登出來 (Galtung & Ruge, 1965, p. 81-82)。

### 三、國際新聞的批評

國際新聞被期待能夠反映這些相互聯繫以及當前國際社會的複雜性。過去受限於地理、時空條件，無法觸及到地球另一端生活的人們，如今藉由便捷的交通、網絡得以建立虛擬的跨國關係，透過國際傳播體系形成獲取外國新聞，建立跨國連結的可能性 (張春炎, 2017) (頁 148)。從正面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是一種民主、國際化的實踐，理想上也是如此，被賦予實現民主、公正、多元文化、道德和國際化高度期待 (Leuven & Berglez, 2016, p. 669; 李金銓, 1983, 頁 82-83)。但期待越高，失望也越高，現實是，國際新聞展現了諸多負面問題。

#### (一) 分配不均

「大多數美國人只在『發生重要或有趣的事情時』才會密切關注外國新聞」(Hamilton & Jenner, 2004)，在國際傳播的新聞格局中，不難發現有些地區的新聞明顯地比其他地區的報導更有吸引力，這也成為海外記者的佈局考量因素之一 (Hannerz, 2004, p. 84)。外國記者的分布仍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這些城市之間的距離相當遼闊，導致新聞報導的空白區域相當廣泛。因此，外國記者的地理分布呈現出明顯的集聚現象和地域差異，反映出國際新聞報導的複雜性和挑戰性 (Hannerz, 2004, p. 52)。

「瘋狂的記者一次又一次嘗試進入其他人正在離開的地方」是一類，在重大突發事件中，被派遣至事發地點的降落傘型記者；也有另一類是記者人數較多且數量穩定的地區，這些地區的共通點在於具有相當數量的有新聞價值的事件連續發生，記者可以快速的前往新聞地點 (Hannerz, 2004, p. 40)。

關於第二種類型的記者，Hannerz (2004) 的著作對其有詳盡的描述，研究顯示，海外記者的地理分布呈現出明顯的集聚現象。北大西洋周圍的地區，特別是歐洲的倫敦、巴黎、布魯塞爾、羅馬和維也納，德國的柏林，以及北美的紐約和華盛頓特區，成為外國記者的主要聚集地。這些城市的優勢在於其交通便利性、良好的空中交通網絡，以及舒適的生活環境，使其成為外國記者進行國際新聞報導的理想據點 (Hannerz, 2004, p. 50-55)。北美和歐洲的主要報紙也有一批常駐的外國記者，雖然規模不及大型新聞機構，例如，美國的《紐約時報》有約 40 名外國記者，分佈在 25 個分社；《洛杉磯時報》在 20 個分社也有 25 名記者；瑞士的《新蘇黎世報》有近 40 名記者，德國的《法蘭克福匯報》則有 50 多名；其他報紙如瑞典的《新聞日報》也在國外有十幾名記者；美國的《波士頓環球報》也有約六名記者分散在全球各地 (Hannerz, 2004, p. 50-55)。

在世界其他地區，亦有若干城市成為外國記者的重要據點。南美洲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里約熱內盧、中美洲的墨西哥城、非洲的約翰尼斯堡和開普敦、中東的耶路撒冷和開羅、南亞的德里、東南亞的曼谷、中國的北京或香港、日本的東京以及澳洲的雪梨等城市，均有相當數量的外國記者常駐。在亞洲地區，南亞可能不是外國記者最優先考慮的地方，儘管日本在世界舞臺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許多歐洲新聞組織發現，日本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據點，尤其是當與其他亞洲地區相比時。這可能是由於日本的文化和語言差異，或者是該地區的新聞環境不夠開放等原因。因此，外國記者在亞洲的分布可能會偏向於其他地區，例如東南亞的曼谷或中國的北京等城市 (Hannerz, 2004, p. 53)。

在香港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香港曾經是報導中國新聞的重要戰略選擇。後來隨著中國的開放和記者的駐紮北京，香港的角色逐漸減少，《紐約時報》在上海設立了分社，作為對北京和香港的補充，以因應中國報導日益重要的趨勢。對於那些想要報導東南亞地區的記者和媒體而言，馬尼拉曾經是東南亞記者的首選，但在前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的人民革命的戲劇性歲月結束後，菲律賓似乎不再那麼有趣。至於，新加坡則是一個地理位置優越、居住舒

適的地方，但新加坡政府對內進行較嚴格的新聞管控，只歡迎那些不報導新加坡本身的外國記者，許多記者和媒體轉向泰國曼谷作為報導基地。(Hannerz, 2004, p. 59-60)。

外國記者的聚集現象是新聞業的一個重要特徵。當外國記者執行長期任務時，不僅會聚集在世界上的特定城市，還會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地區。這些地區往往是新聞事件的熱點，記者們會在這裡設立辦事處、採訪和報導新聞 (Hannerz, 2004, p.61)。例如東京的澀谷區、紐約的曼哈頓區、倫敦的弗利特街區等，這種集中現象使得記者們經常會在同一地區內碰面，甚至是在同一條街上或同一棟樓裡。形成這種聚集現象的原因包括新聞機構的集中、記者的聚集和便利性。新聞機構會在同一地區設立辦事處，以便於採訪和報導新聞。記者們會被吸引到新聞景觀的熱點地區，以便於採訪和報導新聞。這些地區往往有良好的交通和通訊設施，使得記者們可以方便地進行採訪和報導新聞。媒體的聚集現象對國際新聞有著重要的影響，包括新聞報導的集中和新聞機構的競爭。記者們會在同一地區內報導新聞，使得新聞報導的內容和視角可能會有所重疊。在同一地區內競爭新聞資源和採訪機會，使得新聞業的競爭更加激烈。

總結而言，全球範圍內的思想傳播並不能抹平各國之間的差異，全球概念應該被批判性地檢視和理解，以避免簡單地跨越國家和文化邊界進行概括，而應該考慮其在地化的適用性和局限性 (Alasuutari et al., 2013, p. 695)。

## (二) 以西方世界為中心

跨國國際媒體在結構上展現相似的特徵，不論是影視、新聞媒體，皆是以寡頭壟斷的市場型態為主流，由先進的資本國家主宰主要市場，例如國際知名的通訊社便是以紐約（美聯社、合眾國際社）、倫敦（路透社）、巴黎（法新社）為基地，操縱全球國際新聞的採集與發佈（李金銓，1983，頁 88）。全球的國際新聞分配並非公平的，有些地方光是一個城市中就有上百名國際記者駐點，然而有些地方甚至是一整個國家卻只有少數幾位外國記者，而這些地區不可避免的是經歷發展較為落後、較為搖遠的國家 (Herbert, 2000, p. 2)。張春炎（2017）也批評，國際新聞多半受西方大國媒體所掌握，即便聲稱抱持客觀主義的新聞專業報

導，仍難以擺脫西方意識形態建立的霸權，舉例而言，相較於西方核心國家，邊陲國家只有在發生重大災難時才有機會受到國際媒體關注。

全球新聞格局的核心是以西歐和北美媒體機構為主導地位，這些機構的外國記者團規模遠遠大於其他地區，並且主要從事歐洲內部或北大西洋的內部事件報導。雖然有一些例外，例如日本的媒體組織，但整體而言，西方新聞媒體機構的影響力仍然遠遠超樂其他地區。這種結構是中心與外圍關係的結構，但中心不一定是所有事物的起源，更像是交會點，控制傳入和傳出的資訊流量 (Hannerz, 2004, p. 42)。即使是像 CNN 這樣的國際媒體，雖然它們的全球意識比其他地方性的媒體機構更強，但主要觀點仍然受到其主要市場——北美和西歐的影響，仍然以西方社會的文化和政治關懷來看待世界的。CNN 的報導中，來自第二和第三世界的觀點相對不受重視。CNN 世界報導的編輯們自己也承認，如果說自己完全不帶觀點那是誠實的話，那就是「不誠實的」(Flourney, 1992:23)。這表明，即使是國際媒體，也難免受到其主要市場和文化背景的影響，難以完全客觀地報導世界事務 (陳韜文等, 2002, 頁 12)。

Galtung & Ruge (1965) 進一步分析這個現象，國際新聞的世界將國家分層為「上位者」(topdog) 和「下位者」(underdog) 國家，而分別屬於上位者或下位者的國家，可以從外國派駐記者的數量差異看出差別，這同時也顯示著國際媒體對於該國事物的重視程度。掌握全球資訊流通的西方主流媒體，對於邊陲的第三世界國家，會以特定的框架，偏頗的方式再現，並傳遞符合西方主流的意識形態 (李金銓, 1983)。涉及邊陲國家的新聞事件，經常可以發現國際媒體以混亂、落後等負面論述再現 (Joye, 2010)，國際新聞中的當地和全球現實仍不可避免的屬於脫節狀態 (Yell, 2012)。

國際新聞報導中，看見的是事實往往不只有一個，來自各國的不同觀點詮釋同一個新聞事件 (Herbert, 2000, p.2)。學者 Herbert (2000) 曾批判國際報導，指出國際新聞通常涉及重大災難，且經常更重視政治衝突而非經濟、文化連結，他認為，國際報導應該要能做到讓外界了解一個國家的人民，而不只是關注災難和戰爭 (Herbert, 2000, p. 1-2)。Sorokina (2017) 針對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的美國報導進行分析，作者提出的研究假設為，分析媒體報導內容的可能會揭露當前世界秩序的主導意識型態，以及新聞文本被用於鞏固與濫用權力和方式 (p. 172)。研究結果顯示，在克里米亞危機中，當事者克里米亞與烏克蘭反而是最沒有發言

權的那一方 (p. 177)，反而是俄羅斯、美國這些更強大的國家掌握了話語權 (p. 169)這篇研究證實了新聞文本透過定位客體與主體建構出新的關係，凸顯了部分參與者，同時削弱其他參與者的重要性 (p. 178)。

總結來說，全球新聞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化的意識和認識，但同時也反映了民族國家體系的影響。傳遞外國新聞的方式往往延續了傳統的民族秩序，將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從而影響我們對全球事件的認知和理解。這種現象表明，即使全球新聞的傳播使我們更加意識到全球化的趨勢，但新聞的呈現方式仍然受到民族國家體系的影響和限制 (Alasuutari et al., 2013, p. 696)

### (三) (似乎是) 無可避免的失真

Hannerz (2004) 分析，國際新聞對於各個地區的報導，很大程度是以一種機會主義、資訊娛樂導向的新聞觀點，作為國內硬新聞的補充 (p.36-37)，而不總是也不可能反映世界真實狀況。國際新聞呈現與現實世界的落差感，反映在新聞選擇的過程中。就像一般新聞報導一樣，國際新聞也受到新聞價值判斷的影響，決定了哪些事件被呈現給讀者。舉例來說，報導天災的數量往往取決於死亡人數，而非天災的規模，這意味著即使是規模較大的天災，如果傷亡人數不多，也可能不會被廣泛報導 (Herbert, 2000, p. 1)。

國際新聞報導也可能呈現偏見，媒介意識形態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遠大於同一國家內部的差異。新聞的製作過程涉及資訊的選擇和特定意義框架的使用，而國際新聞往往是從本國的角度出發進行定義，與該國的國際政經關係、主流意識形態、文化符號以及權威結構密切相關。這意味著，國際新聞所顯示的意識形態往往比國內新聞所顯示的更為狹窄和單一，呈現出被馴化的特徵 (陳韜文等，2002，頁 20)。尤其馴化過程中，對於外交事務簡化處理、缺乏深度與複雜性，可能會導致外國讀者形成過度平面、單一的印象和成見，尤其是受到多國媒體所依賴的大型西方媒體 (如 CNN, 美聯社等)，其議題的單面性與重複性的效果更是加成的 (Sorokina, 2017, p. 180)。此外，若報導中的國家立場與所涉外國事件的相關性密切相關，當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時，新聞報導就越容易出現偏見。當外國新聞被視為與記者自己的國家無關時，報導呈現相對的客觀和中立的分析立場；相反的說，當新聞被視為與記者自己的國家相關時，記者的專業實

踐就會受到國家忠誠的影響，導致報導出現偏見 (Alasuutari et al., 2013, p. 693)。

舉例來說，加拿大和澳洲的傳媒在報導香港問題時，呈現出傾向獨立的外交姿態，同時也關注香港未來的民主和自由，與英美傳媒的報導方向同步；另一方面，日本傳媒的報導則側重於香港和中國的經濟發展，而非民主問題。這些報導主題的差異性，恰恰反映了各國的外交路線、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顯示國際馴化的基礎依據 (陳韜文等，2002，頁 20)。

與傳統的新聞形式相比，有學者認為，國際新聞應該被視為新聞說故事的一種形式，並與傳統新聞共存或嵌入其中，一則新聞事件需要從本地、國家、外國或全球的角度來報導，但更好的方法是將這些不同的觀點結合在同一個新聞故事中。即使從這個的角度來看，目前的國際傳播仍然有改進的空間 (Leuven & Berglez, 2016, p. 680-681)。

接下來的幾章將會對媒體組織的時間和空間承諾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包括媒體組織如何選擇報導的內容和角度，如何安排自己的時間和空間資源，如何應對讀者的需求和期望等。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會對於我們理解媒體報導對讀者世界形象的塑造作用產生重要的影響。

## 第二節 記者與新聞產製

記者專業價值、角色認知和意圖影響新聞產製，但制度、組織環境規範了哪些記者可以自由決定故事切角、使用哪些消息來源、採用什麼敘事架構，影響的常規層面和組織層面，同樣也極大地影響了記者的新聞報導和詮釋 (Zhang & Zhang, 2018; Obijiofor & Oelgemoeller, 2023)。Zamith (2022, 87) 也強調社會、經濟、政治和技術系統層面對新聞工作者的影響，這反過來又影響記者的工作和他們產生的新聞產品 (Shoemaker 和 Reese (2014))。

### 一、國際新聞記者特殊的新聞工作模式

以傳統駐外記者為例，儘管工作場合身處國外，駐外記者仍隸屬於自家媒體組織，並且遵守自家媒體的組織規範，與一般的勞動者相比，新聞記者因採訪時間、地點的不確定性，再加上新聞工作本身的複雜、特殊性，為一種更高度變動

的勞動生活以及生產過程（蔡惠鈞，2009）。過去許多研究關注記者的勞動過程（吳育仁，2011；林淳華，1996；蔡惠鈞，2009；羅彥傑等，2010），不管是產製流程抑或是獎賞懲罰，很難以清楚、明確的制度進行規範，因此在實務上，普遍仍會回歸老闆或主管的對於規範的既定詮釋（張文強，2009），進而衍生出新聞工作者對於組織控制的各式抵抗方式。但這些研究卻鮮少針對國際新聞記者這樣的多元新聞生態進行探討，相較於國內的媒體環境，國際新聞記者的工作環境更加複雜及多變，需同時面對來自各方的控制影響因素，並即時的調整與適應以完成採訪工作。

## 二、影響層次模式理論

這裡將採用學者 Reese (2001) 提出的「影響層次模式」(Hierarchy of Influences Model) 進行分析，該理論將塑造媒體訊息的各方因素氛圍五個分析層級：個人、常規、組織、媒體外部和意識形態。個人層級著重於記者的個人特徵，包括工作態度、訓練和背景；常規層級檢視指導記者工作的結構化實務和規範，同時被視為新聞產製的限制與推進因素；組織層面著重於媒體組織的目標、政策和內部動態，評估這些要素如何影響新聞產出和行為；媒體外部面則考慮來自媒體組織外部的影響，例如廣告商、政府法規和公共關係等媒體外部力量在塑造新聞內容方面所發揮的重要影響；意識形態層面評估媒體內容如何服膺於更廣泛的社會利益和意識形態，強調媒體充當促進社會內特定權力動態的方式。

### （一）個人

新聞工作時常牽涉記者個人身份，記者來自的國家、甚至所服務的媒體都會影響其新聞工作的進行，許多研究也指出，因國情不同，在國外取得消息、資源遠比在國內困難許多 (Hess, 2005; Willnat, 2012)。對此，Hess (2005) 更清楚指出，高達 6 成的駐美駐外記者都遭遇資源取得的問題，原因是這些在美國跑新聞的外國記者，並非隸屬於美國當地的媒體，且獲取新聞資訊、找到受訪者的難易也很大程度取決於時期、議題以及記者所代表的媒體機構。



因為記者個人身份而造成的採訪影響，案例不勝枚舉：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半島電視臺 (Al Jazeera) 駐外記者 Abderrahim Foukara 表示，2011 年美國發生 911 攻擊事件時，美國官員普遍積極接受他與同事的訪問，並對各項相關議題解釋自身觀點；駐美瑞典駐外記者 Karin Henriksson 也表示，許多外國駐外記者的重要程度甚至是低於當地的廣播電臺的 (Hess, 2005)；中國駐美駐外記者唐家婕也指出，外籍記者在美國採訪，沒有白宮故地記者通行證，不但需要提前申請，還必須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移動，也經常遭遇卡關的情形，甚至在白宮記者室中僅有如 NBC、FOX、CBS、AP、ABC、CNN、路透社等知名媒體的座位，其他記者只能擠在走道上 (唐家婕，2017)；針對駐非洲奈及利亞的外國記者，Obijiofor & Oelgemoeller (2023) 的研究指出，獲得新聞資訊和接觸國家官員往往受到性別、種族和膚色的影響，其中受訪記者 Anthony Diri 表示，「當走進官員辦公室，若你是白人，則連部長都會在門口迎接你，但若你是一名黑人，幾乎沒有人會注意到你」(頁 6)。

此外，記者的角色認知也會影響新聞工作，Zhang & Zhang (2018) 研究中國駐外記者，也表示中國駐外記者的角色複雜，需同時扮演著宣傳員、資訊收集員和文化外交官，對外宣傳中國的內外政策；Michailidou & Trenz (2021) 亦指出，歐盟駐外記者有時會出現角色混淆的問題，在歐盟民主的促進者以及各別國家民主捍衛者之間搖擺。臺灣駐外記者冷若水 (1993) 也在自傳中提及，臺灣人的身份導致他在處理中美關係相關報導時，難免脫離記者的客觀立場，面對國家的重大難題，仍有意使用特定的報導框架撰寫新聞。

Hannerz (2004) 指出，「新聞流建立的知識和情感之間也經常存在相互作用」，媒體記者的個人自身經驗也是影響報導的一環，他解釋，外國新聞可以沿著地理、個體兩個維度嵌入讀者對世界的整體理解，換句話說，有些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對這個地區的相關個人經驗，或是有更多了解，對產生新聞的記者抑或是接收資訊的讀者，都會行程對新聞事件不同的理解程度 (Hannerz, 2004, p. 36-37)。因此，我們對全球不同地區的熟悉程度和感覺賓至如歸的程度可能會有很大的差異。在某些地區，新聞報導可能會與當地的文化、歷史和社會背景緊密結合，形成一個更為豐富和複雜的知識體系。而在其他地區，新聞報導可能只會提供表面的、片面的資訊，讓讀者的知識和理解局限於媒體的框架之內。在後一種情況下，媒體報導對讀者的世界形象的塑造作用就變得非常重要。媒體報導的質

量和深度直接影響著讀者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因此，媒體組織如何安排自己的時間和空間承諾，如何選擇報導的內容和角度，對於讀者的世界形象的塑造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Hannerz, 2004, p. 37-38)。



## (二) 常規

新聞常規是由媒體組織及其成員共同運作所形成之共同默契，無形中引導了記者的日常新聞實作 (劉蕙苓, 2022, 頁 172)。對於海外記者來說，他們已經將媒體組織和本國文化對於外國事務的框架內化，從而使得他們在執行新聞任務時能夠自然地運用這些框架，而不需要刻意地考慮專業的標準和價值觀 (陳韜文等, 2002, 頁 8)。根據 Hannerz (2004) 研究，受訪記者 Sommer 認為，當一個人缺乏特定的地方歸屬感時，尤其是降落傘記者，採用根深蒂固的慣例是極為有用的 (Hannerz, 2004, p. 81)。這些常規慣例包括新聞價值判斷、新聞採訪、資訊來源以及數位工具的應用。記者的常規包括各種日常工作，例如新聞價值判斷、新聞採訪、資訊來源以及數位工具的應用。其中，海外記者身處異國，人脈的建立便是一大難題，由於記者沒辦法像國內記者固定跑線 (冷若水, 1993, 頁 205)，而是需要與各式各樣的消息來源互動，不僅考驗記者功力，也連帶影響選題、新聞走向的一大關鍵。翁琬柔 (2019) 在書中就曾多次提及國外的專題是經由舊識完成報導，或是透過街訪，在街上不經意的遇到合適的採訪對象完成報導，較難掌控報導的走向，事前也不容易確保新聞題材內容，充滿許多突發狀況。

其他日常工作上的困難也包括時差、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問題。Hess (2005) 觀察到駐外記者與新聞編輯跨國工作的時間問題，他的研究指出時差、工作時數對新聞工作的影響，接受採訪的駐外記者 Dubravka Savic 表示，「時間的差異」是工作最困難之處。為了配合母國與當地的新聞時差，駐外記者可能過著日夜顛倒的生活，以趕上母國的即時新聞；另一位日本駐外記者 Takeshi Yamashita 的工作狀況也顯現了這一點，為了趕上日本當地的晨間新聞，他經常在半夜工作，也時常在凌晨接到編輯要求報導的電話。此外，在國外的駐外記者鮮少有自己的辦公室，呈現住家與工作區域界線逐漸模糊的情形。



### (三) 組織

學者吳育仁(2011)引用社會學家 Burawoy 的勞動理論，指出工人是被嵌入勞動過程中的獨立個體，勞工自主同意參與這個趕工遊戲，在遊戲中激發鬥志，並提供勞工「自我表現」的機會，帶來成就的愉悅感，對應到記者的勞動過程，記者作為勞工，出賣勞動力(寫稿、採訪能力)換取薪資，報老闆(雇主、資本家)則控制了新聞生產工具，透過系統化的管理機制，形成記者勞動的三個重要特徵：不規則的隱形工作時間表內化、勞動空間的控制和監視意涵、結構性矛盾的生產社會關係。例如新聞記者的「責任政治」，如面臨突發事件需立即前往採訪等，無形中內化為記者人格的一部分，形成內化的「不規則隱形工作時間表」，一有重大新聞，便需要持續追蹤關注，即使當下並非上班時間；而勞動空間的控制與監視意涵，指的是報社透明、穿透性的辦公室設計，低矮的隔板，讓記者之間可以隨時觀看彼此正在做什麼，進而達成互相監督、自我監督的效果。受益於科技便利，記者上稿、發稿、編輯時間都被即時、透明的公開，透過網路、科技產品強化勞動職場中的監督與控制；而記者在同業間也會面臨結構性矛盾的生產社會關係，例如追求獨家新聞、比報制度，反應了 Burawoy 所提出的「趕工遊戲」邏輯，透過與同業、同事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追求個人工作能力的表現機會。在這樣的勞動過程之中，記者透過時間偷渡、小團體的行程、結盟與資源共享、個人利益以及虛擬自由意識進行抵抗並展現主體性(吳育仁，2011)。

另一篇針對國際新聞編譯記者的研究(羅彥傑等，2010)指出，國際中心的科層化程度低，因人數少、進入門檻高，相較其他組別呈現更為扁平化的組織樣貌，國際中心的主管經常需身兼多職，直接掌握新聞內容以及方向，並導致底下編譯受到組織規訓程度較高，也更容易受到上面主管的個人管理風格所影響專業自主程度。經由訪談國內多位資深編譯，該研究發現，新聞產製流程的決定權仍由組織本身所掌控，當中隱含權力控制關係，雇主透過誘之以利、脅之以災(訓之以懲罰)的方式，例如獎金、額外稿費以及人事考核、獎懲令等方式鼓勵編譯按照組織要求進行撰稿。當中也提及編譯與編輯之間的微妙關係，指出臺灣媒體採「編採分離」的制度，影響編譯在決定新聞版面重點和內容取材的自主性。此外，由於編譯工作涉及專業的翻譯能力，根據編譯的自身工作能力，也呈現「明

星編譯」的勞動特色，資深的明星編譯享有更高的翻譯自主權，並可以對於新聞內容的取材、取捨有更大的決定權。訪談結果指出，不論資深與否，編譯皆無法決定寫稿時間以及寫稿量。尤其是處理特稿時，由於不需進行採訪，僅透過綜合不同新聞來源加以整理、撰寫，報老闆更能藉此以自家立場進行報導，遇到報老闆施加的壓力，編譯通常只能選擇照辦，淪為其附庸關係。

學者蔡惠鈞（2009）則是分析新聞記者與資方的勞動互動過程以及探討記者如何展現其主體性。透過訪談，分析整理出新聞記者的勞動生產過程，研究指出採訪工作呈現例行化特色，將記者收編於有系統的勞動機制，透過固定的交稿、截稿時間，讓原先不規則的工作時間產生規律性。此外，由於記者工作的責任制與承諾，無法如傳統勞工擁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安排，而是經由完成固定的新聞量或受特定新聞採訪時間所支配工作時長。研究強調，通訊科技成為全天候的綿密控制網，即便是放假時間也需要讓人找得到你，若有重大新聞，不管身處多遠都要即刻上線；從空間安排的角度，即便可以透過遠端完成作業，仍需要回到辦公室、辦事處，仍服膺於傳統的集中空間管理方式。面對組織控制，記者也發展出勞動時間偷渡、形成小團體、同業結盟與資源共享、輪流獨家以及有線產出等方式進行抵抗。

再進一步討論記者的「自主性」，學術界針對記者的報導自主，有一系列關於「新聞專業自主性」研究。由於新聞工作的多變性與特殊性，以傳統專業（如醫師、律師等）的專業性衡量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性並不適合，也很難符合傳統的標準（羅文輝，1998），因此許多學者試圖以量化的方式衡量記者的專業性。

Nayman（1973）提出專業行為的 4 個特性：專業知識（Expertise）、自主性（Autonomy）、承諾（Commitment）和責任（Responsibility），其中值得關注的是關於「自主性」的意涵，包括能夠行使自己的判斷自由、發展廣泛綜合的自治組織以及肩負責任或在沒有上級授權或指導的情況下行事的能力。記者的專業自主權意涵也包括：幾乎總是能採訪他們認為應該採訪的新聞、選擇新聞素材上擁有近乎完全的自由、決定一則新聞應以哪些層面為重點上擁有近乎完全的自由、所報導的新聞沒有受到其他人編輯修改（Weaver & Wilhoit, 1991）。另也有學者進一步將自主權再區分為「採訪自主權」與「報導自主權」，其中採訪自主權包括：自由選擇報導主題、選擇採訪對象、決定採訪問題及內容；報導自主權：自由決定報導重點、選擇報導的立場或角度、決定發稿時間、決定發稿量、新聞組

織不得因商業或政治考量而刪改新聞稿，以致扭曲新聞原意。（林淳華，1996）。

羅文輝（1998）則提出專業性的概念架構，將專業性分為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承諾以及專業責任四項，並將專業自主再區分為內在自主以及外在自主兩個面向，分別指工作獨立自主、不受組織內影響以及組織外影響。其分類指標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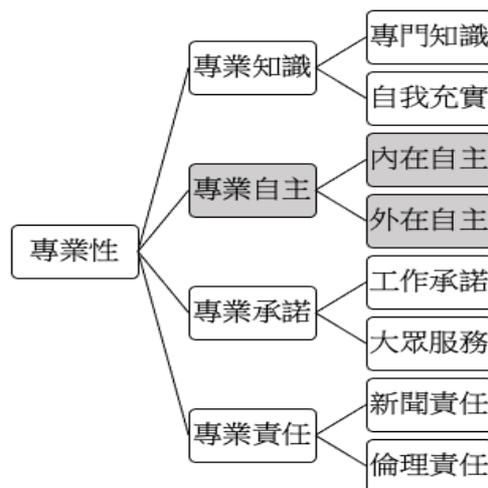


圖 二-1 記者專業概念架構

本研究主要參考其中的專業自主概念，專業自主概念可以再細分為內在自主以及外在自主，評估項目取決於主管、編輯所下的任務指示，再延伸到記者應採取的行動，其專業自主評估項目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二-2 記者專業自主評估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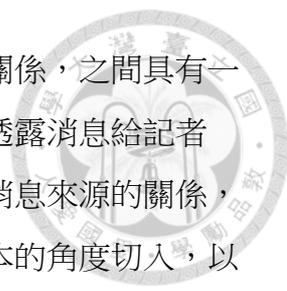
自主類別	評估項目	記者行動
內在自主	不同意編輯政策	應配合或堅持專業判斷
	主管建議採訪不適當對象	應拒絕
	主管要求特定新聞角度	應拒絕不當引導
	主管建議報導不宜新聞	應拒絕
	主管要求批評特定對象	應拒絕
	主管要求淡化處理新聞	應堅持報導完整性
外在自主	重要消息來源不利的報導	可適度淡化維持合作關係
	影響廣告客戶的報導	可適度淡化以保護收入
	不利政府的報導	可適度淡化維護政府形象
	不利國家元首的報導	可適度淡化避免爭議

以上針對記者的專業自主性評估，同樣可以對應到在海外工作的國際記者身上，針對國際記者與組織關係，一篇海外記者與資深編輯的研究 (Obijiofor & Oelgemoeller, 2023) 談到新聞機構總部的資深編輯與海外記者的敏感關係。研究中受訪記者表示，經常收到關於新聞報導的類型以及撰寫角度的指示；另有駐非洲記者表示，編輯臺指向要得到特定的負面消息；也有記者分享，作為海外記者交出一篇報導，但總是有更高層的人可以扭曲故事走向，加入偏見（第 9-10 頁）。另外也會面臨編輯對於報導不感興趣的情況，記者經常面臨內容與市場的挑戰，在編輯的壓力下，轉向報導具有收視、流量的新聞內容。

#### （四）媒體外部

媒體組織外部則涉及採訪工作，國際新聞記者的工作量繁雜，經常需要一人分飾多角，不同於國內記者的分線工作模式，經常是一人須負責所有的新聞類型，進而需與各類消息來源打交道。

關於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兩者本身即存在著一種矛盾，傳統的新聞教育上認為，記者應與消息來源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涉入太深影響新聞的中立客觀性，但另一方面，記者又得透過建立人脈以取得更多消息，建立在此邏輯上，羅玉潔、張錦華（2006）分析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關係，研究結果指出，能夠



提供重要的內幕消息的來源，多數是與記者保持「強連帶」的關係，之間具有一定的信任前提，然而同時隱含高風險以及高成本。消息來源在透露消息給記者時，往往背負受原組織懲罰的風險，然而對記者而言，維繫與消息來源的關係，同樣需付出高額時間、人力成本。陳雅惠（2021）則從社會資本的角度切入，以社會資本交換概念分析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情形，雖然該研究著重傳播工具與消息來源的建立，但在工具背後所產生的人際交流，當中提及華人社會人情面子與關係的理論面向卻是研究臺灣記者人際脈絡相當重要的一環。黃彥翔（2008）的研究同樣針對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指出，由於消息來源掌握重要內幕或擁有較高的壓制性權力，記者在處理其相關新聞時，多會額外謹慎，非必要不會輕易得罪，重視「給對方面子」以維繫良好互動關係。

在實務工作上，國內不同線路的記者有不同新聞的跑法，也有各自建立人脈的管道，而駐外記者隻身前往國外，缺少組織的實體庇護，是如何建立人脈？

Zhang & Zhang (2018) 以中國駐外記者為研究對象，指出新聞來源對沒有長久當地生活經驗的駐外記者而研尤為重要，並分析駐外記者取得消息來源可能會碰到的阻礙，如：缺乏獲取消息來源管道、文化障礙、國家刻板印象以及缺乏組織的支持等，研究中更指出，與擁有豐富人脈資源、與各國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的西方媒體相比，「華文媒體在尋求採訪機會時不具有任何優勢。」值得注意的是，這篇研究以中國駐外記者為主，換作其他國家，或者是臺灣的駐外記者，其處境可能完全不同，這裡也再次呈現出駐外記者與其母國的密切相關程度，並以此顯示針對臺灣駐外記者的研究為何具有學術價值。

另外，政治、國際局勢的影響也影響著記者工作，不同國家對於新聞媒體的控制是影響新聞環境自由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介入的手段包括針對可能傷及國家或政府形象的新聞報導，要求媒體淡化或禁止刊登。例如，王毓莉（2012）的研究指出，中國當局對於地方媒體的新聞控制，中國政府以政治力量試圖影響新聞業的運作，以中央集權的方式，透過各級黨委直接影響媒體所發佈的新聞內容，媒體則受到中央與地方政府雙重權力控制。

身處不同的媒體環境，記者會衍伸出相對應的抗爭策略，首先是因政府管制時鬆時嚴，記者會透過等待合適報導時機、見縫插針偷渡報導、迅速出稿減少權力反應時間以及隱藏文本將新聞排在不起眼的版面位置以躲避官方審查；而記者也會藉由隱匿、轉換消息來源等策略轉移報導責任，避免惹禍上身；在寫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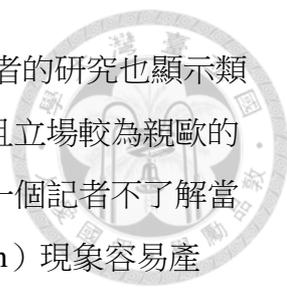
記者會有技巧地以報導事實策略，如強調新聞事實、使用模稜兩可的春秋筆法報導，弱化新聞批判的力道以求自保（陳順孝，2003）。



### （五）意識形態

雖然外國記者的身份可能在參與記者活動時偶爾會有所限制，但外國記者所具備的文化背景、主觀因素正在形塑當今的國際新聞文化 (Hellmueller 2014)。Zhang & Zhang (2018) 的研究中，一位匿名的中國駐外記者提到，不論為哪個機構工作，都會受到本國的外交政策影響，甚至影響寫作方式以及內容，有些事情記者不敢寫；國家間的差異也呈現在媒體環境中，臺灣駐外記者冷若水曾分別在泰國、美國駐點，他指出，泰國政府不主動發布新聞，當地記者多是以私人關係獲取消息，相反的，美國政治圈則習慣主動向記者提供新聞，許多重要消息都是先透過記者發布的（冷若水，1993）。但另一方面，記者也需要小心為政界人士所利用，媒體生態、消息來源不同，即是考驗記者的辨別、適應能力。因應不同國情，採訪的方式也會有所差異，例如臺灣記者翁琬柔曾多次外派，她在書中提及，日本人注重隱私，不像臺灣可以很輕易的找到願意受訪的對象（翁琬柔，2019）。徐小鴿（2010）則研究新加坡媒體環境，指出新加坡政府的務實媒體制策被應用於管理電視頻道，意即媒體的管理發展與多元語言取向緊密聯合，透過媒體所報導的新聞，建立政治穩定以及種族和諧。正因如此，研究結果顯示，在處理國際新聞時，若涉及敏感議題，例如國際關係、宗教、民主自由等，即便是不同語言頻道的電視新聞，其報導皆傾向與政府的立場、政策維持一致。媒體藉由組織內的自律、自我審查，以保護自身不受政府制裁和打壓。

媒體機構文化層面，由於駐外記者和編輯所處的位置不同，記者傾向於報導在現場看到、聽到的內容，而編輯則是要確保新聞符合政府方針以及機構的編輯政策，兩個角色之間產生衝突是家常便飯 (Zhang & Zhang, 2018)。Hess (2005) 的調查指出，根據他採訪駐外記者，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新聞內容是由媒體總部要求的特定主題，約有三分之二會在寫作前與編輯共同討論，而有約一半的報導是在完成後才與總部編輯進行討論。除此之外，長期駐外記者的輪調系統也值得關注，媒體組織會透過輪轉制度，設定一個固定的派駐期限。避免讓同一記者因過於熟悉特定國家文化，而導致新聞價值觀扭曲或轉變 (Fontan, V., & Palmer, J.,



2007), 關於這點, Michailidou & Trenz (2021) 針對歐盟駐外記者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情況, 指出在歐盟長期駐點的記者, 多會呈現較社會化, 且立場較為親歐的型態, 而短期駐點的記者, 對歐盟政策則會有較多的批判。當一個記者不了解當地國家、文化、人民時, 就會導致新聞操縱 (News manipulation) 現象容易產生, 國際新聞的實踐關鍵在於不要太依賴官方消息來源 (Herbert, 2000, p. 3)。

研究將以影響層次模式作為核心分析框架, 系統性的探討外媒記者如何在個人層次、組織層次與外部環境等多層次影響下, 形塑其新聞實踐。例如, 個人層次涉及記者的語言能力、文化背景與專業素養。這些因素影響其在臺灣議題中的切入點與報導深度; 組織層次則著重編輯政策、媒體定位與資源分配, 探討記者的選題自由與這些結構性因素的關聯; 而外部環境層次, 包括臺灣的地緣政治地位、新聞自由環境與國際受眾需求, 進一步決定了外媒如何建構其報導框架。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一、研究樣本選擇

綜合上述時代的轉變，有學者引用「堡壘新聞綜合症」，表示在媒體快速變動的今日，已經不能再按照昔日的方法進行駐外記者的研究，僅統計傳統新聞媒體的駐外記者數量已經失準 (Hamilton & Eric Jenner, 2003, p. 5)。因此在本研究中，除了傳統的駐外記者外，更納入了外國記者 (Foreign foreign correspondent)、在地新聞嚮導以及 freelancer 各種多元角色。實際進入訪談後發現，今日進行在臺灣進行採訪活動的外媒記者，一個人可能擔任多項角色，包括記者、研究者、在地新聞嚮導等多重工作內容，無法像過去研究嚴謹的將記者的角色分類。本研究將建立「在臺外媒生態圈」的概念，試圖更全面的分析在臺外媒的活動情形，並探討當中的互動與牽制所構成的動態網絡。此外，受訪者名單也依據臺灣籍與否劃分出兩種不同身份：「駐臺外籍」以及「外媒臺人」，駐臺外籍指的是本身國籍為非臺灣籍的外國人，而外媒臺人則是指在外媒工作的臺灣人，且主要負責的新聞以及駐點地區也以臺灣為主。

表 三-1 受訪者名單

身份	職稱	代號
外媒臺人	Researcher/ Reporter	TR1
外媒臺人	Reporter	TR2
外媒臺人	Fixer	FX1
外媒臺人	Reporter	TR3
外媒臺人	Reporter	TR4
外媒臺人	Researcher/ Reporter	TR5
外媒臺人	Fixer	FX2
駐臺外籍	Correspondent	FC1
駐臺外籍	Freelance Correspondent	FL1
駐臺外籍	Freelancer	FL2
駐臺外籍	Freelancer	FL3
駐臺外籍	Correspondent	FC2

駐臺外籍	Freelancer	FL4
------	------------	-----



## 二、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作為主要資料蒐集方式，輔以文件分析，從影響層次理論探討外媒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實踐過程與其報導框架的形成機制。研究重點放在記者個人層次的背景與實踐、媒體組織結構與規範，以及地緣政治與臺灣媒體環境的外部因素，藉此分析國際媒體如何在臺灣進行議題選擇與新聞生產。透過影響層次模式的分析，試圖揭示外媒在臺灣的新聞實踐如何受到多重力量的交互影響，也希望探索記者在多層次制約下可能產生的抵抗與調適策略。這一視角有助於更全面地理解外媒在臺灣的角色與運作邏輯，特別是在國際媒體競爭加劇與全球議題多元化的當下，提供對外媒報導行為與影響力的新解釋。此外，這一框架為檢視國際新聞在地化與框架多元化的實現可能性，提供了實務與理論層面的啟示。

本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為訪談 13 位在臺的外媒記者，在研究樣本的選擇上，以深入探索駐臺外籍記者的實際工作經驗與新聞實踐為核心，希望能充分反映了當前外媒生態圈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在外媒駐點環境日益動態化的背景下，傳統意義上的特派員已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角色多元且職責交疊的記者群體。因此，本研究在樣本選擇上不僅涵蓋了全職特派員 (Foreign Correspondents)，也包括自由記者 (Freelancers)、在地新聞嚮導 (fixer) 以及在外媒工作的臺灣籍新聞工作者。然而這樣的分類，也難以清楚的定義今日外媒記者的角色，某些記者可能既要處理撰稿也要負責攝影，部分自由記者還需承接多家媒體的委託，靈活切換於不同媒體的報導風格之間。這種一人多職的現象，反映了當前媒體經營壓力下，外派記者的專業角色已不再是單一職能，而是融入了更多層次、更全方位的任務需求。

此外，隨著全球媒體市場的變化和臺灣逐漸成為外媒報導的中繼站，受訪樣本亦反映了記者來源的多元性，除了純粹來臺報導的外媒記者，也包括受到中國媒體管制影響而轉駐臺灣的駐華記者。這些記者的背景既包含了長期駐點於臺灣的資深記者，也涵蓋了短期停留的流動記者，進一步體現出臺灣外媒生態圈的動態屬性。



選擇這些樣本的另一原因，是希望捕捉在不同媒體角色、不同國籍與文化背景下，記者如何對臺灣議題進行報導的異同。例如，全職特派員多能深入挖掘臺灣政治與經濟議題，探索地方性與國際性之間的張力；自由記者則傾向於靈活報導當下最具新聞價值的事件，往往需要即時切換多種報導視角；臺灣籍外媒記者則常在編輯需求與個人對臺灣的深層了解之間尋求平衡。

受訪者的選取採用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考量其駐臺時間長短、主要報導議題以及所屬媒體組織的特性，以反映外媒在臺灣的多樣性。訪談問題聚焦於記者的日常工作經驗、消息來源、編輯互動、選題考量，以及其對臺灣媒體環境與文化的觀察與評價。訪談全程以半結構式問題進行，讓受訪者能自由分享自身經驗，同時也確保研究主題得以有系統地涵蓋。針對部分外國受訪者的英文訪談內容，本研究也採取嚴謹的處理與分析方式。訪談錄音將完整轉錄為文字檔，英文內容以原文形式記錄，避免初次翻譯造成語意偏差。隨後，研究者將訪談內容翻譯成中文，翻譯過程強調語意忠實與文化脈絡的準確性，並邀請中英雙語專業人士進行校對，必要時與受訪者確認語意，以確保翻譯的準確性。在分析階段，中文翻譯稿與英文原文將同步參考，確保翻譯與分析過程的準確性與可信度。此方法旨在減少語言轉換對研究結果的影響，並確保外國受訪者的觀點能如實呈現於研究中。

此外，為補充訪談資料的背景脈絡，本研究蒐集與分析相關媒體報導、學術文獻與政策文件，包括國內外媒體對臺灣新聞的報導內容、媒體組織的內部指導原則，以及臺灣政府機關對外媒的政策與措施。透過文件分析，本研究得以驗證訪談內容，並探索更廣泛的媒體運作與政策背景。研究資料分析採用主題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對訪談逐字稿與相關文件進行編碼與歸納，針對個人層次（語言能力、記者背景與興趣）、常規層次（消息來源與操作規範）、組織層次（編輯互動與選題機制）、外部環境層次（媒體文化與政府互動）以及意識形態層次進行系統性分析。研究過程關注這些層次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其對外媒報導內容的影響。

## 第四章 研究分析



### 第一節 臺灣外媒生態圈

從早期研究顯示，過去到現在，國際媒體並沒有將臺灣視為重要的新聞據點，張虹梅（2004）指出，「最直接就反映在人力的派駐上」。即使為「駐華記者」角色，也多將辦公室、基地設於其他亞洲國家，而非臺北。關於臺灣事務，外媒普遍以特約記者發布臺灣新聞，而非使用高成本特派員常駐臺灣，即便人在臺灣，關切的新聞重點仍是與中國的互動，「其次才是臺灣重大突發事件、政治或經濟議題」。且派駐臺灣的記者人力精簡，多為一人作業，需要應付臺灣的各種即時新聞，導致許多駐臺記者「追著新聞跑」的情境，高度依賴臺灣國內的媒體（張虹梅，2004）。

然而這樣的情形在 2019 年前後發生變化，因為香港反送中事件「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的論述，吸引許多外媒關注臺灣與中國的關係；2020 年疫情爆發後，來臺外媒數更是出現大幅的數量增長，來到外媒記者數量的巔峰時期，如表 四-1 所呈現。

本研究分析將著重於 2020 年以前，以及 2020 年後的兩個時期，分析疫情前後臺灣外媒圈的新興現象與改變。

表 四-1 2016 至 2024 駐臺外媒數量變化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外媒（家）	48	-	-	53	71	72	79	82	-
駐臺（位）	81	-	-	90	124	126	142	174	223

資料來源：關鍵評論網，2012；楊孟立，2012；三立新聞網，2020；黃朝郁，2012；王照坤，2022；游凱翔，2023；王照坤，2024；邱祐慶，2024

## 一、疫情前：臺海議題升溫，國際媒體對臺的有限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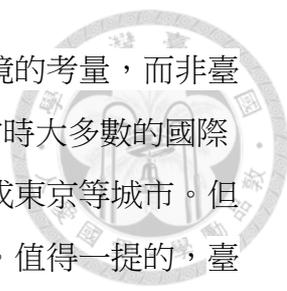
回顧 2016 年，臺灣對國際媒體的吸引力仍然較為有限。當時，外媒駐臺記者數量較少，且主要由全職記者組成，自由記者的比例較低。TFCC 約只有 30 位會員偶爾會舉辦採訪活動以及 Happy hour，當時 TFCC 的規模小，相比今日，沒有這麼多研討會、小組討論以及新聞發佈會。

根據來臺多年的受訪者 FL3 的描述，當時的臺灣並不像現在這樣具有高度的新聞價值，「當時有關臺灣的新聞較少」，儘管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有許多討論，但臺海局勢並未如今日般緊張，且外媒的報導頻率較低。根據報導統計（李又如，2023），2015 至 2018 年，外媒報導中與臺灣有關的新聞，多為在災難新聞，如空難、地震、交通事故等。當時在臺的受訪者 FL3 也表示，能夠報導的臺灣新聞相對少，找到合適的新聞主題不像今日容易。同時也因為駐臺外籍記者少，沒有這麼多的研討會和記者會，報導的頻率比較低，新聞產出的速度也比較慢。

我想可能新聞較少，你可以寫的戲劇性新聞較少，所以這使得找到可以寫的文章變得更加困難。（受訪者 FL3）

此外，外媒在臺灣的報導體系也較尚處於發展初期階段，政府部門與外媒的接觸交流管道尚不成熟，整體新聞產出的速度和範圍都較為緩慢。

當我剛來的時候，甚至申請記者簽證都有點慢。我認為 freelancer 沒有必要來到這裡，而且我認為這也像是相對較新的東西，因此他們必須改變流程，我認為這是一個新事物，我認為現在當局更習慣於擁有更多的記者以及自由記者等。（受訪者 FL3）



在此時期，外媒的臺灣駐點更多是出於地緣政治與媒體環境的考量，而非臺灣本身的新聞吸引力。另一位在臺多年的受訪者 FL2 表示，當時大多數的國際媒體在北京、上海都設有駐華記者，又或是選擇新加坡、曼谷或東京等城市。但對於臺灣新聞的興趣普遍很低，這些駐華記者也很少到訪臺灣。值得一提的，臺灣在 2016 年總統大選時，由於政黨輪替，吸引了一些外媒進駐報導，這是外媒對臺灣新聞稍微增加關注的一個特例。

對許多外媒而言，考量讀者、新聞價值與市場，報導亞洲事務最理想的地點是中國（受訪者 TR4）。然而現實狀況是，習近平上臺後，對於中國境內外籍媒體的管控與日俱增。根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統計，自 2013 年習近平的首任國家主席任期起，截至 2019 年，北京當局以直接、間接的方式驅逐了 9 名外國記者。受訪者 FL3 即為北京當局黑名單的外國記者之一，在 2016 年便被中國政府拒發簽證而驅逐出境。

因為我只用 OO 語書寫，我認為他們不會看 OO 語的報導，唯一會關注像是英語或中文的報導，或許還有是西班牙語或法語的報導。（被驅逐前）從來沒有任何跡象。（受訪者 FL3）

2018 年習近平進一步宣布取消黨總書記的任期限制，在 2019 年，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間接導致更多外籍記者離開中國。

那個時候大部分的記者並不是來臺灣，那時候大部分記者是往韓國跟新加坡跑，還有香港。（受訪者 TR2）

臺灣成為外媒報導的「第二選擇」，這一觀點在多位受訪者的討論中得到了印證。雖然臺灣在 2016 年後的新聞價值有所提升，但外媒對臺灣的報導仍然受限於臺海議題的發展以及全球其他重大國際事件的影響。受訪者 TR4 指出，臺灣在外媒的報導中並非首選地點，「現實來看，臺灣並不是第一的選擇」，而是當其他地區的媒體環境惡化，臺灣作為相對自由的媒體環境逐漸成為外媒記者的

替代選擇。即使如此，臺灣的新聞價值仍然受到臺海局勢及國際事件的影響，其持續吸引力並不穩定。

由此可知，疫情前的臺灣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中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第一波來臺的外媒記者，有大多數來臺的原因仍然是為了報導中國，只是因為簽證受限或其他原因無法進入中國，所以選擇來到臺北作為報導的據點。綜合以上觀察，臺灣在外媒報導中的角色在 2016 年後逐漸增強，但其成為駐點的過程更多是由於其他地區媒體環境惡化的「相對優勢」所致。隨著中國對外媒管控的加強和香港媒體自由度的下降，臺灣因其相對開放的媒體環境逐漸成為外媒記者的替代選擇。然而，這種選擇並非完全基於臺灣本身的新聞吸引力，而是在地緣政治與媒體自由限制背景下的「第二選擇」。臺灣的新聞價值雖然在區域動盪中逐步提升，但其持續吸引力仍受限於臺海議題的發展及其他國際事件的影響。

## 二、疫情後的外媒變局：臺灣作為亞洲新聞駐點的轉變

### （一）第一波：疫情帶動外媒來臺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中國多個城市封城，促使更多人離開中國。當時國際間疫情最嚴重時，臺灣處於疫情穩定，可以自由活動、正常生活的國家，讓許多人選擇來到臺灣。受訪者 FL3 提到，「在疫情之前和之後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很多人決定離開中國，記者、上班族甚至學生都因疫情選擇來臺灣。臺灣對許多人來說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一點在 2020 年和 2021 年之間尤為明顯。」根據美國之音報導，自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3 月底為止，就有 21 間外媒機構機構，共 39 名的外媒記者首次駐臺，包括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BBC 等。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加大力度驅趕國內外國記者，以疫情作為藉口，拒絕延長外籍記者的簽證，導致他們無法再回到中國工作而被迫離開中國，部分記者轉而選擇前往臺灣等待重新獲得中國的記者簽證。

那我認識一批記者呢，他們就是會怎麼樣在臺灣中轉，就是說我在臺灣等，因為他們會申請要進入中國大陸，要那個簽證需要等待，因為他沒

有，他不像臺灣，可能可以給你一個很明確的時間點，他就說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給你，你有在上面，然後他們就說好，那我要在哪裡等？我在臺灣等嘛，那我在臺灣等，也在臺灣這邊一邊工作。（受訪者 TR4）



這些被中國拒發簽證的外國記者，其被驅逐的原因中共至今沒有給出一個明確解答。不過多數新聞工作者推測，是因為過去報導涉及中共敏感議題而被拒之門外，「有一些知名的 case 是有幾個人，他是被趕走嗎？因為他可能做的新聞太敏感」（受訪者 TR4）。被列在中共黑名單上的受訪者 FC2 表示，當時北京當局換發給他的記者簽證期限一次比一次短，讓他意識到自己需要做好離開北京的準備。

跟中國報導有關係，就是我在 2020 年離開中國的，那我在中國最後幾年，他們每次給我簽證的都是幾個月，不是一年的，簽證都是幾個月的簽證，最後給我發一個月的簽證，所以比較明顯的就是，……，那個時候意識到可能早晚要走的，但是我盡量不走。（受訪者 FC2）

另一邊，2016 年離開中國的受訪者 FL3 表示，他當時報導了一個有關香港的事件，其他相關人士有些被逮捕了，他則是被拒絕延長記者簽證。

當然，他們不會告訴你被列入黑名單的原因，但我認為原因是我寫了很多關於 O O O 的文章，你知道在香港出版的書被逮捕了，……，當你有重大新聞時，他們會仔細觀察我們寫的內容，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原因，但我又知道什麼呢？（受訪者 FL3）

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疫情封城，為外媒來臺的第一波高峰，但這個情形並沒有持續太久。初期來臺的記者，仍然以回到北京、報導中國新聞為目標，因此當這個目標難以達成時，這些記者便紛紛離開臺灣。



但是我後來也遇到，我也有認識朋友，所以他後來等不到了就離開了，臺灣的也有，所以這個有很多人是把臺灣當作個中繼站。（受訪者 TR4）

離開臺灣的原因除了等不到中國簽證之外，還有一點就是在臺灣報導中國新聞受到限制，外媒記者發現在臺灣難以觸及中國社群，因此轉移據點到其他亞洲國家以繼續報導中國，這一部分會在第二節有更多的討論。

很多人原本也以為好像臺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後來發現，其實不是因為你在臺北其實反而接觸不到太多的中國人。因為兩岸現在關係不是很好。（受訪者 TR3）

與此同時，中國驅逐外國記者的事件還在持續，據報導（自由時報，2024），自 2018 年至今，外國記者離開中國的情形加劇，《紐約時報》的中國特派員從 10 人減少到 2 人，《華爾街日報》從 15 人減少到 3 人。曾經有 2 名記者的《華盛頓郵報》現在已經沒有人了，南韓媒體的北京特派人數也在兩年內從 40 多人減少到 30 多人。2020 年間，中國大動作的驅趕美國記者，也是中國限制外媒記者受到關注的高峰，也多被放在中美角力的框架下被討論（Forbes, 2020; CNN, 2020; 工商時報，2020；美國之音，2020；德國之聲，2020）。但不可否認的是，習近平對外國媒體的緊縮政策，連帶影響國內的新聞自由風氣，增加在中國採訪、做新聞的難度，這些政策的影響不只是波及在中國的美國記者，同時也對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造成衝擊（Reuters, 2020）。

因為習近平時代就是對媒體的監控越來越嚴重，那其實中國那邊也沒有什麼人敢受訪了，所以他們都說他們的工作變得非常難，但還是德國媒體，還是大部分還是有辦法進去，沒有那麼多媒體就是像美國一樣就是突然來到臺灣避難，沒有，德國沒有這個現象。（受訪者 FL1）

疫情後第一波來臺的外媒記者，絕大部分是因為疫情或媒體管控的原因無法進入中國，轉而來到臺灣。因此在這個時期，多數記者仍然以報導中國新聞為主軸，除了臺灣防疫成果外（READr, 2023），其他臺灣本土議題並未受到太多的關注。

疫情爆發後，中國的封鎖政策與媒體管控加劇，促使許多原本駐紮中國的外媒記者轉向臺灣，作為一個短暫或過渡性的替代駐點。臺灣相對穩定的防疫情況和開放的媒體環境，使其成為一個安全且自由的選擇。然而，在此階段，多數記者仍以報導中國為主，而臺灣的新聞價值和本地議題尚未引起他們的廣泛關注，顯示這波來臺潮主要受限於外部因素而非臺灣本身的新聞吸引力。

## （二）第二波：臺灣的國際關注度攀升：以裴洛西訪臺為例

一直到 2022 年，臺灣才真正的在意義上，迎來第一次外媒來臺的蓬勃發展期。2022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3 日，美國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率團訪問臺灣，隨後的中共大動作的軍事演習和頻繁的威脅，將臺灣議題推向全球視野。

那天，裴洛西登陸，這就像晚間八點新聞中的頭條新聞，所以（德國）每個人都打開電視，因為臺灣的麻煩，因為成長中的中國會生氣。所以我的理論是，從德國的角度來看，正是在這個時刻，臺灣成為幾乎每個人意識中的重要議題。（受訪者 FL2）

兩岸關係受到如此高度的國際關注，遠因還包括受到烏俄戰爭爆發所影響，烏俄戰爭也間接增加了對臺灣的關注。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

全面入侵，震驚全球。當時已經有報導擔心人們都在擔心臺灣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受訪者 FL2 提到，「我們一直沒有想到俄羅斯會如此行動，現在我們更警惕臺灣的局勢。」

裴洛西訪臺事件持續延燒，吸引大量外媒來臺報導，為來臺外媒數量的巔峰。當時 TFCC 需要臨時加開記者會活動，外媒記者擠滿活動現場，為前所未有的景象。受訪者 FL3 表示，TFCC 的會員數量，從過去的 30 幾位，躍升至約 100 至 200 名記者參與。

自從我搬到這裡以來，有一些外國記者到達了，我認為這當然與以下事實有關：臺灣變得更加重要，因為中國，也因為這種情況，可以在中國的記者越來越少。（受訪者 FL3）

受訪者 TR1 形容，裴洛西訪臺的那一陣子，相關記者會基本上是塞滿記者的，記者會不只換到更大空間舉辦，更需要提早到才能搶到位子，外交部的外媒記者 LINE 群組，一天中也是有許多人持續加入。受訪者 TR1 指出，由於裴洛西訪臺算是一個突發事件，當時來臺的記者普遍不是從遙遠的國家過來的空降記者，更多的是從鄰近亞洲國家出差來臺的亞洲特派員。

當時東京的記者剛到臺灣。當我和他談話時，他說：「這些天，他說得好，這是我從來沒有在這方面有過如此巨大的搜索，就像我一生中從來沒有突然經歷過這樣的搜索和興趣。」我們需要做點什麼」（受訪者 FL2）

前後大概 2022 年 8 月前後有那個陣子又來了一波外媒記者，那這些外媒記者跟前一批很不一樣的特點，就是他們其實是對臺灣本身有興趣，而不是要在臺灣做中國報導的。（受訪者 TR3）

裴洛西訪臺事件後，外媒來臺數量大增，其中不乏原先駐點其他亞洲城市的駐華記者，以及 **freelancer** 來到臺灣，對於國內在地新聞嚮導的需求在短時間內暴增。



那時候我必須要拒絕，我真的沒有時間，就已經滿了，我的那個工作表已經滿了，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大家都是這樣，那個時候就是所有的 **freelancer** 都很忙，然後互相說你沒有空幫我接這個怎麼樣。（受訪者 TR1）

第一波來臺記者與第二波的一個主要差異在於，第一波記者來臺主要是受到中國對媒體的打壓所影響，且多為全職的記者；疫情後因為臺灣受到國際關注程度提升，因此對於第二波來臺記者而言，臺灣新聞就是他們感興趣的議題，也是來臺原因，在這其中，也可以看到除了傳統特派員記者外，更多元的記者角色。

隨著裴洛西訪臺、烏俄戰爭引發的地緣政治緊張，臺灣的重要性在國際媒體中迅速攀升。臺灣被視為美中對立下的關鍵地緣政治地點，吸引了大量外媒駐紮。這一時期的外媒記者不再僅僅將臺灣視為中國報導的替代點，而是真正聚焦臺灣本地議題，如防疫成效、兩岸關係等，使得臺灣在國際新聞中的地位逐步增強。

### （三）第三波：熱潮退卻，外媒資源回調

裴洛西事件為臺灣外媒來臺的高峰，當初因為臺灣議題大受國際關注選擇來臺的記者，少數在事件後決定離開。此外，還有原先計畫派駐中國，但因中國限制打壓而轉移至臺北的媒體機構，由於各家媒體的新聞需求和成本效益考量，這些媒體機構也陸續裁撤了在臺灣的資源。例如 **BBC** 臺北分部，根據中央社（2024）報導，因政府預算縮減，英國廣播公司（**BBC**）在 2024 年底擬縮編海外駐點，其中臺北辦公室及在縮編名單內。駐臺北記者傅東飛（**Rupert Wingfield-Hayes**）將被調回倫敦。而受訪者 **TR2** 也指出，身邊陸續有記者朋友離開臺灣，因為這些記者最終目標仍然是回到北京或上海。



外媒逐漸離開臺灣的原因，除了臺灣對中國的報導價值有限之外，還有一些記者認為臺灣缺乏足夠的文化和政治脈絡來支撐他們的長期駐點。受訪者 TR2 指出，「外媒會覺得臺灣在短期內對中國報導非常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裡缺乏能夠支撐長期報導的元素。」外媒在臺灣的多數報導都是關於中國，然而當有一天這些媒體發現他們在臺灣能取得的資訊，並不比在其他國家，例如香港、韓國、日本等，來得多時，這就是國際媒體離開臺灣的時候，終究面對的是新聞價值的利益選擇。

裴洛西訪臺後，外媒在臺駐點的熱潮開始降溫，部分媒體因報導需求減少和成本效益考量，逐漸撤離臺灣。一些外媒記者發現臺灣對於報導中國的便利性有限，且當地的新聞價值未達到長期駐點的標準。最終，臺灣雖然在特殊時期吸引了大量外媒，但隨著疫情影響消退，部分媒體逐步回調資源，反映出臺灣的國際媒體吸引力仍與地緣政治和新聞價值的權衡密切相關。

整體來看，臺灣在疫情後的外媒熱潮主要是受到中國的媒體管控和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當這些因素逐漸淡化，臺灣的媒體價值和吸引力面臨現實的挑戰。儘管如此，臺灣的新聞地位在特殊時期仍顯示出其作為國際媒體駐點的重要性，並且未來可能會隨著兩岸關係及全球政治局勢的發展而持續變化。

## 第二節 外媒在臺灣的新聞實踐影響層次理論

第二節將深入探討外媒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實踐，並且以新聞的影響層次理論加以分析，試圖檢視臺灣事務如何在新聞產製的流程中，受到何種因素影響，並被呈現在國際新聞版面上。

### 一、個人

#### (一) 語言能力

記者的語言能力也會影響採訪工作的進行。部分受訪者會講中文，因此可以自己完成資料搜集、採訪等工作，其他不會中文的記者則會仰賴在地新聞嚮導的協助。此外，在消息管道上，是否會中文也會造成記者消息來源的差異。受訪者



FL2 表示，中文能力不足的記者通常需要仰賴其他媒體作為資訊來源，「我正在閱讀很多臺灣媒體，因為通常臺灣本地媒體總是比國際媒體更早報導事情」，他表示，這些資訊可能看起來不起眼，但對記者而言非常重要，因為許多其他記者的中文能力並不如他，因此依賴這些資源是必要的，透過閱讀本地媒體，讓他能夠對臺灣的社會結構與組織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然而，語言能力的缺乏也為記者採訪造成了阻礙。部分外籍記者提到，儘管臺灣有許多人具備英語能力，但因害怕使用英語，受訪者經常拒絕訪談。「如果你的中文不好，就需要翻譯協助。但許多人即使懂英語，仍不願使用，這成為採訪過程中的一大挑戰。」（受訪者 FC1）

對於在外媒工作的臺灣記者，他們的中文能力使其能直接掌握第一手資料。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臺灣記者經常被賦予特定的工作類型，例如牽涉到使用中文的工作，尤其是與在地的組織溝通，例如政府官員、警察局等，或是遇到較難以英文或其他外語溝通的情形時，就會仰賴臺灣記者的協助。

然後我的主管我們會分配工作，像如果要用到中文的，例如說寄信或者是打電話、打電話給受訪者，或者是打電話給那個某某政府，甚至是一些警察局確認某個事件有沒有發生或是沒有發生，或是他們有沒有什麼想說的這種東西需要用到中文的話，一定是我來做。（受訪者 TR1）

## （二）記者身份

記者個人身份以及本身的興趣也是影響臺灣議題在國際媒體露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外媒工作的臺灣記者最能反映出對臺灣在地議題的重視，其中有兩位受訪者都提到，在新聞工作中，試圖在產製的過程中，增加兩岸關係以外的臺灣議題，並嘗試在報題中增加臺灣新聞的比例。

這可能是我，個人就覺得很重要吧，因為因為可能是平常就是看了很多政治的新聞，就是關於臺灣的報導，很多都是在外媒的報導很多都是兩岸關係，但是在這邊身為在這邊長大的臺灣，我當然知道，除了兩岸關

係，我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有些事情特別吸引我，像文化跟歷史就會特別吸引我，所以我就會很希望可以多寫那方面的報導。（受訪者 TR1）



我一直很希望能夠去做多一點，除了西方主流媒體的西方媒體的主流論述之外的事情就是我希望的事情是，當媒體在報導不同國家的時候，能夠讓我們看到更多元的那個國家的樣貌，而不是只是單一的樣貌而已。（受訪者 FX2）

另外，也有外籍記者提到，雖然當初來臺主要是為報導中國事務，但因為人在臺北的現實因素，增加了報導臺灣議題的頻率，此外，報社希望強調記者在當地的身份，報導更多現場的新聞，進而讓臺灣報導的比例增加。

他們（報社）真的想讓我，你知道，利用我在這裡來講一個故事，在這裡與人們見面、參加許多會議，以表示「我在這裡」。並且我不做這種新聞電訊報導，.....，所以我所做的就是更多的關注當地獨特的東西，我經歷的會議，我有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到的。（受訪者 FC1）

語言能力和記者身份是個人層次中尤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語言障礙影響了外籍記者在臺灣的資訊獲取和訪談對象的選擇，會中文的記者能更直接地接觸本地消息源和理解在地新聞，進而形成更深刻的在地觀點，而不會中文的記者則需依賴在地新聞嚮導進行訪談協助，這種依賴限制了他們的新聞接觸面，特別是對本地議題的深入報導。此外，記者的個人身份與報導偏好也對臺灣新聞的露出產生了顯著影響。臺灣籍記者或對臺灣有長期關注的記者，往往試圖平衡兩岸政治之外的議題，突出臺灣本地的文化、社會和歷史面貌；而部分外籍記者在地理位置和報社需求的推動下，也開始增加臺灣本地新聞的報導比重，逐漸形成對臺灣的

多元報導。在影響層次理論的框架下，這些個人層面的因素最終共同塑造了臺灣議題在國際新聞中的呈現方式，並突顯出臺灣新聞的在地化與多樣性需求。



## 二、常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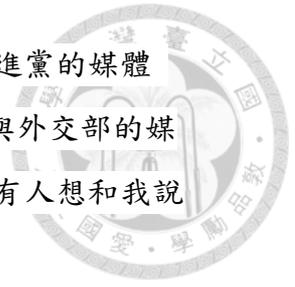
關於常規與國際媒體的分析，參考劉蕙苓（2022）的研究，將消息來源、媒體組織以及新聞價值等三大影響因素（頁 172），並保留原先研究 (Reese, 2001) 將媒體組織獨立討論的設定，根據研究主體國際媒體的特殊性，調整分析項目為消息來源以及工作時差，並將新聞價值獨立出一節做討論。

### （一）消息來源

外籍記者在臺灣撰寫新聞時，依賴多樣化的消息來源，包括記者社群、傳統媒體、社群媒體及通訊工具等。其中，外國記者的社群「臺灣外國記者協會（TFCC）」是重要的記者資源。臺灣外國記者會（原臺北外國記者會）成立於 1998 年，成員包括外國新聞組織的記者、freelancer 以及商業界、政治界人士等。TFCC 定期邀請臺灣政府官員、商業人士或學者參與聚會、記者會，協助外籍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工作。「如果是專業消息來源，那麼在那裡會面，可能是 TFCC 的活動，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受訪者 FC1）。TFCC 所創造的記者網絡，是重要的消息來源，透過彼此的信任與經驗分享，擴大了可接觸的資訊範疇。

另一個重要的消息來源管道則是通訊軟體 LINE。根據 NCC 公布的「112 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臺灣民眾最常使用的社群聊天軟體是 LINE，比例高達 97.7%。根據 World Population Reviews 2024 的調查報導顯示，LINE 的主要用戶來自日本、泰國、臺灣以及印尼，在其他國家及地區，LINE 並不是這麼普及。因應臺灣民眾的使用習慣，許多外籍記者都提到了 LINE 在新聞工作的應用，尤其是政黨、組織與記者所建議的 LINE 群組，是記者尋找消息來源、受訪者的常用途徑。

現在他們也有一個與國民黨的媒體 LINE 群組，一個與民進黨的媒體 LINE 群組，一個與民眾黨的媒體 LINE 群組，以及一個與外交部的媒體 LINE 群組。因此，即使只是在那裡問一個問題，是否有人想和我說話，這樣你就可以思考並接觸到很多人。（受訪者 FL3）



普遍來說，外籍記者會需要一位專業在地新聞嚮導提供協助，但在實務上，這很大程度取決於記者本身對於臺灣的了解程度，以及語言能力。

我參加了很多活動，我認為我的優點是我的中文說得很好，並且可以參與討論活動。它們就像外國記者俱樂部的活動我也會拖很多次您認識的其他人的出版品。（受訪者 FL2）

因此，要嘛聯繫記者，要嘛直接聯繫政黨組織，或者只是我瀏覽一下你收到的所有名片，那裡有數百個名字，我經常使用它們，翻一翻，看看有沒有你想要的受訪對象。（受訪者 FL3）

臺灣本地媒體也是大多數受訪者的消息來源，這些來源的特性與限制，也對新聞報導的內容產生了影響。有些記者認可本媒新聞的重要性，有些則認為當地新聞缺乏參考價值。另外，若以臺灣本媒作為消息來源，還牽涉記者本身的中文程度，所以也會在記者間造成差異。只不過大多數以臺灣本地新聞作為消息來源的受訪者都有提到，關於臺灣新聞娛樂化、資訊零碎化的問題，也有些受訪者就只選擇閱讀以英文報導的臺灣本地新聞（受訪者 FL2）。受訪者 FC2 提到，他主要關注大型媒體的報導，以瞭解藍綠陣營的關注焦點，但也指出部分報導缺乏深度，無法觸及重要議題；受訪者 FL3 也分享了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臺灣電視新聞更多是娛樂性內容，諸如交通事故、天氣或犯罪案件，而非具有分析深度的

選舉資訊。這些觀點反映出臺灣本地新聞雖具資訊量，但在報導內容與深度方面存在不足，進一步影響了國際記者對臺灣議題的解讀與報導。

其次，社群媒體在現今國際記者的資訊採集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受訪者 FL2 提到，他透過 Facebook 和部落格瞭解在地民眾所關注的議題，並且在日常生活中觀察有潛力的故事內容。受訪者 FL3 則指出，Twitter (X)是他發掘文章與資訊的重要工具，包括政治人物的公開聲明。這顯示出，社群媒體不僅是一種補充性資訊來源，也提供了更即時、更具互動性的方式來瞭解臺灣的脈動。然而，社群媒體的碎片化特性與可能的偏誤也意味著其資訊可信度需要謹慎評估。

另外，這裡將在地新聞嚮導的角色特別提出來討論，在國際新聞的生產過程中，在地新聞嚮導的角色不僅是消息的提供者，更是影響新聞報導框架的重要因素。由於外籍記者通常對當地情境 (context) 了解有限，在地新聞嚮導成為連結記者與當地資訊的關鍵媒介。他們的專業判斷、個人觀點以及社會背景，不僅影響消息來源的選擇，也塑造了新聞敘事的方向，如同受訪者 TR1 所定義，「fixer 也算是媒體人，所以要有一些記者的像是 news judgment」。在地新聞嚮導的工作絕非簡單的翻譯，在國際新聞的產製流程中，是影響報導的關鍵人物。例如，有些較有經驗的在地新聞嚮導，他們不只是幫記者找到受訪者，還會找到符合記者所在媒體調性的受訪者。

要看題目，還要看題目要看題目，但是這個真的沒有什麼，一定的就是看題目跟看媒體性質，媒體性質是比方說什麼樣。因為每個媒體都還是會有他的立場在。（受訪者 TR2）

受訪者 TR2 以英國右派媒體 Sky News 為例，表示若接受 Sky News 的委託，就會找對於保臺立場鮮明的學者，而若為 Sky News 的對立媒體 BBC 來委託的話，則是會找偏向自由開放主義的受訪者。而不只是取決於媒體的立場，還有調性。



就是你會想要知道說這個記者，他想要什麼樣的 bite，他想要 spicy 一點的人，還是他想要比較合理，比較中性一點，想要中性的人很少了，通常都會想要 spicy，只是說是怎麼樣 spicy 而已。（受訪者 TR2）

此外，在地新聞嚮導作為消息的提供者，在地新聞嚮導的觀點也會影響新聞報導的走向，尤其是今天協助的是一群對臺灣事務不了解的「外國人」。根據受訪者 TR2 的描述，在地新聞嚮導的任務不僅是為外籍記者提供「中性」的臺灣背景資訊，也要協助記者理解哪些議題在臺灣具有普遍性或代表性。然而，在地新聞嚮導的個人背景與社會位置可能導致報導視角出現偏差。例如，受訪者 TR2 提到，許多臺灣的在地新聞嚮導來自高學歷或菁英圈層，這種「同溫層」的背景可能無意間將新聞框架限制在以「臺北觀點」為主的範疇中，忽略了其他地區或群體的聲音。這樣的現象在國際新聞報導中，可能會對臺灣的形象與議題產生單一化的呈現。在地新聞嚮導作為外籍記者的在地橋樑，其觀點與判斷在臺灣新聞脈絡中的作用尤為顯著，且由於外籍記者對臺灣社會的理解程度有限，在地新聞嚮導的選擇很可能會直接影響報導的焦點、與切角，進而形成國際媒體對臺灣的敘事框架。如何避免這些偏差，並兼顧多元視角，也是國際新聞生產過程中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 （二）時差

如同先前研究曾提到的，時差是影響記者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也會因為所屬媒體所在國家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舉例來說，受到較多影響的會是時差差距大的國家，這些記者需要花時間等待母國編輯「起床」回覆。

這意味著我必須自己做所有事情，我不能依賴任何人，每次我想要完成某件事並等待他們。但由於存在時差，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可以做這些事情，所以我只是做好準備，然後我希望當他們進入辦公室時，他們

有時間做這件事，你知道，所以我發送這一切都交給他們並準備一包材料，我發送到辦公室，然後他們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我。如果他們在另一篇文章中工作，他們可能要等到一天後才會被閱讀。（受訪者 FC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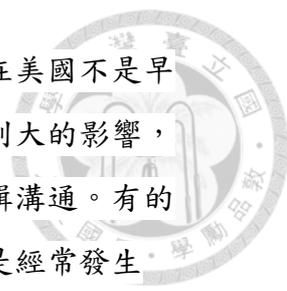
因為時差的關係，新聞工作中是帶有不確定的因素的，記者不知道這則新聞會不會被編輯核准。但另一方面，也有受訪者樂於擁有時差，因為有時候這代表著擁有更寬裕的時間處理新聞稿件。

我喜歡在這段時間工作，因為我總是先起床，你知道，我可以在早上慢慢來，然後我寫一些東西，或者就像我查看新聞一樣，我對此很感興趣，然後我給我的編輯寫一封電子郵件，可能已經是下午一兩點了，但在那裡才是只是早上。（受訪者 FL2）

與先前的研究相比，時差問題在臺灣的脈絡下，並不是一個太多記者感到困擾的事情，受訪者提及，媒體仍然尊重記者的休息、工作時間，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受訪者 FL2）。其他影響原因可能在於：全球編輯分佈現況以及新聞通訊社即時消息的普及。例如受訪者 FL3 提到，編輯並不會要他處理太多的即時報導，若真的遇到重要的突發新聞，報社會傾向以通訊社的資訊發佈即時訊息。

因為你有通訊社或類似的東西，所以我認為對於一般媒體來說，現在他們可以使用他們的新聞電報來製作更多新聞，例如突發新聞和硬性新聞，所以我不會做很多突發新聞。（受訪者 FL3）

另外，先前的駐外記者研究提到，與編輯的溝通也經常受到時差所影響，對此，許多受訪者表示，在臺灣的工作主要是與鄰近的分部編輯所討論，例如在首爾、東京等同屬亞洲分部，因此時差問題並不嚴重。



有時候就是早上要很早起的通電話，比如說如果採訪對象在美國不是早上比較早，就晚上比較晚的就打電話。其他的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影響，我們現在跟編輯溝通，大部分時間都是跟那個亞洲部的編輯溝通。有的晚上也要跟紐約的編輯直接溝通、通電話的是有的，但不是經常發生的。（受訪者 FC2）

首先，消息來源對外媒記者的工作至關重要。臺灣外國記者協會（TFCC）、本地新聞、社群媒體、LINE 等成為外籍記者的重要資源，但這些來源因語言障礙和記者自身背景而產生差異。具中文能力的記者能夠直接獲取本地新聞，深化對臺灣的理解；相對之下，無法使用中文的記者則依賴在地新聞嚮導和社交群組的協助，這不僅影響了報導的視角，也可能導致本地議題的報導出現偏差。此外，在地新聞嚮導的角色顯得關鍵，他們不僅充當翻譯，更提供符合媒體調性和新聞判斷的角度，進而影響報導的框架。其次，時差是影響記者工作節奏的另一重要因素。在與總部編輯溝通時，部分記者必須面對不同的時差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然而，由於新聞通訊社的普及及編輯分部的全球分佈，時差問題對駐臺記者的影響相對較小，尤其是與鄰近的亞洲分部（如首爾、東京）合作時，溝通變得更為便捷。因此，時差在此情境下成為影響新聞節奏的次要因素。

### 三、組織

記者與編輯的互動溝通是媒體組織編輯室裡的一大學問，對於外媒記者也不例外。記者進行新聞工作的流程，從報題 (pitch)、採訪到撰稿，過程中與編輯有許多接觸。首先在報題階段，記者需要面對編輯進行說服與討論，這也是多數受訪者在訪談中所提到的挑戰。對於一些身在外國的編輯而言，臺灣事務既遙遠又陌生，因此反而讓記者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通常他們會給我相當自由的空間，因為他們編輯們對臺灣了解不是很多，……，因為他們對臺灣的了解比我少得多，我知道很多其他記者，可能用英語或其他語言媒體，當他們將文章發送給編輯時，他們經常會梳理意見並說必須更改為可行的方向。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可能因為我的編輯對臺灣不太了解，所以我認為這很少發生。（受訪者 FL3）



除了記者主動報題，編輯也會提出報導特定議題的需求。形成一來一往的合作過程。但根據大部分受訪者的經驗，同樣因為編輯對於臺灣事務的不了解，還是以自己主動報題為主，少數時候才會是編輯要求報導。

我想說也許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是我的編輯從其他媒體發送一篇文章，然後說：「我讀了這個主題，非常有趣的主題。我們可以研究類似的東西嗎？」我會說「是的，我當然可以試著朝那個方向前進」。（受訪者 FC1）

儘管記者在報題階段擁有一定自由，編輯仍然是議題選擇的守門人。受訪者 TR3 指出，編輯對臺灣事務的理解有時較為淺薄，導致在選題上可能出現誤判。

就是有時候他們（編輯）會覺得這好像是一個值得做的東西，他就會叫你叫你研究一下，那大多是時候，其實因為他們其實對臺灣的理解都還是蠻淺的，所以很多時候其實還是要他們去報，因為他們對题目的判斷確實會有一點失準，對這個就是外媒的問題。（受訪者 TR3）

編輯與記者合作的過程中，負責潤稿與檢查的工作，根據訪談結果，不同受訪者與編輯的互動也呈現非常不同的樣貌。例如在修改記者文稿這件事上，有受訪者認為編輯提供語言上的協助，並且在內容上不會做太大幅度的更改。

敘事的角度是不會變的，然後他們會幫我，因為英文不是我的母語，他們會把有時候東西會變比較短一點，……，但我不會覺得跟我原本寫的東西相差太遠。（受訪者 TR1）



但另一方面，有時受限於編輯對外國事務的了解程度不及在當地記者，因此在新聞流程上可能會出現一些編輯問題，例如對於新聞價值的錯誤判讀，或是在標題文字、切角上的改動，扭曲了原先臺灣事務的準確程度，同時對記者的工作產生影響。例如受訪者 FL4 和 FL2 則都有與不熟悉臺灣事務的編輯合作的經驗，他表示，經過編輯修改的文章會出現偏差，而偏離他報導的原意。

（編輯）會把它改成錯誤的，比如說，因為你知道臺灣議題有時候很比較敏感啊，或是一些像臺灣國際地位啊或什麼的，你其實你的措辭，你選什麼什麼樣的方式來描述一件事情，其實你都有想過很多，不是說你隨便寫。但可能對一般人來說，這個聽起來有點怪怪的，所以他可能為了潤飾這整個語言的部分，他可能會改，他沒有想過，其實你是這樣寫，是有意圖的，你有意識的是這樣寫，所以有時候會被他們（編輯）修改。（受訪者 FL1）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不同的標題，你知道，就像一個不同的切角。例如，在這個選舉故事中，我講述了一些標題，這只是我認為更複雜的，我認為這就像我故事的一個切入點，但最後標題還是被改為「民主之島」。（受訪者 FL2）

而海外記者的報導自由，很大程度同樣受到媒體編輯室所影響，這點不論是駐外記者、外國記者或是 *freelancer* 都是如此。從新聞事件的選擇，到報導走向，編輯掌握相當大的決定權。國際記者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是與編輯的溝通，

相比於在臺的記者，身處國外的編輯很多時候對於臺灣事務不是這麼的了解，這時在議題選擇上便會延續新聞價值的選擇機制，選擇最受到讀者關注的議題。



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她（編輯）對我說了類似的話，因為中國問題很多政治討論，我是如此受其支配。（受訪者 FL2）

所以我在提案的時候，我可能會先考慮的事情是有沒有除了中國跟臺灣以外的新聞就是有些新聞，他不見得要跟中國做上牽連，可是很可惜的是很多很多時候即便這個新聞，它本身是有意義的，可是他們的記者都會覺得，如果跟中國沒有很直接的牽連，他們編輯是那個地方可能是不要的。（受訪者 FX2）

在訪談期間（2024 年 8 月至 10 月），臺灣國內引發廣泛關注的政治新聞之一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疑似涉貪的案件。該事件成為多位受訪者舉例說明國際媒體與臺灣本地媒體在議題選擇上的差異的典型案列。受訪者 FL4 提到，他曾向編輯提出報導柯文哲案件的提案，認為這是有重要性的新聞。然而，他的提案遭到了拒絕。

也不是說每次提案都會過，有時候他們也會拒絕啊。像比如說我最近有提那個柯文哲嘛然後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新聞，那他們就覺得這個太臺灣內部的新聞，他們覺得跟他比較沒有關係，對讀者不會有興趣，所以就被打槍。（受訪者 FL1）

受訪者 FL3 也指出，國際媒體對臺灣地方政治缺乏興趣，特別是針對腐敗或立法院內的事件。這類議題通常被視為過於地方化，難以引起國際讀者的共鳴。



像是臺灣的地方政治，（編輯）一點也不感興趣，像柯文哲事件，對政治腐敗不感興趣，或者像你立法院發生的事情，這種像是臺灣的地方政治，太地方化，太狹隘。（受訪者 FL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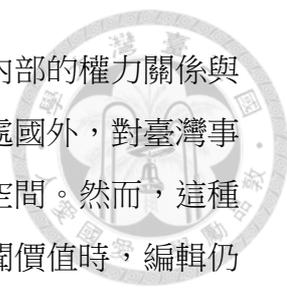
受訪者 FL3 進一步提到，他撰寫與中國相關的文章數量遠多於臺灣議題的報導，主要原因是國際讀者對臺灣的地方新聞興趣不大。他指出，柯文哲相關事件雖然具有臺灣內部的新聞價值，但在國際媒體上並未引起太多關注。

我寫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比關於臺灣的文章還要多。我想這也是因為像○○這樣的小國，讀者對臺灣的小新聞不太感興趣，像是柯文哲和他發生的事情。我看了 4 家媒體，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國際媒體，他們可以寫這個，但對我來說沒有人真正關心，沒有人知道柯文哲是誰。所以沒有必要寫他。（受訪者 FL3）

編輯對議題的選擇既是限制，也是自由的來源。由於編輯對臺灣事務的了解有限，記者在進行報導時擁有相對較大的自主性。然而，這種自由往往是在編輯對議題不感興趣的背景下產生的，也因此存在一定的侷限性。記者需在編輯的偏好與國際讀者的需求之間尋求平衡，這對他們的選題與撰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真的不需要糾正編輯，因為他們對此還沒有意見，你說這個然後他們運行是很少的，他們有疑問或所有他們想要改變的東西。（受訪者 FL3）

但當記者與編輯對於當地新聞的理解程度不一致，報導權力又掌握在編輯手上時，便可能會導致新聞價值的重複與失真。這部分將在下一節進一步討論。



本節探討外媒記者與編輯間的溝通互動，揭露了媒體組織內部的權力關係與新聞價值選擇機制如何影響臺灣新聞的呈現。雖然編輯大多身處國外，對臺灣事務的熟悉度有限，這讓駐臺記者在報題選擇上相對擁有更大的空間。然而，這種自由並非完全自主，尤其當議題涉及中國或具有明顯的國際新聞價值時，編輯仍會優先選擇那些對全球讀者更具吸引力的題材。

編輯對臺灣本地新聞的興趣偏低，這種選擇標準，使得駐臺外媒記者在提案時傾向以國際讀者關心的角度切入，即便他們對臺灣在地新聞有更深入的認識和報導意願。此外，由於編輯對臺灣的了解不足，有時在潤稿過程中會錯誤解讀或偏離原報導意圖，尤其是涉及臺灣的敏感政治話題時。這反映出編輯在新聞價值判斷中的「遠距離偏差」，可能導致新聞內容在國際間的失真。編輯扮演國際新聞的守門人角色，掌控新聞議題的選擇和報導方向，提供記者一定的自由發揮空間，又因理解的限制影響後續報導的準確性與豐富性。當記者的在地知識與編輯的判斷產生矛盾時，報導的最終呈現容易被編輯主觀取向所主導，形成偏差，進一步影響臺灣議題在國際媒體中的呈現方式。

## 四、媒體外部

### （一）臺灣媒體文化

新聞工作者的日常中，與政府機關的互動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消息來源方面，外交部提供外籍記者資源協助，在外交部外國記者名單上的記者，每天會收到來自外交部的新聞更新，這本意或許是好的，卻會對記者的工作造成影響。受訪者 FL2 表示「他們更像是向你發送每份新聞稿在你的電子郵件上，就像我必須用我的電話號碼註冊，然後他們向你發送訊息，就像外交部的每一篇新聞稿一樣」，不管是信箱、簡訊都是同樣的新聞稿內容。

我認為這就是臺灣公共部門和其他機構經常遇到的情況。他們只是給你發了公關，有時我認為他們並沒有非常認真地對待記者，或者他們沒有非常認真地對待這類資訊，因為作為一名記者，如果你一直收到這種公關，就會感覺很不舒服。（受訪者 FL2）



政府機關習慣以「媒體公關」的方式餵給外籍記者新聞資訊，一方面無法對應到記者需要；另一方面，對外籍記者而言，也是一個不同的新聞文化。受訪者 FL2 並不認同這樣的媒體文化，他認為政府的做法有失新聞報導的獨立性。

也許臺灣的許多媒體都非常黨派主義，所以他們基本上會從他們這邊獲取所有資訊。但我的意思是，我們就像國家期刊一樣，每個期刊都應該是獨立的，但我們只是不是這個臺灣系統，但我認為他們（政府）或許對國際記者使用相同的媒體系統。（受訪者 FL2）

此外，不同政黨所提供的外媒服務也有所差異，這是外籍記者最能深切感受到的。受訪者 TR1 認為，在國內三個主要政黨：民進黨、國民黨、民眾黨中，只有民進黨比較用心經營與外媒的關係，「不是說要討好媒體，就是整個把那種像記者會的流程，或者是他們會辦一些給媒體的活動，就是讓我們的事情比較好做一點」（受訪者 TR1），他進一步舉例說明，像是民進黨會設有一位外媒負責人，其英文能力很好能夠與外籍媒體交流，也知道如何給予外媒記者協助。

許多政黨都能夠理解外媒服務的重要性，受訪者 FC1 指出，他經常受邀參加國民黨的記者會，國民黨也會提供他所需的資料，例如會議、與相關人士交談的機會。而國民黨、民進黨則是都在 LINE 群組上相當活躍。受訪者 FC1 表示，政黨之間與媒體的關係差異，在選舉期間影響特別明顯，他可以很好接收到來自國民黨、民進黨的新聞消息，但對於民眾黨，則只能透過新聞或是其他管道接收訊息。

臺灣的特殊政治文化衍伸出新聞倫理上的討論。受訪者 TR2 指出，臺灣政府在對待外媒記者時，表現出過度熱情的傾向，甚至經常贈送禮物和伴手禮。

我覺得說臺灣的政府太過於送禮物啊，什麼我這些等路，給一些伴手禮什麼的太多了，多到我們去每一次國防部的採訪都會有伴手禮，然後每一次去什麼任何的公關的活動，或者是記者會，他們都會刻意拿出太多

那種就是說，「因為你是外媒，所以說我要對你比較好」。（受訪者 TR2）



受訪者 TR2 認為，媒體作為監督政府的角色，應該與被監督的政府保持一定距離，但是現況是，許多政府組織與記者私底下過多交流，這雖是臺灣人獨有的文化，不過他認為這並非是一個健康民主國家應有的媒體樣貌。

我怎麼可以身為記者，我監督你，可是我跟你會像是兄弟一樣，會像朋友一樣，這樣子這麼親密。政治人物的話，也有一樣類似的狀況就是，我們之前拜訪過 OOO，他直接說你是 XXX 媒體的，然後就在那個名片上面寫下自己的私人手機號碼給我。（受訪者 TR2）

相較於臺灣，日本、韓國比較難直接接觸到政治官員，邀約訪談、會面通常會有繁複的申請手續或是較高的門檻。受訪者 TR2 表示：「可是在臺灣，你看你就可以跟直接跟一個地方議員或者是立法委員拿到，他的私人電話，就是我們是一個神經很大條的地方」。

政黨與外籍媒體的關係經營，受訪者 FL3 也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他說，國民黨在一次地方選舉前會邀請記者參加 Happy hour 提供免費的食物酒水。當時很好奇，身為外媒他們並沒有投票權，為何政黨如此關注外媒記者，受訪者 FL3 詢問了其中一位官員，官員說因為臺灣本地媒體經常閱讀和報導外國媒體寫的所有內容，「所以也許這就是策略」受訪者 FL3 表示。

至於政治人物與外媒交流是否與本媒呈現差異？根據訪談資料，政治人物在對待兩者之間確實有所差別。以 2024 總統大選為例，受訪者 FC1 參與了所有的記者會，包括本媒與外媒的記者會，他認為兩者有「巨大的差異」。

對於外國媒體來說，有更多的歡迎和友善，.....，這是一個問題你很清楚，各方的行為不同，談論的話題也不同，（在外媒記者會上）他們不

會那麼攻擊對手，而對於外國媒體來說，更多的是表明你是有責任心的、表明你是值得信賴的、表明你有計劃而不是攻擊對手。（受訪者 FC1）



另一方面，受訪者 FC2 也認為，若政治人物作為受訪者，則需要讓他們了解外媒與本媒的立場差異。

畢竟是外國媒體的，我們立場不一樣的，但是我們可能所關注的問題，或者所要的消息不太一樣的，因為你畢竟如果是臺灣的媒體採訪他們的話，他們可能所需要的新聞，所需要的消息資訊就不太一樣了，我們畢竟是要給外國人介紹臺灣的情況，所以所需要的東西不太一樣的。（受訪者 FC2）

對此，在尋找受訪者的環節，外媒記者考慮的因素也會有些不同。根據受訪者 FC2 的經驗，「弄一個立法院對一個對某方面的比較了解的，或比較有經驗的或是觀點比較明確的，那你就是會找那種的。」再細問其在挑選受訪者的過程中，所謂「有經驗」是指受訪經驗多抑或是在特定領域的專業經驗，受訪者 FC2 表示，「兩方面的都有的」會是最理想的受訪者。

他們的態度，我覺得可能各立法委員的期待或者看法不太一樣吧。有的確實有一些立法委員的跟外面的人接觸比較多，他們可能比較了解的，反正很多立法委員，畢竟是在境外也讀過書的，或者工作過的，所以不是沒有經驗的立委就沒有這種經驗的，或者想法不一樣的，只是他們可能對我們的期待不一樣的。（受訪者 FC2）



## (二) 報導中國議題的限制

對許多外媒而言，臺灣最大的缺點就是報導中國議題的限制。對於想在臺灣報導中國新聞的記者，其最大的限制為缺乏中國人社群。這限制了中國相關報導中，加入中國人視角的切入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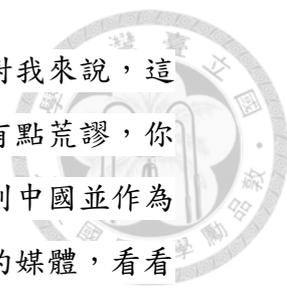
臺灣根本甚至連中國人的社群都沒有，我要去哪裡才對？啊就很難找啊。不然找陸配啊，陸配也不好找啊，對不對？我韓國，我隨便找個中國城，裡面就一堆中國人，我去日本東京，隨便去個橫濱中華街，一堆中國人。（受訪者 TR2）

但也因為如此，不同記者發展出不同的因應之道：

表 四-2 外媒記者在中國境外進行中國報導的因應策略

地點	臺灣			新加坡、首爾
類型	中國焦點	臺灣焦點	文化焦點	中國焦點
展現	臺灣中繼等 待回中國	停止報導中國， 聚焦臺灣	著重中華文化層 面	主要接觸國外的 中國人社群

有一部分的記者仍然尋求前往北京報導的機會，認為在中國報導中國新聞才是最理想的狀態。受訪者 FL3 表示，在中國進行報導能夠身歷其境，感受中國民眾的情緒、人們如何談論經濟、政府以及外交關係等，「能夠親眼目睹並與當地中國人交談，這會是最好的中國報導」。



許多被趕出中國的外國記者實際上在臺灣報導了中國，但對我來說，這實際上並不理想，你知道。這比在美國做報導要好，但這有點荒謬，你知道你應該報導你所在的地方，……，我的計劃是仍然搬到中國並作為一名記者，那裡有外國媒體，所以我知道我正在聯繫不同的媒體，看看我是否可以獲得機會，但這並不容易。（受訪者 FL2）

曾在北京擔任駐地記者的受訪者 FC2 表示，因為現在來到臺灣，報導的主題也有所改變，關於中國在地生活、社會相關的主題，因為人不在當地就會放棄報導。受訪者 FC2 會盡其所能在臺灣取得與中國的聯繫，但他認為不在當地就不適合報導當地的新聞。

現在我感覺就是慢慢就失去那種感覺的，所以那種就是中國生活的報導，我做的很少的，因為我覺得我現在沒有資格去做，因為我畢竟不在國內的，所以我對國內的很多動態，很多人的心情，（我）不了解的，我覺得最好不要做。（受訪者 FC2）

受訪者 TR1 也指出，因為無法接觸到中國方面的受訪者，因此會退而求其次，使用在社群媒體上能找到的網友意見，輔助報導。但若真的沒有，也就只能選擇不報導。

我們會用社群網站上面的，的是跟那個主題相關的，然後，有時候找不到，其實也沒有很意外，因為如果是其他的媒體來做一樣的事情，他們也會找不到，所以就用社群上的，或者是就不用了，因為真的就沒有辦法不能憑空捏造，那你就只能寫其他的事實，你就不能有一些 local 的聲音。（受訪者 TR1）

受訪者 FC1 認為，即便人在中國做採訪，也不能保證取得最貼近現實的消息來源，仍然有很大的機率難以接觸到真實民眾的想法，因此理想上要取得中國的視角相當有難度。但反之在臺灣，記者能夠確保取得臺灣方面的意見，成為報導中國新聞很好的一個切入點。

我真的認為我不能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問題，但話又說回來，最大的問題是我是否真的能在中國得到這個，因為我聽說人們非常害怕，所以我不確定我是否會更糟，不要來這裡，因為我可以了解你的臺灣觀點，而我在中國無法了解，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案。（受訪者 FC1）

撇除政治立場，受訪者 FC1 認為，中國與臺灣在文化上仍有高度的相關性，因此在報導軟性的文化議題，在臺灣與在中國報導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這（中國）不像這裡（臺灣）的任何人都可以與你交談，……，如果你說華人社區就像文化上一樣，我認為很多臺灣人會說他們在文化上是中國人，就像我做了一個關於中秋節的故事，我確實這樣做了。（受訪者 FC1）

另一派記者則認為，臺灣並非報導關注中國新聞的最佳地點，不只是因為缺少中國人社群，同時也因為臺灣對中國的了解著重兩岸關係，而非以中國的視角去理解。受訪者 FC2 認為，就這點而言，在臺灣跟在香港存在一樣的問題，對於中國議題所關注的焦點都是片面、狹窄的。

關注，但是就是從這個兩岸關係去關注的，那你說就是特別去研究了，共產黨黨內的動態、鬥爭，習近平怎麼想的，他們可能不是就說不

是很完整的瞭解，所以這方面的，畢竟所能看到的所能了解的跟中國國內不一樣的。（受訪者 FC2）



有些記者選擇駐點新加坡，因為這裡有許多中國籍的生意人，對於著重商業、財經的記者而言，新加坡會比臺北更好的選擇（受訪者 TR3）。

聽一些住新加坡的同事他們說這些社群，比較都是做生意的，商業界的人比較多的，那你在如果你在做關於中國經濟方面的消息、新聞的可能還是有幫助的，現在臺灣確實沒有這個信息來源的。（受訪者 FC2）

政府部門頻繁向外媒記者提供新聞稿和公關資料，試圖影響報導內容，但這些資訊往往缺乏新聞價值，削弱了記者的獨立性。尤其在臺灣的「送禮文化」下，政府官員對外媒的態度有時過於熱情，甚至會讓記者感到不適，影響媒體的監督功能。這樣的親密互動模式對於外媒記者而言既新穎又充滿矛盾，反映出臺灣媒體文化在國際媒體眼中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外媒記者來說，臺灣缺乏中國人社群成為報導中國議題的主要限制之一。臺灣作為中國報導的替代據點並不理想，無法接觸到中國民眾的真實生活視角，使得新聞內容難以反映中國的多元面貌。記者們嘗試通過社群媒體或陸配的意見來補充這一不足，但大多數仍感到不夠全面，因此一些記者選擇移駐新加坡或其他有中國人社群的城市，以更有效地觸及中國觀點。

大量外媒來臺似乎增加了國際對臺灣的關注，但實際上，多數記者仍然聚焦於中國相關報導，臺灣本地議題並未成為主流關注。隨著中國對外媒的持續打壓，臺灣成為報導中國新聞的「中繼站」，然而在缺乏中國人社群和有限的消息管道下，臺灣始終難以替代中國的報導角色。這使得臺灣的外媒駐點雖具潛力，但在報導層面仍面臨根本性挑戰，特別是報導角度受制於地緣政治與新聞文化的多重限制。

總而言之，對於世界而言，中國固然是國際事務上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也是多數國際媒體首要關注的對象。在中國驅趕外籍媒體的同時，帶來的是其他亞洲城市新聞聚集的另一個發展可能。但這樣的情形也造成了另一個隱憂。受訪者 TR2 以「糖衣毒藥」形容臺灣外媒的發展問題，指出大量外媒來臺的背後，都帶有著報導中國議題的意圖。

## 五、意識形態

如同先前所述，在臺外媒經常遇到的一個情境在於側重於中國事件的新聞報導，兩岸關係、臺海爭議、中國是否會攻打臺灣，都是國際媒體主要關注的問題。而探討這個現象，背後牽涉的是在國際新聞的運作邏輯下，新聞工作者的意識形態影響。

外國媒體可能一直比較關注，就是臺灣人跟中國的關係啊。國防的問題、臺美關係會怎麼樣、有沒有什麼變化的，我們也是可能比較關注這些問題的。（受訪者 FC2）

可能媒體性質，第一個是如果說他們是駐臺的記者，那他們通常去報導的議題最主要還會是跟臺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然後跟半導體。（受訪者 FX2）

外媒著重會影響歐美國家的中國、兩岸、台海爭議以及半導體、晶圓等政治、經濟議題，媒體偏好背後所隱含的意識形態，同樣能連結第二章文獻回顧中，國際新聞版面以西方世界中心的批判，顯示此論述放在臺灣的現今國際新聞情境脈絡下討論，依舊成立。

而在臺外媒的這個情境與國際新聞中以西方世界為中心的特點有極大的關係，國際不只是牽涉兩國以上的政治，更多的是與西方歐美國家有關聯的政治。

作為美國最大的威脅者，中國的一舉一動無不牽動著國際，影響著國際局勢，這也間接造成了國際媒體報導臺灣事務的局限性。

在相同的意識形態下，視角單一、論述重複的報導似乎就是無可避免的結果。國際媒體大量關注金門的報導是其中一個案例。在訪談中，許多記者都提到了編輯指定的金門報導，或是在地新聞嚮導多次經歷來臺的記者要求前往金門採訪的協助。

他（記者）來臺灣，第一件事情就問我說：「我們要去金門報導，要去哪裡買防彈背心？」所以說對方的理解，像是說臺灣已經像烏克蘭一樣，已經開戰了。那你身為 fixer，你要幹嘛？你當然是提供好的，就是說，臺灣其實不是，臺灣目前的狀況是怎樣。（受訪者 TR2）

就像很多媒體，特別是電視，因為他們總是需要好的影像，然後他們會去金門，我想也許對許多人來說另一個最經典的就是去民防課程，現在就像我認識的一位臺灣 fixer 說的，她安排了五家不同的媒體去參加民防課程，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同樣的故事。（受訪者 FL2）

金門鄰近中國，是臺灣重要的軍事據點，從國際新聞價值的觀點來看，金門帶有軍事色彩，能夠呈現臺海的緊張局勢。但金門並不代表臺灣整體，金門人的生活也無法反映出多數臺灣人民的日常。然而，在國際新聞有限的版面，小小的一個金門卻形塑了大多數外國人對於臺灣失真的印象。

我的意思是金門是這些地方之一，在一些媒體上非常突出報導，因為它離中國海岸很近，……，但我的意思是它確實代表了臺灣，而且只是這樣比如一個小地方，我認為臺北的人們永遠不會想到金門，即使對這裡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但它很有趣，但也總是存在著給觀眾帶來誤導性形象的風險，如果你報導這樣的地方的話。（受訪者 FL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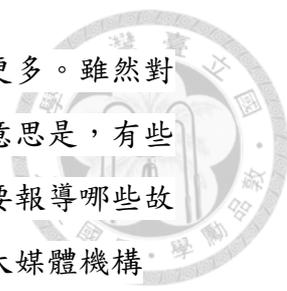
這裡的一些日常生活印象表明，人們並不對軍事演習感到恐慌，也不像想到中國時感到擔心，（臺灣）人們並沒有每天都一樣恐慌。（受訪者 FL2）

除了國際新聞西方視角的意識形態外，新聞實踐中傾向採用菁英觀點也是意識形態的展現之一。在臺灣的情境中，外媒來到臺灣多選擇駐點在首都臺北，而臺北的新聞工作者、臺北的新聞觀點就主宰了臺灣的新聞視角。受訪者 FC2 就認為，外媒集中關注來自臺北的觀點，但這並不能代表全臺灣。

我覺得尤其選舉之後，我發現了那個立法院立法委員，我發現最好還是採訪，臺北之外的那些立法委員，因為臺北不能代表全臺灣的事，而是我發現那個地方的立法委員的，有時候就是觀點跟臺北不一樣的，或是他們比較願意說話的，就很樂意接受採訪的，所以我們就選舉前後的，也覺得最好總能出去採訪了，不要在臺北待著。（受訪者 FC2）

（臺灣記者都是）什麼的媒體菁英出來、出身的，這不免俗的，你會把臺灣的新聞帶得很臺北觀點，我講難聽一點，臺語也不會講，也沒有對臺灣歷史有瞭解，你也對臺灣的政治就是藍綠這樣子。就是你是用一個很菁英的觀點，……，就是同溫層的東西的話，我覺得那個新聞不是我們要的，不應該是一個專業的。（受訪者 TR2）

部分受訪者認為，外媒針對臺灣的許多報導並非來自對臺灣的深入了解，而是受制於編輯、決策層以及外部國際關係的需求。例如，受訪者 FL2 指出，儘管臺灣的新聞需求日益增加，但在許多大型媒體機構中，對臺灣問題有深入了解的記者仍然是少數。



我認為也許更大一些的媒體組織裡，有一些人對中國了解更多。雖然對臺灣新聞有很多需求，但真正了解臺灣的人並不多。我的意思是，有些德國媒體喜歡在特定主題上呼應，但他們不一定是決定我要報導哪些故事的人，而是其他擁有決定權職位的人。所以我想說，在大媒體機構中，真正了解臺灣的人還是佔少數，但有越來越多了。（受訪者 FL2）

這種情況導致了報導中的視角常常受到較為偏狹的認知範疇所局限，尤其是在涉及兩岸關係或地方文化差異（如金門）的報導時，外媒記者往往只能依賴有限的資訊來撰寫報導，進而造成報導的片面性或對某些議題的忽略。

金門對我們來說，像外國一樣啊。那我們要怎麼樣跟他解釋金門跟臺灣跟中國的這個複雜的關係的時候，你就很難跟他說，你就必須要很精準的跟他說，現在金門當地講什麼文？然後跟金門的老人家溝通的時候，用什麼語言，然後金門的歷史脈絡，是什麼？所以身為一個臺北人你能提供的，就是那些我們對金門的了解，那這個這個真的對這個報導是會是公允的嗎？（受訪者 TR2）

透過記者單一視角的報導，限制了外國讀者對臺灣各地歷史文化脈絡的認識，進而影響其報導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尤其是外媒報導常常將焦點放在臺灣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忽略了當地居民的實際生活狀況及文化背景，外媒報導的選擇顯示出，其傾向基於更宏觀的政治框架來決定報導的重點。

以較微觀的角度分析，編輯、記者等新聞工作者的意識形態，例如個人價值觀、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場同樣影響他們對臺灣的報導。尤其是編輯的角色，編輯價值觀對報導的影響顯著，在新聞產製的過程中，編輯扮演著選擇和篩選的角色，他們的立場、政治觀點甚至可能影響新聞的標題、內容的呈現，甚至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自我審查」。許多受訪者提到（受訪者 TR5、受訪者 FX1、受訪者 TR1），外媒記者在報導臺灣的時候，往往會根據國際局勢、報導的版面需



求來進行優先排序。這樣的編輯實踐邏輯的背後也意味著，編輯和記者的選擇並非僅基於新聞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而是會受到報導需求、政治議題的時效性等因素的影響，進一步導致某些議題的「被忽視」或「被放大」。例如，受訪者 TR5 提到，在烏克蘭或以色列等重大國際新聞的關注下，臺灣相關議題的報導需求往往被忽略或縮減，這也顯示了外媒對臺灣議題的設定並非單純出於對臺灣自身情勢的關注，而是與全球政治格局及其他事件的輿論重心密切相關。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可有可無的，你不寫也不會怎樣，那有案例是你提了，他們覺得這個不要做，有就是很多時候都會不要，因為就覺得不夠重要或者是別的地方還有更重要的新聞。（受訪者 TR5）

在此背景下，外媒是否將臺灣的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觀作為報導重點，也成為其意識形態選擇的體現。例如，在臺灣選舉或是國際事件（如美國政客訪臺）發生時，外媒會更頻繁地報導，這時的報導不僅僅聚焦於臺灣的內政，更多的是對臺灣在全球政治中作為「民主堡壘」的形象塑造。

意識形態的展現，不僅影響其報導臺灣的方式，更會對國際讀者的觀點產生深遠影響。根據多位受訪者表示（受訪者 FL2, 受訪者 FL2, 受訪者 FL3），國際讀者視角中的臺灣，與現實生活中的臺灣有所差異，外國讀者透過閱讀臺灣相關報導，經常會有當地即將發生戰爭的認知，有些國際讀者可能會因為外媒報導中的臺灣形象而對臺灣產生誤解，進而影響他們的態度和行動。

在此前提下，研究再更進一步以記者作為研究主體，探討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記者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擁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性。同時，也針對新聞自主性這一塊，探討不同國籍、身份的記者是否呈現出差異性。

### 第三節 國際記者的新聞自主性

透過訪談，本研究發現，大多數身處其中的外媒記者，其實都有清楚意識到臺灣報導問題的，有些記者不只是單純的提出質疑，甚至發展出抵抗的方式。



## 一、臺灣新聞的結構性問題

透過訪談發現，多數駐點臺灣的國際記者清楚意識到報導臺灣議題時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有些記者不僅質疑報導選題的單一性，甚至主動發展出抵抗的方式。首先，國際媒體對新聞價值的衡量往往基於國際讀者的預期。外媒記者在報導時，需迎合國際新聞價值的市場邏輯，特別是自由撰稿記者（freelancer），其收入來源與熱點報導直接掛鉤。一位受訪者指出：「我想講述的每個故事都需要找到有興趣出版並付費的人」（受訪者 FL2）。然而，這種壓力不僅限於 freelancer，連正職記者也需找到具有市場吸引力的題目，才能被編輯採納。

其次，編輯對選題的指導強化了報導的狹隘性。根據訪談，外媒編輯多半專注於地緣政治，尤其是兩岸關係與臺海局勢，這些議題符合國際讀者的既有關注，但也造成了報導內容的重複與單一。

我在第二次或第三次之後才意識到，我現在意識到這不是我想在臺灣講述的那種故事，因為我認為它是重複的，它沒有添加任何新的東西，它並沒有真正深入到表面之下，.....，我的意思是，他們（編輯）對臺灣非常了解，不僅僅是戰爭準備，但這就像編輯最終決定在節目中播放什麼樣的故事。他們總是希望擁有相同的內容，確保我們看到相同的方面，我只是覺得這有點無聊。（受訪者 FL2）

這種事情就是永遠都是這樣，因為我有一個同事在韓國，然後他跟我說他十幾年前來臺灣也在報一樣的事情，就是他好像覺得我沒有報導，沒有，我們好像都在報一樣的東西，所以你什麼時候來都是這樣啊。對啊。（受訪者 TR5）

此外，外媒的組織結構也影響了報導的選題與深度。駐臺記者雖擁有一定的提案自由，但選題和審稿權力大多掌握在母國的高階編輯手中，而這些編輯通常缺乏對臺灣事務的深刻了解。他們多數以東亞或中國為核心視角，進一步限制了對臺灣內部議題的關注。

我認為這是一個大多數國際記者都知道的關於這些問題的事情。他們也總是在思考這個問題，壓力更多來自本國的編輯，因為他們的知識可能更有限，他們總是想到非常具體的故事，大部分是像臺灣保衛自己，反對中國的故事，以及一些媒體比其他人更敏感，對這些更敏感，所以這裡的人們大多數人總是在想，這個啊我們應該報導這個嗎？（受訪者 FL2）

在臺灣的國際新聞報導中，外媒記者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報導的選題與角度常常受到來自編輯的限制，這也使得外媒對臺灣的關注範圍較為狹隘且重複。事實上，身在其中的記者也普遍意識到這個問題，國際新聞報導的重心往往偏向地緣政治，尤其是兩岸關係和臺海局勢，這是符合國際讀者期望的報導範疇。然而，當記者提出涉及臺灣內部議題或是偏離主流地緣政治的報導建議時，卻又會以「國際性」的新聞要素考量而遭到否決，這也暴露了國際新聞過度依賴西方中心觀點的問題。

## 二、記者的抵抗空間與因應策略

在上述背景下，國際記者在臺灣報導中的自主性受到多方面的挑戰，包括報導選題的受限與內容呈現的框架化。受訪者普遍認為，國際新聞價值體系過於依賴西方中心觀點，導致非主流議題的報導頻率低。在權力有限的情況下，新聞工作者發展出不同的應對方式。

### （一）提案

第一個抵抗空間在於提案，在臺灣的國際記者多擁有報題的自由，雖然題目通過與否仍然掌握在編輯手上，但是因為編輯普遍對臺灣事務的不了解，而讓記者自然地擔任起選題、報題的這個角色。



我基本上是那位編輯，你知道她之前對臺灣沒有任何了解，所以我基本上只是告訴她我認為選舉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她已經全然相信我。（受訪者 FL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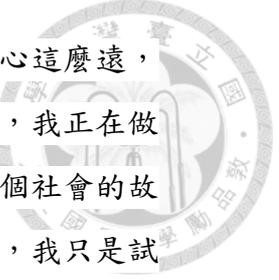
## （二）採訪、撰稿

第二個抵抗空間在於新聞採訪、撰寫的彈性空間。受限於語言上的障礙，許多在地的邀訪、採訪、以及中文文章的撰寫最後都會是由臺灣籍記者處理。即使在同一個題目下，記者可以發揮的空間也相對自由。

當有一個非常大的新聞話題，（編輯）會說「好吧」時，這才是你應該寫的內容。除此之外，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議，也許我們在某個主題上達成一致，但我如何撰寫文章以及採訪哪些專家是我的決定。（受訪者 FL2）

那就是所有的一切安排都有我，就是受訪者是我約，可能也是我提案的題目，採訪也是我做，因為很多時候是用中文採訪，那翻譯也是我做。（受訪者 FL1）

另一個案例為在既定的題目中，偷渡其他議題。受訪者 FC1 指出，關於臺灣總統大選的系列報導，其實編輯並不關心臺灣在地的政策，因此會著重在兩岸關係的新聞，但他策略性的把在地政策議題，如房價問題，加入報導中。



儘管他們應該關心這裡的房價是否低廉，但他們並不真正關心這麼遠，你知道，所以為了涵蓋這一點，我必須再寫一個故事，……，我正在做那個故事，這也是選舉的一部分，……，我想把它當作另一個社會的故事，因為我知道人們會讀到這並不是說我沒有涵蓋這個主題，我只是試圖以一種我能做到的方式來報導它。（受訪者 FC1）

即使在框架受限的情況下，記者仍可利用採訪與撰寫的彈性空間，增添地方特色或多元視角。例如，在總統大選的報導中，有記者選擇以原住民部落作為切入點，藉由採訪當地頭目展現原住民族與主流政治觀點的差異（受訪者 TR1）。

### （三）軟性議題滲透

在新聞週期較為閒暇的時期，記者得以提出與文化相關的軟性議題，將臺灣的多元形象呈現於國際媒體。一位受訪者提到，他成功說服編輯刊登了一篇有關臺灣在地文化的報導，藉此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受訪者 TR1）

## 三、臺灣記者的特殊角色

臺灣記者在外媒中扮演特殊角色，他們肩負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的使命。受訪者 TR1 指出：「我覺得他們在臺北的這段時間，當然是有幫助，臺灣的國際地位的能見度絕對是有提高的，而且他們也會僱用很多臺灣的記者，然後，身為臺灣人，在外籍媒體裡面當然會盡力的去做很多臺灣的軟新聞，像我就一直在努力。」

有趣的是，除了臺灣籍記者，一些外籍記者也展現出分享臺灣在地議題的熱情，尤其是自由記者。他們選擇從普世價值的角度切入，如民主、人權與數位創新等，吸引國際讀者關注臺灣。例如，受訪者 FL2 曾撰寫有關臺灣 LGBT 權益的文章，試圖與母國讀者建立連結。另一位受訪者 FL1 則明確表示，希望能夠在報導中更充分地呈現臺灣人的聲音，讓母國的讀者能夠了解臺灣的歷史、文化，特別是以人權角度出發，他希望更多人能了解臺灣所處的國際困境。

我想說大多數外國人不太了解這一點以及與台灣的聯繫。但我認為台灣很有趣，因為它可以說是東亞乃至整個亞洲最進步的國家，所以如果你談論 LGBT 或其他類似的社會創新，比如數位民主，至少它們是你在台灣發生的有趣的事情。（受訪者 FL2）



從兩位外籍記者的案例可以看出，國際媒體對於臺灣在地議題的重視，不僅限於臺灣籍記者的民族自我認同，同樣可以從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角度，反映記者跳脫國族，對於相同價值的重視。

總而言之，外媒記者的新聞自主性受限於編輯的指導方針和國際新聞價值體系衡量，但他們依然積極尋求突破，努力在報導框架的限制內呈現更多元的臺灣形象。

#### 四、記者與編輯衝突互動

進一步分析與編輯發生衝突時，記者的反應，工作過程中，當與編輯出現意見分歧時，記者的反應也取決於記者的資歷與性格。以受訪者 TR2 以及 TR3 為例，兩人皆為在外媒工作的臺灣籍記者，但因為資歷與個性的差異，在面對衝突時呈現截然不同的反應。與國內記者不同之處在於，在外媒工作的記者又會受到語言熟悉與否的限制而多了一個變動因素。

我就覺得這是什麼爛新聞，我就我就嗆我主管，這樣，我就罵他，為什麼就沒有做這樣，大概是這樣，……，我說你這個什麼爛新聞，我絕對不做，惡性的。（受訪者 TR2）

我不會，因為我不是一個我不是一個太喜歡跟別人 argue 的人，然後然後，再加上因為我也是剛進去，所以我就是都還在學習跟忙亂的狀態，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力氣去跟編輯 argue。（受訪者 TR3）



記者表達不滿的程度，掌握的報導自由度，牽涉記者的工作資歷。同樣兩位受訪者對於反抗與不反抗的解釋分別如下：

他就是因為他也不能拿我怎樣啊。你講真的，我講然後你開除我，你找不到第二個臺灣人來幫你做這件事情，……，那我完全不怕被代替了，除非有另外一個人突然空降，然後花了好幾年，然後把這些東西都達到，然後他所有語言都會，不可能，那根本就找不到。（受訪者 TR2）

而且我畢竟不是英語母語的人嘛。所以很多這種需要 argue 的東西會有點困難，我自己覺得可能還要再做久一點，所以我現在我現在的想法就是等到更熟悉這邊的規則，讀者想要看的東西之後，再來想怎麼樣可以去找一些怎麼怎麼去突破吧？不然以現在的角度來看，確實有點困難。（受訪者 TR3）

受訪者 TR2 因為擁有多國語言能力，以及長期工作累積的人脈，並不擔心表達意見被開除；相反的受訪者 TR3 是組織的新人，不熟悉組織規則，再加上對英文使用並非流暢，因此便會選擇不去抵抗。

總而言之，外媒記者在報導臺灣時，面臨來自新聞市場邏輯與編輯指導方針的多重限制。然而，他們展現出高度的新聞自主性，透過創新選題、採訪策略以及軟性新聞的嘗試，努力突破框架，呈現更多元的臺灣面貌。特別是臺灣籍記者，肩負提升國際能見度的使命，結合民族認同與專業實踐，發掘臺灣的軟實力；同時，部分外籍記者也通過普世價值的視角，讓臺灣的民主、人權與文化創新躍上國際舞台。

這些努力不僅豐富了臺灣在國際媒體中的形象，更凸顯記者的個人資歷與專業素養在新聞實踐中的關鍵作用。未來，如何進一步支持外媒記者在多元議題上的深入探索，將是提升臺灣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方向。



## 第四節 臺灣作為國際新聞基地的潛力與挑戰

在國際新聞版圖中，中國無疑是國際媒體報導主題的重中之重，尤其在 2018 年習近平宣布取消連任後，中國的持續擴張的野心以及中美兩國強權的對峙，都是影響全球政治、經濟等的重要因素，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的報導如此重要。然而在北京逐漸限縮記者新聞自由後，許多媒體組織紛紛出走中國，以《紐約時報》為例，他們將亞洲據點設在南韓首爾；BBC 也在臺北設立新的辦公室。第四節將探討外國媒體駐點臺灣的利弊，分析臺灣的媒體環境作為國際媒體的亞洲基地的優點與缺點。

### 一、新聞自由

然而，雖然中國報導在國際議題上受到相當高的關注，但對於媒體的限制與管控也讓許多記者不得其門而入。討論到在中國的媒體環境，「新聞自由度」會是第一個被詬病的項目，這同時也是臺灣比中國更吸引外媒的重要因素。

臺灣的新聞自由度在國際間有目共睹，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最新發布的 2024 年度「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排名，臺灣自 2023 年第 35 名晉升至第 27 名；中國則是倒數第八名，在 180 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 172 名 (中央社，2024)；而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於 2024 年 2 月 29 日所公布的「2024 年全球自由報告」，臺灣位居亞洲第二，僅次於日本；另一方面，中國則是被列為「不自由國家」(中央社，2024)。

受訪者 TR2 指出，「使用中文的國家，多數都不是民主國家」。在中國，由於中共政府對於媒體的壓迫，「新聞自由」已經逐漸消失在中國的疆域。這意味著，在中國從事工作，需要時時刻刻被政府所監督，而因為政府對於言論的管控，民眾對媒體的不信任，形成了對新聞工作極為不利的媒體環境。根據駐華外

國記者協會 (FCCC) 於 2024 年 4 月發布的「2023 年年度調查」(FCCC, 2024)，雖然 81% 的受訪者表示在中國的報導條件相較以往有所改善，但核心的問題仍然存在，不論是取得長期簽證困難、採訪過程受到阻撓，以及報導敏感議題時受到高強度騷擾等。

根據在中國多年的經驗，受訪者 FC2 表示，在中國新聞言論管控還不是現在這麼嚴格的時期，記者還能夠直接接觸到一些小的政府官員還有普通民眾，採訪沒有受到這麼多限制。當時作為一位外國記者，甚至還有一些優勢，因為有些較敏感的話題，讓中國人去報導是可能受到壓力的或威脅的，這時就會交給他來做。此外，當時的中國，往來臺灣、香港還是很自由，可以接觸到兩岸三地的採訪機會。但是在習近平上臺後，在中國的新聞工作變得越發艱難，被跟蹤是家常便飯，受訪者 FC2 表示，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甩掉跟蹤者。而在受訪者 FC2 被拒發簽證的最後幾年，他進行了新疆問題的報導因此被政府所盯上。

我知道他們會不會高興的，但是我知道不做也不對吧？畢竟是新聞，該寫的要寫的，該做的要做的。(受訪者 FC2)

另一位在中國待過的受訪者 FL3，當時他仍然是一名 *freelancer*，以商務簽證而非記者簽證的身份在中國默默進行報導。他表示，在沒有記者簽證的情況下，雖然無法參加政府新聞發佈會、記者會的邀請，但好處是不會因為記者的身份而被跟蹤，也不會讓消息來源身陷麻煩。因為在中國跑新聞，記者除了自身安全外，也需要考慮到當地消息來源的人身安全。

但在北京，如果你第一次見到這個人，有人可能會分享你的消息來源，因為如果那些消息來源被一個不夠小心的人聯繫的話，他們可能會遇到麻煩，.....，還有一件事是，當你與你認識的人交談時，如果你在社交媒體上談論一些敏感的事情，它也會受到監控，.....，你必須考慮的事情，不僅是社群媒體，還包括電子郵件、電話。(受訪者 FL3)

受訪者 FL3 表示，2010 年在中國進行報導，大多數人對於外媒是帶有好  
奇心且友善的，但在習近平上臺後，中國加大民族主義的宣傳，他發現當地人對  
於外國人，尤其是外國記者變得更加懷疑且帶有敵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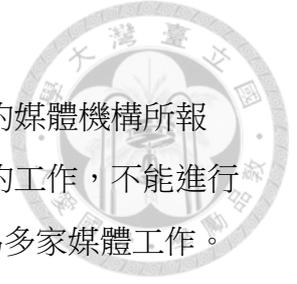


你說你是記者，那麼在 2015 年、2016 年，人們會比 2010 年更加小心，  
甚至更敵對，我聽說現在情況更糟。（受訪者 FL3）

在這樣的前提下，臺灣的新聞自由在華文世界中便是一項引以為傲的特質，  
許多受訪者都提到了在臺灣從事新聞工作享受高新聞自由度的優點。受訪者 FL2  
認為，臺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記者可以很容易的與消息來源溝通，而不受其他  
外界壓力所影響；受訪者 TR1 指出，在臺灣寫新聞的自由度很高，想要報導什  
麼主題都不會有任何審查，也不會來自任何官方、團體的壓力，要求記者報導或  
者不報導什麼議題，且尋找到一位願意受訪的對象非常容易，相較於中國，在臺  
灣不管是政治人物或是路上民眾，對外媒都有一定的信任程度，願意分享看法。  
採訪議題的自由也是其中之一，舉例來說，中國對於宗教文化議題上有諸多限  
制，受訪者 FC2 剛來臺灣時即對臺灣豐富多元的宗教活動感到驚豔，因為這是  
他在中國無法報導的新聞主題。

此外，不只是採訪的自由程度高，在新聞工作者的角色而言，相比中  
國，臺灣也有更豐富多元的外籍記者型態。在中國，記者的定義相當嚴格，受訪  
者 FL3 和 FL2 皆指出，中國不允許 *freelancer* 存在的，若沒有記者簽證、沒有一  
個固定所屬的媒體機構，記者是不能進行採訪報導的。

在北京有一個自由職業者，他本來已經在北京生活了好幾年了，和我類  
似，喜歡為各種媒體工作，現在他們改變了規定，所以為了獲得記者簽  
證，你需要有一個主要雇主，這樣他們基本上就讓他的工作方式變得不可  
能，……，實際上兩個月前他離開了北京，現在住在首爾，所以他必須  
離開。因為他們讓自由記者現在無法在中國生活。（受訪者 FL2）



同時，即便擁有記者簽證，若記者為其他不符合登記資料的媒體機構所報導，也屬於違法的行為。舉例來說，在中國的學生或記者以外的工作，不能進行任何採訪報導。受訪者 FL2 表示，通常一位 *freelancer* 必須為多家媒體工作。而這樣的規範對四處投稿的 *freelancer* 來說，想在中國生存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中國外交部告訴他（*freelancer*），他只能為他所服務的媒體工作，但這變得更加困難，只待在中國對 *freelancer* 來說是不切實際的。（受訪者 FL2）

相較於中國，在臺灣的記者也有更高的自由度與其他記者合作。以外媒協會組織為例：在中國，所謂的「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在北京政府眼中仍然是「少數對中國抱有偏見的記者拼湊的」的組織，根據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這個協會「根本代表不了在華近 500 名外國記者的真實聲音」（美國之音，2023）。反之，臺灣的 TFCC 聚集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不定期由組織所舉辦公開記者會、研討會，提供外媒記者各種資源。受訪者 FL3 也提到，因為來臺記者增加，TFCC 逐漸壯大，這反而讓其他組織開始主動聯繫 TFCC，而這在過去幾乎從未發生過。

首先在中國，幾乎不可能舉辦像你所知道的這些公開活動，以及像我們這樣的團體。我認為這在中國會被禁止，你知道當局會問你為什麼要組織自己，所以在中國，我認為他們就像這些孤立的記者或媒體一樣。

（受訪者 FL2）

而旅行、移動的自由也是外媒記者考量的因素之一，尤其對於許多西方媒體的駐華記者而言，單一的亞洲國家並非是工作的全部，還需要考量在多個城市之間移動的工作型態。



我還認為航班連接絕對令人驚嘆，你可以去任何地方都非常快，所以非常方便。（受訪者 FC1）

受訪者 FC1 表示，「我認為我最關心的是我可以毫無問題地工作」，因為他的工作不只是中國記者，更是東亞記者。對受訪者 FC1 而言，由於報導內容涵蓋整個亞洲，因此需要考慮在哪個城市駐點最為便利與安全。

在這裡（臺灣）更容易，我不會一直與當局有衝突、我不需要做所有這些文書工作、我不需要僱用助理，如果你在中國大陸，你必須僱用一名助理，這需要很多錢，我不確定我的報紙是否能做到這一點。（受訪者 FC1）

然而，選在駐點臺北的受訪者 FC1，卻也因此受到北京政府的「懲罰」，表示他在臺灣工作的期間無法入境中國。而受訪者 FL3 因為早年被中國列入黑名單，但他仍想留在華語世界報導中國，因此香港、臺灣成為兩個他主要考慮的地點。當時為 2016 年，香港反送中事件尚未發生，但他想到了香港 2014 年的雨傘革命，認為在未來香港還會面臨相同困境，因此選擇了相對自由的臺灣。

對於外媒記者而言，長期居住在當地，影響的不只是工作，更牽涉日常生活。受訪者 FL2 認為，臺北的生活相較於香港、首爾等其他大城市，經濟上相對容易負擔。

像過去兩三年的臺灣一樣，臺灣已經成為對 freelancer 來說最好的地方之一，因為它很容易到達，而且與生活在香港、首爾或大城市的一些人相比，它並不那麼昂貴，而且在臺灣總是有新聞需求。（受訪者 FL2）



受訪者 FC1 指出，臺灣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與其他城市（如東京）相比，要找到規模大的社群不太可能，「你在臺北找不到韓國城，但你可以找到韓國人，但肯定但不是太多」。但另一方面，臺灣的首都臺北是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城市，在這裡可以結識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對外國人非常開放，外國人在當地也很容易融入，對受訪者 FC1 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在享受臺灣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之餘，來到臺灣的外媒記者同時要面對在臺灣做新聞的種種先天限制與挑戰。不管是選擇來到臺灣或是離開臺灣，媒體記者的核心考量終究回到臺灣作為國際新聞基地的利益衡量。

## 二、臺灣議題的新聞價值

即便如此，如同先前研究所提及（Neilan, E., Sun, M., & Lo, ven-hwei, 1996; 陳祥、陳嘉珮，2009；李又如，2023），在臺灣的外媒最關注的議題仍然是與中國有關的新聞，這點也在受訪者的談話中得到驗證。許多受訪者都提到，他們在臺灣所進行的新聞報導中，絕大的篇幅是有關中國的報導，「（與中國）都是有相關的，大部分，應該是 70% 以上的」（受訪者 FC2）。

我最終關注的是與中國的關係，就像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樣，……，我的報導涵蓋了很多事情，我不知道該如何告訴你，是來自中國的持續威脅，中國是第一故事，這是最主要的故事。（受訪者 FC1）

根據受訪者，外國讀者最感興趣的臺灣新聞莫過於牽涉兩岸之間的議題，新聞的背後，終究離不開臺海間複雜的政治關係。

海峽兩岸，是否會發生戰爭，然後我也可以看到最近也有人對半導體和微晶片感興趣，我有時會寫一些有關它的文章。（受訪者 FL3）

他們的探討可能都會是一樣的，就是他們的，就是中國會不會打過來中國，會不會侵略臺灣，就是就是他這一些這些新聞的內容。（受訪者 FX2）



不只是對兩岸問題的特別關注，外國媒體處理臺灣議題的方式，很多時候也會試圖將臺灣所發生的事務與中國加以連結，受訪者 FX2，很多與中國無關的臺灣議題，外媒的報導中也要加入兩岸問題的討論，讓他覺得很可惜。

它不是一個需要透過中國才能夠達到的論述，可是為什麼一定要牽扯到中國？可是很可惜現層面就是，臺灣，在西方媒體的價值裡面，可能中國跟臺灣之間的關係是比較會吸引閱聽人注意的一個議題，所以好像臺灣的定位就在於，要跟中國之間有任何的關係，才會是一個值得報導的新聞。（受訪者 FX2）

探討背後的問題，其實與國際新聞的價值衡量有很大的關係，而在今日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下，新聞價值的考量變得更加明顯與現實。新聞版面有限導致媒體需要嚴格篩選報導內容，時刻變動的國際新聞局勢就是記者考量的因素之一。當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戰火頻傳，臺海漫長的對峙在相比之下便會被其他更具時效性、更即時的新聞事件所取代。

因為可能因為其他地方有發生比較嚴重的戰爭，或者是例如說像川普被刺殺的時候，就是全球的頭條都跑過去那邊，那像加薩走廊的，這個 focus 也是還有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也是所有的 headline 會跑去那邊。（受訪者 TR1）

受訪者 FX1 在一次擔任在地新聞嚮導的工作期間，與一位臨時派來臺灣採訪的記者合作，報導臺灣總統大選。但在採訪結束後，記者便收到電視臺表示刪

減臺灣總統大選新聞的消息，因為當時其他國家發生了更具有新聞價值的天災消息。



反正全世界都在發生很大的事情，讓臺灣總統大選這件事情就顯得非常的不重要，那連總統大選都顯得那麼不重要，何況是其他臺灣比較沒有連結的報導，就他們的考量是這樣，我覺得好像也是可以理解。（受訪者 FX1）

當你進行選舉時，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後也許現在什麼都沒有發生，因為什麼也沒有發生，而你有美國大選，你有中東，它真的有起起落落。（受訪者 FL3）

另外，各國媒體資源緊縮的也是造成媒體高度競爭的原因，不少媒體難以負荷駐外記者的開銷，因此從外國媒體在亞洲區的佈局便可以看出這些媒體組織對於新聞價值的判斷以及資源的分配。常見的做法會是讓特派員駐點於具有影響力的城市（例如北京、東京）等，當其他鄰近國家發生新聞事件時，再讓特派員在不同城市間移動，以減少開支（受訪者 FC1 即是案例之一，他負責報導亞洲區的所有消息，並非只負責臺灣的新聞，必須經常前往不同城市報導）。另一個作法是，增加與在當地的在地新聞嚮導合作，或是雇用在當地的外國記者 (Foreign foreign correspondent)，這些都是外籍媒體增加國際新聞的方式。

我們國家的傳統媒體，其實經費一直都嚴重不足，尤其是報社，其實沒有什麼錢了，因為現在沒有人要看報紙了，所以他們一直很 struggle。那只有很少數的大報紙還有養自己的特派員，他們還有所謂的駐中國特派員，所以中國還是重要的。那第二個，可能如果在東亞地區，可能就是日本，但不太會輪到臺灣，對他可能就是會從北京、上海，或者東

京，去 cover 臺灣，當然他們定期也是回來臺灣去做一些調查的訪問。

（受訪者 FL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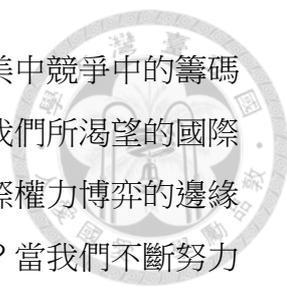


受訪者 FX1 指出，根據他與外籍記者的合作經驗，有許多記者都會告訴他，其實他們也對臺海危機以外的臺灣事務感興趣，但是現實就是，媒體組織缺乏資源去做更多的報導。

他（記者）自己覺得臺灣有太多太多有趣的事，就是我們在車上，他就一直跟那個駐地記者一直在有點像是遊說，也是有一次跟他說，因為臺灣其實有好多好有趣的事情，包括甚至是好像還講到了原住民的事情，一直都很有趣，但是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些大媒體沒有辦法去脫離臺海危機之外（做報導）。（受訪者 FX1）

臺灣作為國際新聞基地具備潛力，特別是在新聞自由度和媒體多樣性方面。然而，當外媒面臨選擇中國或臺灣作為亞洲分部據點時，仍存在不少挑戰。雖然臺灣的新聞自由和民主制度成為吸引外媒的重要優勢。相較中國嚴格的新聞管制，臺灣不僅允許媒體更自由地報導敏感話題，也支持更多元的外籍記者形態。但臺灣政府和媒體的親密互動雖便於新聞工作，但可能淡化了監督職能，影響外媒記者對消息的客觀性要求。此外，由於臺灣地理及文化環境的限制，外媒難以深入報導中國內部動態，僅能以兩岸關係視角切入，限制了報導多樣性。加上新聞議題依然高度聚焦於中國議題。外媒在臺報導多數集中在臺海安全、兩岸緊張局勢等與中國密切相關的話題，而非臺灣本土議題。臺灣的新聞價值仍多依賴於中國在全球影響力中的地位，限制了臺灣新聞在國際媒體中的獨立定位，對吸引外媒長期駐臺構成挑戰。

在探討臺灣是否應成為國際新聞基地時，值得思考這個定位的真正意義。追求成為外媒聚集地的背後，是否隱含了某種認同需求？我們是否過於在意國際媒體的視角和評論，而忽略了自身的媒體發展與主體性？外媒駐臺固然能提升國際社會對臺灣的關注，尤其是在兩岸關係的緊張時刻。然而，這種高度聚焦於「臺



海危機」的框架，是否僅僅強化了臺灣作為中國對立面、或是美中競爭中的籌碼的形象？如果臺灣的新聞價值持續被定義為中國的延伸，那麼我們所渴望的國際能見度，究竟是在彰顯臺灣的多元社會面貌，還是被綁架在國際權力博弈的邊緣地帶？成為國際新聞的基地是否真的符合臺灣社會的長期利益？當我們不斷努力迎合國際媒體的需求，是否會犧牲自己對議題的自主性與主導權？或許，與其被動接受外媒的「報導需求」，我們更應思考如何培養本土媒體的自主性，以臺灣的角度出發，向外界講述不僅僅有「中國背景」的臺灣故事。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真正從媒體自主性中找到定位，而不僅僅是成為國際新聞視角中的一個旁觀者。

綜上所述，本研究分析了在外媒大量來臺的特殊時期，外媒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實踐，揭示新聞工作所受到多層次因素影響的特質，並梳理了臺灣作為國際媒體駐點的優勢與現實挑戰。這些發現不僅呈現出外媒記者如何在地緣政治變遷中調整其角色與報導框架，也反映了臺灣在國際傳播生態中的獨特地位。上述分析將作為後續探討臺灣作為國際媒體基地潛力的基礎，為更全面理解臺灣在全球媒體版圖中的定位提供重要依據。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全球地緣政治局勢變化的背景下，臺灣逐漸成為外媒駐點的重要基地，尤其在 2022 年更出現前所未有的外媒駐點高峰。本研究旨在探討外媒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實踐與影響因素，通過深度訪談和文獻回顧，探討記者個人、媒體常規、組織編輯互動以及媒體外部因素和意識形態框架對外媒記者報導模式的影響。

本研究首先回顧在臺外媒的發展脈絡，將新冠疫情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疫情前的臺灣在國際媒體版圖中長期處於邊緣地位，外媒駐點記者多以報導中國新聞為主，臺灣本地議題較少受到重視。當時的外媒記者採用高效率但資源受限的「一人作業」模式，工作方式高度依賴臺灣國內媒體，進一步侷限了報導的深度與廣度。此外，政府與外媒的互動體系尚未成熟，媒體圈資源貧乏，對外媒記者的支援不足，使臺灣的國際新聞影響力受到限制。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的封鎖政策和媒體管控迫使大量外籍記者轉向臺灣作為暫時駐點地。臺灣憑藉穩定的防疫成果和開放的媒體環境，成為外媒報導中國新聞的「中繼站」。然而，此時的臺灣本地新聞仍未成為外媒的核心關注點，大多數記者選擇臺灣僅作為等待返回中國的過渡選項。2022 年以後，隨著烏俄戰爭和裴洛西訪臺事件，臺灣的地緣政治重要性驟然上升，吸引了大量外媒駐點。外媒數量達到歷史高峰，臺灣逐步從「庇護所」、「中繼站」轉變為一個更具新聞價值的駐點，報導主題也拓展至臺灣的防疫成果、兩岸關係及地緣政治議題。此時期，臺灣外國記者會 (TFCC) 的規模迅速擴大，顯示出國際媒體對臺灣的關注顯著增強。然而，研究亦指出，新增的外媒記者多以自由記者或亞洲特派員為主，反映出臺灣尚未完全具備吸引大量全職特派員長期駐點的條件。

在裴洛西訪臺過後，外媒對臺灣的關注熱潮達到高峰，但隨後逐漸冷卻，駐點記者數量有所回調。部分記者認為臺灣在報導中國新聞上的便利性有限，尤其在中國人社群和資訊來源的獲取上面臨挑戰。此外，媒體組織基於成本效益的考量，開始縮減臺灣駐點規模，例如 BBC 的臺北分部縮編，顯示出臺灣的新聞吸

引力仍受限於地緣政治與國際新聞市場需求的權衡。儘管如此，臺灣在疫情後的國際新聞地位顯著提升，展現了其作為亞洲新聞駐點的潛力與挑戰並存的現實。

整體來說，本研究揭示了疫情後外媒在臺灣的數量增長雖然提升了國際關注度，但臺灣在地議題仍未成為報導的主流重心。

## 一、國際媒體在臺報導的選擇考量

從影響層次理論的分析角度出發，本研究發現外媒記者的新聞實踐受到個人特質、常規操作、媒體組織結構與外部環境的綜合影響，這些層次相互交織，共同形塑了國際媒體中，臺灣報導的內容與框架。

在個人層次方面，記者的語言能力和背景是影響其報導實踐的關鍵因素。例如，能熟練使用中文的記者，可以直接從臺灣本地媒體、政府發布會和社群動態中獲取新聞資訊，報導更具在地深度；而不會中文的記者則依賴在地新聞嚮導提供翻譯與新聞建議。在地新聞嚮導不僅是語言橋樑，也是文化的解碼者，幫助記者理解在地脈絡，並影響報導框架。然而，在地新聞嚮導本身的背景（如菁英背景或臺北觀點）也可能導致其建議缺乏多元性，限制了外媒新聞的全面性。此外，記者的個人興趣與身份也對選題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臺灣籍記者，他們常試圖突破兩岸框架，報導更多關於臺灣文化與歷史的議題，但這些努力在組織層次的編輯需求下面臨挑戰。

在常規層次方面，外媒記者的消息來源多元，包括臺灣本地媒體、TFCC、各政黨 LINE 群組以及社群媒體等，但這些來源的品質參差不齊。有記者認為，臺灣本地媒體的娛樂化與零碎化特性，讓部分記者質疑其參考價值，而在地新聞嚮導則是在補充消息來源上扮演關鍵角色，提供對記者有用的受訪者名單或角度建議。政府與記者的互動也展現出臺灣媒體文化的獨特性，例如外交部等機構頻繁發布新聞稿，並透過贈禮或友好活動拉近關係。然而，這種互動模式雖便利記者工作，卻可能模糊媒體監督功能，挑戰新聞倫理。

在組織層次方面，編輯的偏好對新聞框架具有決定性影響。國際媒體的議題選擇更傾向於與中國相關的臺灣新聞，而臺灣內部政治或地方議題則被視為「地方化」而遭忽略。記者稿件中的措辭或角度，常因編輯的調整而偏離原意，反映

出組織運作中對地方知識的忽視。此外，編輯的選題更傾向迎合國際讀者對地緣政治的關注，強化中國框架，限制了臺灣多樣化議題的呈現。

在媒體外部層次，政府與外媒的互動，以及地緣政治背景下的報導需求，進一步影響了新聞實踐。臺灣政府對外媒的友善態度與頻繁互動，在促進報導便利性的同時，也對記者的獨立性提出挑戰。另一方面，臺灣的外媒駐點角色因地緣政治而逐漸突顯，但缺乏中國人社群的現實限制了其作為中國新聞中繼站的功能，部分記者為此轉向其他城市尋找多元視角。

在意識形態層次，國際媒體的報導框架深受地緣政治語境影響，臺灣經常被描繪為「民主堡壘」，以迎合國際讀者的政治預期，而對臺灣內部文化和社會議題的呈現則相對稀缺。編輯的價值取向進一步強化了這一框架，導致臺灣新聞在國際報導中常被簡化為地緣政治敘事的一部分，忽略了臺灣的多元性與複雜性。

綜上所述，國際媒體在臺灣的報導實踐受多層次因素影響，個人、常規、組織及外部環境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外媒對臺灣的報導內容與框架。這些層次的相互交織，不僅揭示了新聞生產過程中的結構性限制，也反映了地緣政治與媒體文化對臺灣國際形象的深遠影響。

## 二、臺灣作為國際媒體基地的關鍵環境條件

臺灣作為國際媒體報導基地的地位，逐漸在地緣政治與媒體生態的轉變中突顯。臺灣的媒體環境具備多項優勢，但同時也存在限制，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臺灣在國際媒體版圖中的特殊角色。

### （一）開放的媒體環境與言論自由

臺灣相較於區域內其他國家或地區，具備高度自由的媒體環境與言論保障，這使得國際媒體在臺灣的採訪與報導工作相對便利。受訪者一致指出，臺灣政府對外媒的態度友好，不僅提供簽證便利，還透過外交部等機構向外媒定期發布新聞資訊，這為外籍記者的的工作提供了基礎支持。此外，臺灣沒有嚴格的媒體管制，記者可以自由探討政治、社會和文化議題，這些特性與中國等地對媒體的高度管控形成鮮明對比。



## （二）地緣政治的戰略位置

隨著美中對立加劇，臺灣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顯，成為外媒關注的焦點。特別是近年來，臺海議題因中國軍事威脅升溫，吸引了大量國際媒體將目光轉向臺灣。例如，裴洛西訪臺事件及烏俄戰爭引發的地緣政治聯想，使國際媒體更加積極報導與臺灣相關的議題。臺灣作為「民主堡壘」的角色不僅增強了其在全球新聞框架中的存在感，也成為外媒選擇駐點的重要考量。

## （三）便捷的採訪環境與資訊獲取

臺灣的行政效率與資訊公開程度在區域內表現突出，記者無需經歷繁瑣的申請手續即可取得受訪對象的聯繫資訊，這一特性尤其受到外籍記者的肯定。相比之下，韓國和日本等地採訪政治官員需要經過繁瑣程序，而在臺灣，記者能較輕易地與立法委員、地方議員甚至高層官員建立聯繫。LINE 群組、社群媒體等管道亦成為外媒記者接收政府與政黨消息的快捷途徑，使得資訊的取得更加便利。

## （四）多樣化的本地消息來源與國際支持

臺灣本地媒體、TFCC 以及在地新聞嚮導的支持網絡，為外籍記者提供了多元的消息來源。TFCC 作為國際記者的交流平臺，定期舉辦記者會、研討會與小組討論，增強了外媒記者之間的合作與資源共享。此外，臺灣媒體雖然被批評為資訊零碎與娛樂化，但仍為外籍記者提供了深入了解當地動態的重要基礎。在地新聞嚮導作為文化解碼者，進一步彌補了記者在語言與文化上的不足，幫助外媒進一步接觸在地消息來源。

## （五）文化開放性與跨文化適應性

臺灣的社會文化展現高度的多樣性與開放性，能夠快速適應國際媒體記者的需求。與東亞其他地區相比，臺灣人對外國記者普遍態度友善，政治人物與媒體的互動關係更顯親密，這有助於記者取得第一手資訊。然而，過度親密的媒體文

化也引發部分記者對新聞獨立性的擔憂，例如政府贈送伴手禮或頻繁舉辦特定媒體活動，可能模糊媒體與政府之間的界限。



### （六）臺灣的局限性與挑戰

雖然臺灣具備多項優勢，但仍面臨若干挑戰，限制了其作為國際媒體基地的潛力。首先，臺灣缺乏中國人社群，對於以報導中國新聞為主的外媒記者而言，這是接觸中國觀點的重要障礙。其次，部分國際媒體仍將臺灣視為短期「中繼站」，其長期駐點價值受到質疑。最後，臺灣的新聞價值在國際媒體中過於集中於地緣政治框架，內部文化與社會議題的多元性未能充分展現，導致外媒報導的視角仍顯單一。

## 三、國際讀者需求與臺灣在地議題呈現的平衡

外媒記者在臺灣的報導實踐面臨兩種需求的拉扯：一方面是國際讀者對於地緣政治議題的強烈關注，另一方面是臺灣在地議題的多樣性與獨特性。

不可否認的是，在多數情況下，外媒仍會選擇聚焦於兩岸關係、臺海軍事緊張等與全球局勢密切相關的話題，這些議題滿足了國際讀者的期待，也符合國際新聞價值中的「鄰近性」與「衝突性」原則。這種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對臺灣內部社會議題的呈現，導致報導內容較為片面，難以展現臺灣的多元形象。外媒記者在臺灣的報導實踐顯示，國際讀者需求與在地議題的平衡是一項長期挑戰。國際讀者往往對臺灣的報導抱有既定期待，尤其關注兩岸關係、臺海局勢等具國際影響力的政治與軍事議題。這使得外媒在選題時，通常以符合國際讀者偏好的框架進行內容取捨。這種平衡的努力表明，外媒並非完全忽略臺灣內部議題，而是受限於編輯偏好和國際新聞價值選擇的制約。這種平衡的努力表明，外媒並非完全忽略臺灣內部議題，而是受限於編輯偏好和國際新聞價值選擇的制約。

對此，根據訪談得知，臺籍記者相較於外籍記者展現出對報導臺灣在地事務更高的積極性，並在既有的結構制度下，找尋抵抗的策略。相較過去，部分記者不再以中國為報導重心，而是加入了更多臺灣在地視角與連結。在外媒工作的新聞工作者呈現不同方式的抵抗，展現記者的新聞自主性。例如，在外媒工作、與

外媒記者合作的臺灣記者、在地新聞嚮導在這一方面也發揮了重要影響力，對於報導議題選擇和切入角度能有更多元以及更貼近真實的新聞呈現；而自由工作者的加入，也為主流新聞敘述帶來不同視角的激盪與可能。



綜合而言，臺灣作為國際媒體基地的崛起，既得益於其開放的媒體環境、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與便捷的採訪條件，但同時也面臨持續吸引力的挑戰。未來，臺灣能否進一步鞏固其在國際媒體生態中的地位，將取決於其如何突破當前的報導限制，並在地緣政治之外展現更具多樣性的新聞價值。

## 第二節 研究預期貢獻

### 一、學術貢獻

本研究結合影響層次理論，將其框架應用於分析外籍記者在臺灣的新聞實踐，填補了過去研究中對臺灣外媒生態圈較少關注的學術空白，同時也分析臺灣特殊的國際處境與特殊時期。過去的影響層次理論多集中於記者在西方國家媒體的實踐環境，本研究則將焦點放在亞洲特殊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探討語言、媒體文化、媒體組織、意識形態等多層因素對外媒記者工作的影響，提供了新的觀點與實證支持，深化了該理論在非西方背景中的適用性。

本研究也深入分析了疫情後外媒駐臺數量增加的原因，揭示了疫情帶來的媒體版圖變化，特別是外媒記者在中國封鎖下的地點選擇策略，以及臺灣作為「中繼站」與「報導據點」的雙重角色。這部分對於理解外媒如何因應全球政治局勢變動具有參考價值，特別是在全球化受限的背景下，媒體報導模式的區域化與本地化趨勢。

本研究揭示了臺灣特有的媒體文化對外媒記者實踐的影響，例如政府過度熱情的「公關文化」、媒體與政府互動中的模糊界限等，這些現象對於新聞倫理和記者獨立性提出了挑戰。透過訪談與案例分析，本研究為亞洲媒體文化如何影響外籍記者的新聞實踐提供了實證資料，豐富了關於媒體文化差異對國際媒體運作影響的學術討論。

研究指出，外媒記者的報導框架受制於母國媒體的編輯立場與意識形態。這些框架往往將臺灣置於地緣政治的宏觀敘事中，例如「民主堡壘」或「抗中前線」，忽略了臺灣本地社會文化的多樣性。這部分研究揭示了國際媒體報導臺灣的選題偏向，並對全球化時代媒體敘事的單一性提出了批判性反思。

## 二、實務貢獻

透過訪談資料，本研究總結了外媒記者在臺灣面臨的實務挑戰，包括語言障礙、資訊來源限制，以及與政府機構的互動問題。這些分析可作為外媒記者適應臺灣媒體生態的指南，幫助他們更高效地進行新聞採訪與報導，減少跨文化溝通中的摩擦。對於外媒組織而言，研究指出，臺灣的新聞價值雖因地緣政治的升溫而提升，但其資訊來源與文化背景의 局限仍需注意。本研究建議媒體組織在臺灣駐點記者的配置上，應結合語言能力、在地經驗與對臺灣議題的深度理解，優化駐點記者的結構。此外，研究揭示臺灣政府在與外媒記者互動中的「過度熱情」問題，對外媒記者的獨立性和新聞價值產生一定影響。研究建議政府應優化媒體服務策略，減少形式化的公關行為，注重提供更有深度與價值的資訊，避免影響外媒報導的公正性與可信度。隨著臺灣在疫情後的國際能見度提升，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制定更全面的媒體政策，增強與外媒的合作策略，特別是在選舉、文化與人權議題上。透過深化外媒對臺灣內部議題的認識，擴展其報導範圍，助力提升臺灣的國際形象與軟實力。臺灣的媒體生態因疫情後的外媒進駐而發生變化，研究建議相關政策制定者應重視媒體生態的長期規劃，促進國內媒體與外媒的互補發展，避免臺灣媒體文化過度依賴國際媒體敘事，失去自主性。

另一方面，臺灣在外媒中的角色從庇護所、中繼站逐步向報導前線的轉型，這種轉變有助於臺灣議題進一步融入全球輿論場域。本研究的分析為臺灣如何強化自身的國際話語權提供了實證支持。研究內容中對政府與外媒互動模式的探討，不僅揭示了媒體文化與新聞獨立性的矛盾，也為記者如何在跨文化報導中平衡專業倫理與實務需求提供了參考。這部分討論對於臺灣媒體工作者、外媒記者乃至學界均具有啟發意義。

###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揭示了外媒在臺灣的報導實踐及其受到的多重層次的影響，但仍存在一些限制需進一步探討。首先，研究樣本的多樣性有所不足，受訪者主要集中於特定國籍與媒體類型，未能全面代表外媒駐臺的多元現象，尤其是對亞洲地區媒體的考察較少。此外，研究方法以質性訪談為主，雖提供了深刻的個人經驗洞察，但對於外媒報導臺灣議題的總體特徵及趨勢缺乏量化支撐，難以完整呈現報導框架的全貌。再者，由於國際媒體的關注焦點易受地緣政治變化影響，本研究的結論具有一定的時效性，未來可能因臺海局勢或全球媒體動態而需重新檢視。最後，本研究聚焦於外媒報導的產製層面，對於具體內容的分析及其對國際讀者認知的影響仍有待深化。

基於上述限制，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樣本多樣性，納入更多地區媒體、短期駐點記者及自由記者，並結合量化分析方法，從報導頻率、敘事框架及讀者回饋等層面進行更全面的探討。此外，對外媒駐臺的長期趨勢進行觀察，特別是在地緣政治緊張消退後的媒體布局變化，有助於理解臺灣在國際媒體中的長期地位。同時，應進一步分析外媒報導臺灣的內容特徵，特別是臺灣形象的塑造及其對國際讀者的影響，提出平衡敘事的實踐建議。最後，深化國際媒體與臺灣本地政府及社會互動的研究，特別是如何在媒體自由與新聞倫理之間找到平衡，探索建立更專業化的外媒支援機制，將為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提供有力參考。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BBC 記者憂安全離京撤至台灣 台：傳媒等組織駐台量增 港組織遲疑懼觸國安法。(2021 年 4 月 1 日)。美國之音。

<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htm/tw-bbc-04012021093432.html>

RSF (2021)。中國新聞業大躍退。無國界記者組織。[https://safety.rsf.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2021-01-31\\_china\\_report\\_tc\\_0.pdf](https://safety.rsf.org/wp-content/uploads/2022/11/2021-01-31_china_report_tc_0.pdf)

SHEAR, M. D.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中美同意放寬記者簽證限制。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usa/20211117/us-china-journalists/zh-hant/>

Yang, W. (2020 年 3 月 18 日)。中美媒體角力升級 北京驅逐三報社記者。德國之聲。<https://www.dw.com/zh-hant/中美媒體角力升級-北京驅逐三報社記者/a-52814375>

人民網 (2020 年 3 月 28 日)。外交部新聞司就三家美國媒體發行人公開信向有關媒體提出嚴正交涉。人民網。

<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20/0328/c40606-31651876.html>

中國外交部約見 3 美媒：有怨氣去找美國政府發洩。(2020 年 3 月 28 日)。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003280037.aspx>

方可成 (2020 年 3 月 19 日)。方可成：歡迎駐華記者，才能減少外媒對中國的偏見。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319-opinion-china-us-journalists-eviction>

王月眉、黃安偉 (2020 年 5 月 11 日)。川普政府對中國記者實施新簽證限制。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usa/20200511/china-journalists-us-visa-crackdown/zh-hant/>

王剛 (2024 年 5 月 3 日)。世界新聞自由日 外媒記者談中國報導：「他們現在不需要外媒」。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7595718.html>

王毓莉 (2012)。馴服 v.S. 抗拒：中國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新聞專業抗爭策略。新聞學研究，(110)，43-83。

[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1\\_\(110\).0002](https://doi.org/10.30386/mcr.201201_(110).0002)

- 
- 王照坤（2022 年 5 月 17 日）。駐台外媒 75 家 外交部：兩年來增幅逾三成。中央廣播電臺。<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33126>
-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 台灣升至 27 名中國倒數第 9。（2024 年 5 月 3 日）。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405030293.aspx>
- 外交部新聞司就三家美國媒體發行人公開信向有關媒體提出嚴正交涉。（2020 年 3 月 27 日）新華網。  
[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27/c\\_1125779127.htm](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27/c_1125779127.htm)
- 冷若水（1993）。華府十八年。北市記者公會。
- 吳育仁（2011）。勞動過程與勞動主體性：地方記者職場勞動之政治經濟分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5（1），1-37。  
<https://doi.org/10.6785/spsw.201106.0001>
- 呂伊萱（2022 年 5 月 17 日）。外媒出走中港轉駐台 外交部：現有 75 家國際媒體駐點。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29262>
- 李又如（2023 年 4 月 13 日）。一躍成為經濟學人封面：臺灣如何成為外媒焦點。readr。<https://www.readr.tw/post/2937>
- 佩洛西訪台：不顧中國激烈反對 佩洛西訪台宣示美台團結。（2022 年 8 月 3 日）BBC NEWS 中文。<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62411770>
- 林克倫（2019 年 6 月 13 日）。港警射催淚彈 外媒記者飆嗆習近平愛你。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1906130120.aspx>
- 林廷輝（2020）。美中相互驅逐記者對未來兩國關係之觀察。戰略安全研析，（161），7-17。
- 林淳華（1996）。新聞記者工作自主權和決策參與權之研究。新聞學研究，（52），49-68。
- 肺炎疫情與「反送中」衝擊香港新聞自由 公眾「更擔心記者採訪安全」。（2020 年 5 月 12 日）BBC NEWS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616172>

- 
- 邱祐慶（2024 年 1 月 10 日）。台灣大選吸引逾 300 位外媒記者採訪，誰當總統成國際大事！。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109159>
- 徐小鴿（2010）。在控制與多元夾縫中播報國際電視新聞：新加坡案例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13），139-160。  
[https://doi.org/10.30180/cs.201007\\_\(13\).0007](https://doi.org/10.30180/cs.201007_(13).0007)
- 徐筠庭（2020 年 3 月 28 日）。3 美媒遭中回收記者證！吳釗燮推文：那歡迎來台灣。華視。  
<https://news.cts.com.tw/cts/international/202003/202003281995227.html>
- 徐薇婷（2022 年 8 月 2 日）。裴洛西抵達台灣：信守美國挺台灣民主承諾。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208020410.aspx>
- 翁琬柔（2019）。身為國際新聞記者。高寶。
- 袁莉（2020 年 3 月 19 日）。驅逐美國記者背後，中國對敘事和宣傳能力的自信。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0319/china-media-reporters-eject/zh-hant/>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23）。112 通訊傳播市場報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3122/5023\\_49716\\_231228\\_1.pdf](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23122/5023_49716_231228_1.pdf)
- 張文強（2009）。新聞工作者與媒體組織的互動（第初版版）。秀威資訊。
- 張春炎（2017）。最遙遠的鄰國？三十年來台灣對菲律賓的受難新聞建構（1986-2016）。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3（3），145-171。
- 張虹梅（2004）。國際媒體駐華記者與新聞採訪工作探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 莉雅（2020 年 6 月 13 日）。說美國好不行報美國壞也難了：美中媒體角力下的中國駐美記者。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journalists-or-propogandists-reporter-for-a-chinese-news-outlet-in-us-talks-about-his-work-while-caught-in-the-media-war-20200612/5461329.html>
- 陳祥、陳嘉珮（2009）。台灣國家形象轉變 20 年 (1986-2005)-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形塑下的台灣。傳播與管理研究，9（1），5-31。  
<https://doi.org/10.6430/cmr.200907.0005>
- 陳雅惠（2001）。建構新聞工作者傳播工具與人脈互動的架構：從社會資本交換與再媒介化之考察。新聞學研究，（147）。

- 
-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記實避禍」的報導策略。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陳韜文、李金銓、潘忠黨、蘇鑰機（2002）。國際新聞的「馴化」：香港回歸報導比較研究，（第 1-27 頁）。
- 陳韻聿（2024 年 10 月 23 日）。BBC 新聞部擲節縮編撤 185 職位 擬取消台北等駐點。中央社。  
<https://academy.cna.com.tw/NewsWorldCont/Index/20241023a001>
- 麥燕庭（2021 年 11 月 17 日）。中美結束媒體戰 互相放寬記者簽證。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https://www.rfi.fr/tw/中國/20211117-中美結束媒體戰-互相放寬記者簽證>
- 斯科特（2023 年 8 月 30 日）。記者對話：駐華外媒記者的減少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損失。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fewer-journalists-in-china-is-bad-news-for-everyone-else-reporters-say-20230829/7247059.html>
- 游凱翔（2023 年 12 月 19 日）。外交部：台灣新聞環境自由 外媒駐點數量逐年增加。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312190102.aspx>
- 黃彥翔（2008）。搞關係、玩面子：記者面對消息來源的衝突化解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5），129-153。  
[https://doi.org/10.30180/cs.200801\\_\(5\).0006](https://doi.org/10.30180/cs.200801_(5).0006)
- 黃朝郁（2021 年 4 月 1 日）。不只 BBC！外交部曝傲人成績：1 年新增 39 位記者駐台。三立新聞網。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919349>
- 楊孟立（2021 年 1 月 3 日）。陸拒我迎 外媒駐台記者正成長。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103000307-260118?chdtv>
- 溫貴香（2024 年 1 月 9 日）。賴蕭國際記者會大批外媒與會 涉外人士：台灣受矚目。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401090044.aspx>
- 聞予（2022 年 1 月 21 日）。記者被驅逐後，外媒如何報導中國？。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121-opinion-foreign-news-china>
- 裴洛西抵達台灣 外媒：不顧中國威脅表態挺台。（2022 年 8 月 3 日）。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208030003.aspx>

劉蕙苓（2022）。探索新聞記者框架建構過程：以文創產業報導為例。中華傳播學刊，（41），165-203。

<https://doi.org/10.53106/172635812022060041005>

蔡惠鈞（2009）。勞動過程之研究：新聞記者的勞動控制和展現主體。台灣勞動評論，1（1），89-113。<https://doi.org/10.29744/tlr.200906.0005>

駐台外媒成長至 71 家 記者人數年增逾 37%。（2020 年 12 月 26 日）。三立新聞網。<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871734>

駐台外籍記者增 22 人，包括數名遭中國封殺的新聞工作者。（2020 年 8 月 29 日）。關鍵評論網。<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9844>

盧永山（2024 年 9 月 3 日）。習近平容不下批評 韓媒：外媒記者、學者加速撤離。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4788426>

賴映潔、陳慧蓉、莊錦農（2017）。誰的他者—台灣報紙筆下的美國攻伊論述。傳播與發展學報，（34），134-162。

[https://doi.org/10.6544/JCD.201712\\_\(34\).0006](https://doi.org/10.6544/JCD.201712_(34).0006)

羅玉潔、張錦華（2006）。人脈與新聞採集：從社會資本與組織衝突觀點檢視記者如何建立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中華傳播學刊，（10），195-231。

<https://doi.org/10.6195/cjcr.2006.10.07>

羅彥傑、劉嘉薇、葉長城（2010）。組織控制與新聞專業自主的互動以台灣報紙國際新聞編譯為例。新聞學研究，（102），113-149。

[https://doi.org/10.30386/mcr.201001\\_\(102\).0003](https://doi.org/10.30386/mcr.201001_(102).0003)

譚有勝（2020 年 3 月 18 日）。中美角力升級 陸驅逐美 3 家媒體記者。工商時報。<https://www.ctee.com.tw/news/20200318700775-430701>

英文部分

@lnachman32. (2019, July 9). With the arms sale to Taiwan and Tsai's upcoming trip to the US, I went ahead and made a "Taiwan clichés, inaccuracies, and bad takes" bingo [Tweet]. X.

<https://x.com/lnachman32/status/1148563518825779200>

@MOFA\_Taiwan. (2020, March 28). It's great having @nytimes reporters in #Taiwan. Our vibrant international media landscape is much the richer for their

presence. Welcome & enjoy the country's freedom in producing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JW

[Tweet]. X. [https://x.com/MOFA\\_Taiwan/status/1261195146336415744](https://x.com/MOFA_Taiwan/status/1261195146336415744)

Alasuutari, P., Qadir, A., & Creutz, K. (2013). The domestication of foreign news: news stories related to the 2011 Egyptian revolution in British, Finnish and Pakistani newspaper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5(6), 692-707.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3491299>

Ashraf, S. I., & Phelan, S. (2023). Journalism 'fixers', hyper-precarity and the violence of the entrepreneurial self. *Journalism*, 24(7), 1482-1498.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211065306>

Cole, J., & Hamilton, J. (2008). THE HISTORY OF A SURVIVING SPECIES. *Journalism Studies*, 9, 798-812.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802207805>

Erickson, E., & Hamilton, J. M. (2006). Foreign Reporting Enhanced By Parachute Journalism.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7(1), 33-47. <https://research.ebsco.com/linkprocessor/plink?id=78ea8148-b8cc-3982-89ec-32666087a9d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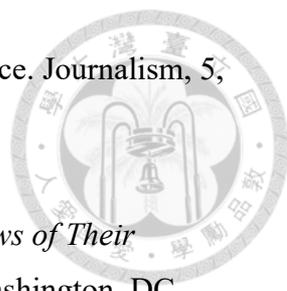
FCCC. (2020,). Control, Halt, Delete: Reporting in China under Threat of Expulsion. T. F. C. C. H. Kong. <https://www.fcch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control-halt-delete.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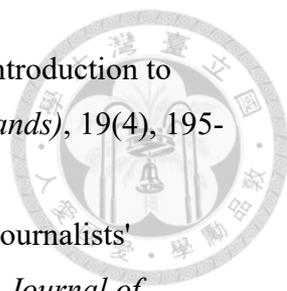
FCCC. (2023). *MASKS OFF, BARRIERS REMAIN: The Post Covid Report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2023*. F. C. C. O. C. (FCCC).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sHeMPAwa2qXU6AXP5hVCKFFWyFfKun/view>

Firdaus, A. S. (2016). De-globaliz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glocal-comparative' take on transnational research. *Sarjana: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31(1), 15-28. <https://research.ebsco.com/linkprocessor/plink?id=1feb27d2-3b2f-357d-abfa-87e952812b78>

Flournoy, D. M. (1992). *CNN world report : Ted Turner's international news coup*. J. Libbey.

Galtung, J., & Ruge, M. H. (1965).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Ne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go, Cuba and Cyprus Crises in Four Norwegian Newspape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1), 64-90. <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6500200104>

- 
- Hamilton, J., & Jenner, E. (2004). Redefining Foreign Correspondence. *Journalism*, 5, 301-321.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4044938>
- Hannerz, U. (2004). *Foreign New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Hellmueller, L. (2014). *The Correspondents' Professional Worldviews of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Sources*. In L. Hellmueller (Ed.), *The Washington, DC Media Corp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ource-Correspondent Relationship* (pp. 79-115). Palgrave Macmillan US.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389022\\_4](https://doi.org/10.1057/9781137389022_4)
- Herbert, J. (2000). *Practising Global Journalism: Exploring reporting issues worldwide* (1st Edition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4324/9780080514581>
- Hess, S. (2005). *Through Their Eye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http://www.jstor.org/stable/10.7864/j.ctt127zp4>
- Jenner, E., & Hamilton, J. M. (2004). *Foreign Correspondence: Evolution, Not Extin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niemanreports.org/foreign-correspondence-evolution-not-extinction/>
- Ji, D., Jiang, X., & Wang, L. (2024). Domesticating international news: China's media coverage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86(1), 55-72. <https://doi.org/10.1177/17480485231220145>
- Jiang, S., & Flynn, K. (2020, March 17). China to expel New York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and Washington Post reporters. *CNN*.  
<https://edition.cnn.com/2020/03/17/media/china-retaliates-against-us-media/index.html>
- Joye, S. (2010). News Discourses on Distant Suffering: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2003 SARS Outbreak. *Discourse &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Discourse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ir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21(5), 586-601.  
<https://doi.org/10.1177/0957926510373988>
- Michailidou, A., & Trenz, H.-J. (2021). Mimicry, Fragmentation, or Decoupling? Three Scenarios for the Control Function of EU Corresponden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8, 194016122110586.  
<https://doi.org/10.1177/19401612211058674>

- 
- Nayman, O. B. (1973).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s of Journalists: an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or Analysis Studies.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19(4), 195-212. <https://doi.org/10.1177/001654927301900401>
- Neilan, E., Sun, M.-p., & Lo, V.-h. (1996). Dateline Taipei: foreign journalists' coverage of Taiwan's first-ever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133-150. <https://research.ebsco.com/linkprocessor/plink?id=5df9106e-5a5e-3428-a241-5f0a4d11c42e>
- Obijiofor, L., & M'Balla-Ndi Oelgemoeller, M. (2024). Managing Difficult Relationships: The Case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 Nigeria, State Officials, and Senior Editors in Overseas Media. *Journalism Studies*, 25(3), 319-336.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X.2023.2297784>
- Palmer, J., & Fontan, V. (2007). 'Our ears and our eyes' Journalists and fixers in Iraq. *Journalism*, 8, 5-24.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7072419>
- Plaut, S., & Klein, P. (2019). "Fixing" the Journalist-Fixer Relationship: A Critical Look Towards Developing Best Practices in Global Reporting. *Journalism Studies*, 20(12), 1696-1713.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X.2019.1638292>
- Przybylska, A., & Townsend, R. (2021). Agent or Scen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Rhetorical Framing of Poland in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ir Own Reporting Practices.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86(2), 175-187. <https://doi.org/10.1080/1041794X.2021.1891275>
- Reese, S. D. (2001).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Journalist: a hierarchy-of-influences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2(2), 173-187.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118394>
- Reuters. (2020, September 8). Factbox: Foreign journalists forced to leave China as diplomatic tensions worsen.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factbox-foreign-journalists-forced-to-leave-china-as-diplomatic-tensions-worsen-idUSKBN25Z0QL/>
- Review, W. P. (2024). *Line Users by Country 2024*. Retrieved from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line-users-by-country>
- Sambrook, R. (2010). Ar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redundant? : the changing face of international news.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 
- Sandler, R. (2020, March 17). Beijing Kicks Out U.S. Journalists—Including From New York Times, Wall Street Journal, Washington Post—Amid Coronavirus Tensions.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rachelsandler/2020/03/17/beijing-kicks-out-us-journalists-including-from-new-york-times-wall-street-journal-washington-post-amid-coronavirus-tensions/>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2014). *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 A media sociology perspective*. 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
- Sorokina, A. N. (2017). Crimean crisis of 2014 in the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U.S. media. *Rus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2), 169-184.  
<https://doi.org/10.1080/19409419.2017.1323557>
- Van Leuven, S., & Berglez, P. (2016). Global Journalism between Dream and Reality. *Journalism Studies*, 17(6), 667-683.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X.2015.1017596>
- Weaver, D. H., & Wilhoit, G. C. (1991).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A Portrait of U.S. News People and Their Work*.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IJEcmWyhar4C>
- Willnat, L. (2012). *Foreign Correspondents – An Endangered Species?*
- Yell, S. (2012). Natural disaster news and communities of feeling: The affective interpellation of local and global publics. *Social Semiotics*, 22, 1-20.  
<https://doi.org/10.1080/10350330.2012.693295>
- Zamith, R. (2022).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Handbook*.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Libraries.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qeNwzweACAAJ>
- Zhang, S. I., & Zhang, X. (2018).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 case study of China in the digital and globalization age. *Journalism Studies*, 19(12), 1804-1824.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X.2017.1305913>